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澳洲之旅

e-BOOK
电子图书

序

编完《世界文化之旅丛书》的最后一部时，窗外已是寒风凛冽。人们正酝酿观看凌晨二至四时的本世纪最后一次的流星雨……

好奇、探求未知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宇宙万物；竖起耳朵，谛听各种声响；迈开双腿，游历着每一个角落的风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门洞开，在外宾来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纷纷走向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工作、学习、探索、旅游，国外旖旎奇异的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形成一批域外游记散见于国内外的出版物及报端。

为了弥补人们不能尽游世界各地的缺憾，同时也给人们增加些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编者辛勤采“花”，酿得甜“蜜”，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在作家的妙笔的“导游”下，您不妨作一次全球的畅游。

本丛书选编的文章，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名家手笔、也有不甚知名的作家、记者、外交官们的值得称道的佳作。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对所到国家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作了探究和描述。打开此书，我们即可在广袤的地球上游历。这里，既有林立的摩天大厦，也有古文明的残垣断壁；既有大瀑布的绝响，也有小溪流的低吟浅唱；既有辉煌发达的生活画卷，也有血与泪书写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崇尚真善美、追求自由与富强的各民族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把文明的火炬代代传递。虽然也有战争与屠杀，也有残忍与兽性，但正义的旗帜总在高扬，历史总是向着光明前进。

人类文明要发展，就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世界已“联网”，信息在“爆炸”。我们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走向世界。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大喜大悲的世纪，我们为今日的发达而自豪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苦难史；人类及生存的环境为现代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本丛书在世纪末年出版，算是对20世纪作了一个“素描”，也算是送给21世纪的礼品吧。

最后，让我们珍爱这个星球，并祝愿她明天更美好。

游 戏 人 间 ——澳大利亚奇观

吴祖光

从那个又寥廓、又清洁、又安静、又快乐的澳大利亚回来已经两个月了，有一件使人至今感觉遗憾、怅惘、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做。

是由于我的京剧本《三打陶三春》在澳大利亚上演，我才应澳大利亚政府的特邀成为一个潇洒的旅游观光客来到这里的。戏搬上舞台，这个编剧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所以从对外演出公司和剧院研究出访名单时就把编剧排除在外，我是毫无意见的。尤其看到为争出国而闹得大哭、小叫、脸红耳赤时更感觉心头酸楚，甚至于不想参加这次旅行了。

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值得写入游记的材料不少；可惜我能安心坐下写写想想的时间却太少了，何况还欠着两个屡次来爽约延期的剧本债。如今我必需在今晚的灯下交稿的这篇小文章，就只能谈谈使我深感失误的这件事情。

沿海东岸的美丽城市布里斯班是1988年举行世界博览会的地方。《三打陶三春》的演出也就是这个丰富多彩的博览会中的一个项目。在希里斯班的一周里，我的游程主要就是世界风物精华集中在这方圆之地的各国展览馆，可说万象纷呈，目不暇接。布里斯班的市民以及世界各国的观光者自早至暮在每个展馆前面排队参观绵绵不绝，真极一时之盛。布里斯班的居民人人兴高采烈，像是过年过节一般倾城出动。

世界博览会的大门前是一条拦河筑起的长桥，在那一个星期的演出时间里，我多次在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演出或休息时间里，一个人走出赛馆散步去博览会，将要走到的时候总会看见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当中，除大小汽车和摩托车之外还有三轮车和人力车。

第一次看见布里斯班的人力车时我感到惊奇。人力车是中国人熟悉的车，在我们大陆上我想少说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上海人叫它做东洋车或黄包车，北京只称为洋车。北京儿歌：“拉洋车，好买卖，大爷拉着大奶奶；大爷放个屁，大奶奶直生气。”小孩儿们都会唱。叫做东洋车，显然这是从日本传进来的，它的官名称为“人力车”，因为它是由人去拉的。

少年时期我是在古老的北京度过的，到了念中学骑自行车之前，我坐了总不下十年的洋车，后来从事写作了，我在不止两三篇文章中写过关于人力车夫的题材，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力车夫大多是一副凄凉受难的形象。人们都会记起老舍笔下那个历经悲欢、最后憔悴以终的“骆驼祥子”，成为百年来中国生活最底层悲惨人力车夫的传神写照。

远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人力车是野蛮的、落后的、腐败国家的产物。”抗日战争期间，提倡取缔人力车的舆论愈益增多。当然，假如取缔了人力车，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的出路何在？当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四十年代末期改朝换代，新中国诞生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理论出发，人拉人自是不能允许的现象。后来由脚踏的三轮车逐渐取代了人拉人的洋车，再后脚踏的三轮车也终于消失了，留下的三轮只是车上一层平板的拉货车，不看见再有人拉人的车了。虽然据我所知，四川的人抬人的轿子至今也没有消灭过。

从今年开始，北京市上重新出现了拉人的脚踏三轮车，但是两只脚在地上跑步的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都至今没有再现，看来也不大可能出现了。

在希里斯班看到的三轮车和人力车确使我出乎意料之外。首先是车子的制作十分精致美丽，车子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工艺美术品。我记得在三十年代的前门大街上曾经看见过老北京前门八大胡同一类的高级妓女打扮得花枝乱颤，坐在十分豪华的洋车上，两盏车灯是黄铜的，擦得白莹雪亮；黑漆闪光的车身，车把上缀着五色丝线的流苏，车底踏脚处还按有车铃，年轻的身穿号衣的车夫大步流星地在华灯初上的前门大街放脚飞跑，车上的娇娘不住地踩着脚铃招摇过市，为的是吸引满街行人的注意，正应了那句古话，叫做“笑贫不笑娼”。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豪华型人力车也没有我在澳大利亚看见的三轮和人力车漂亮。

澳大利亚的人力车都是单人座，脚踏三轮车则是双人座。坐在车上的乘客大多是笑容满面，使人感到他们很快活。但是给我更深感受的是在地上跑着的和蹬三轮的“车夫”，他们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加出人意外的是还有年轻的女孩儿。

还有更教人开心的呢！很多大步跑着的和蹬车的在脖子上挂着一个体积小小的声音却大大的收音机，放的是节奏强烈，声音刺耳的摇滚音乐。使满街灯火通明的布里斯班街头更笼罩上一层浓郁的节日气氛。看到这样的乘客和这样的“车夫”，使人感觉得到：无论是车上坐的，或是地上跑的，他们都不是在赶路，不是为了急于赶到什么目的地，去干什么事情。他们只是为了好玩，他们在娱乐。坐车的和拉车的都在娱乐。

世界博览会大门前的这座桥粗略估计大约不过是一二百米，我打听了一下车价，从这桥头到桥那头要付五元澳币，折合美元四元整。这么轻巧的劳动，这么优厚的收入，姑娘小伙子们怎不喜笑颜开？

澳大利亚的天气也知趣懂事。八月间是当地的隆冬季节，然而即在室外也没有多大的寒意，蹬车和跑步的年轻人很多都光着大腿。

看到这些乘车的和拉车的一个个嬉笑着的幸福的面孔，有什么发愁的事、有什么不愉快也都忘了。

同样的事物，放在哀愁和悲惨的场合里，它可以成为不幸的根芽；但是假如放在富裕和安乐的天地里，它便成为幸福的种子。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已经十分模糊的记忆里，捡起在中学生时代读过马克·吐温的一部小说，说的是几个顽皮孩子看见油漆匠在公园里干活，漆个什么物件。孩子们觉得干这个油漆活非常好玩，拿着刷子刷了起来，刷得又快又好。而那个油漆工成年累月地干着这一行则感到非常乏味和厌倦……

保持着孩子样的心情，把工作视游戏，就这样“游戏人间”我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也许会为此种谬论再受到批判。

一开始我就说：“非常遗憾、怅惘，一桩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做。什么事呢？布里斯班街头那些跑来跑去的、精工制做的三轮车和人力车，那些年轻的、如花似玉、英姿飒爽的、胸前挂着收音机、满面青春朝气的姑娘小伙子，以及坐在车上的老年、中年、青年的一张张幸福欢乐的面孔，我竟是一张照片也没有拍下来！我那个“傻瓜”的日本照相机，只要一举手、一眯眼之劳就能长留下的生活美景竟被我交臂失之。如今万里睽违，不知何日再会？衷心希望多情的澳大利亚朋友……我的邀请者、亲家的居停主人戏剧

家加里罗·甘德瑞先生(CARRILLO GANTNER),好朋友白杰明(GEREMIBERME)
和贾佩林(LINDAJAIVIN) 贤夫妇、华裔亲人张克强先生、道家弟子张爱莲女
士和小侄女王子音,记着带上你们的相机,走在澳大利亚任何城市的街上,
为我拍几张这样的照片寄给我可以吧?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王蒙

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首都以各自不同的风姿点缀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波思加草地上跳跃着松鼠和野兔。莫斯科河旁退休工人在钓鱼，而他的身后就是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东京的高楼与挤满了汽车的公路繁繁密密。阿尔及尔的白色建筑在阳光下洁净得耀眼。巴黎像一个矜持的美人，只有她的老房子上的众多的小烟囱显露出一种天真。而伦敦的多顶的出租汽车驶行在讲究的西敏斯区，天然就是戏剧性的场面，尼罗河旁的开罗呢，那就更不用说了，迅速膨胀的城市与万也威严的金字塔，夹击得渺小的游者喘不过气来。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首都——堪培拉。

没有拥挤的房屋，没有高层建筑——澳大利亚政府是有法宝的，在堪培拉盖房最高不得超过海拔 75 米。没有密如蛛网的道路与车水马龙的交通工具。没有什么名胜古迹，没有那种远古的、超人类的威严的逼视。没有战争与革命与动乱的遗迹。没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不夜的商业区红灯区，没有帝王气象。没有圣地气象。没有大都会气象。没有历史名城气象。没有独树一帜的民族、种族主义气象。也没有任何异国的首都难免的衙门气象。

有的是开阔的空地，有的是因为车少人少而显得永远宽敞和平静的道路。有的是因为绝不高耸而显得更加平实舒适的房屋。连我们住的哈亚特大旅舍（Hyatt Hotel）也只是平房。更可贵的是城市内内外外的那些空地，那些荒丘，那些可能已经如此长了数万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桉树。这些荒丘和树木使初次造访者惊喜地发现，堪培拉市还没有连结，还没有脱离开大自然母亲的怀抱，还没有像其他大城市那样形成自己的一个紧张促迫的天地。

澳大利亚没有多少历史。去年——1988 年他们为移民 200 周年而狂欢。澳大利亚的土人的历史悠久，文化却仍然处于单纯的童年期。这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那么多、那么强大、那么光荣又那么耻辱的古人在我们的头脑与灵魂里生根。据说澳大利亚没有人口的压力，768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却只有 1700 万人，平均每个人占有土地（不是耕地）约 0.5 平方公里，是中国人的 550 多倍。据说澳大利亚领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和战争，美国还有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呢。中国就更不用说，七八年就得乱一次，近百年来压根儿就没踏实过。

所有这一切甚至使中国人爽然若失，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这么一个首都？在这里驾车购物都不用排队。在这里走路不用顾及随时会碰撞别人。在这里不需要向传统致敬立志弘扬传统也不需要痛斥传统与传统进行悲壮的决一死战……

幸耶？非耶？奇耶？梦耶？我们驱车去艺术环境国土部去拜会霍尔丁部长并出席他的宴请。我们上午去参观图书馆傍晚又在同一个图书馆大厅出席为庆祝文学节开幕而举行的酒会。我们去参观他们的美术馆，去中国的驻澳使馆，去迪克森区中国餐馆吃晚饭。走来走去，绕来绕去，都离不开市中心的格里芬湖。因为堪培拉市本来就很小，正因为小才有一种真正的宽松，才真正能摆脱许多在我国太难于摆脱的压力。

世界上毕竟有、确实有这样的国家与这样的都城。地球上毕竟还有一个这样比较宽松的角落，回忆起她来，能不显出一抹欣慰的笑容么？

澳大利亚见闻

陈登科

牧场一瞥

在堪培拉拜访《半球》杂志主编亨德森时，他问我对堪培拉的印象如何？我随口回答他：一是马路上人少，因我们在堪培拉游览了两天，在马路上很少看到行人；二是灰尘少，两天中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清洁工，可是那马路，总是油光水滑，清清爽爽，很难发现灰尘；三是烟囱少。堪培拉花草树木很多，一般人家的住宅，房子都隐藏在树林里，是看不到烟囱的。

亨德森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他听我谈了对堪培拉的印象之后，便笑笑说：“在我们堪培拉，还有三多，你看到了没有？”

我问道：“不知有哪三多，你可以向我们介绍介绍吗？”

陪我们去的还有澳大利亚外交部的格里先生。他看看格里先生，笑笑说：“苍蝇多。在堪培拉看到人手在半空摆动，你不要以为他是向人在招手，不是的，他是在打苍蝇。”

翻译郭贵芳在旁补充道：“堪培拉的苍蝇，还非常呆，落到人脸上，伸手便能捏死。”

亨德森继续说道：“还有羊多。在国外都知道澳毛，就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羊。羊比人多，多好多好多倍数。第三，政府官员多……”

我正要开口问他们全国有多少政府官员，格里先生抢先向我解释道：“我们国家正在精简人员，压缩开支。”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

澳大利亚羊多，我是久已闻名的。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总想去参观参观他们的牧场，可是外交部对我们的日程安排上，单单没有这个项目。经过多次提议，到了墨尔本才做了安排。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雨不大，可是一直下到天亮也没有停。我们没有雨具，有人便提议，是否把这个项目取消。我坚持了：冒雨也要去。因为我一心想看看，以盛产羊毛驰名于世界的澳大利亚的牧场和我们的牧场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们对国家的牧场，也只是从电影上看到的。因此，在我的概念中，牧场一定是大草原，还有帐篷之类，当然，也有穿着民族服装的牧羊姑娘，骑着骏马了。

我们一行四人，迎着蒙蒙细雨，到了墨尔本郊区。司机将车子驶进了丛林。这个丛林，在澳大利亚来说，确也算不上什么丛林，面积总共也不过几十亩大小。丛林里有三幢房子。一幢小洋房，是牧场主勃朗的住房；另一幢好像是参观者的饭堂或者展览室，还有一幢是牧场主人勃朗的课堂。因为每天都有从城里来的中学生，听勃朗讲授牧羊知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勃朗已外出了，等了好半天，一辆汽车开回来，车里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翻译小郭走过去，向姑娘说明来意，又把我们介绍给她。姑娘告诉小郭，她的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既然主人外出了，我们只好在那里等着。

雨，下下停停。我便随意到丛林里走走。可是，没有看到羊群，只是看到十几匹骏马和两头毛驴。我心想：这些马，可能是专为牧羊而驯养的。那

毛驴干啥用呢？牧羊姑娘总不会骑着毛驴，赶着羊群游荡吧？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勃朗家的两条狗。那狗关在铁丝笼里，不停地向我献殷勤，希望我走过去，将它放出来。

这两条狗，有一条和我们农村里养的狗并无不同，个子不大，身上全是黑毛，只有四个蹄爪是白的，颈下也有一片白毛花。另一条狗，据说是德国狗与澳大利亚本地狗杂交的，不仅高大，还有点像狼，使人感到有点可畏。当然无人敢去放它了。

勃朗终于回来了，他是一位 68 岁的老人。一回到家，便把他的全家人领出来，排成队，向我们表示欢迎。他再三地讲，希望我们能多买点小麦和羊毛。他哪里知道，我们四个人，对做买卖全是外行呢？这家人，老夫夫妻俩，还有两个女儿。“就这么四个人，能养多少羊呢？”我心里暗暗在想。

小郭一边和勃朗交谈，一边向我们报着数字。他的牧场，计有三千多只绵羊，一千多只山羊，几百头牛，另外还有马和驴。

山羊，是我讲的，因为这种羊，和我小时候放的山羊很相似。可是，他们并不叫山羊，叫野羊。据说，这种羊的祖先，本是英格兰人家养的一种羊，并不野，它们随着主人，从英格兰迁居到澳大利亚，它们的主人看到澳大利亚遍地都是羊，而这些羊，不但比英格兰羊肥壮，而且身上的毛又细又长，又纯和、又柔软。于是，便把它们抛进荒山，送进森林。年复一年，他们就成为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野生动物。

勃朗的大女儿，不仅是一个牧羊姑娘，还是研究羊毛的专家。她对野羊的毛花进行了研究之后，便又驾着飞机，到森林去寻找，把它们捉回来，放到自己的牧场里饲养。据勃朗的介绍，这种野羊，身上的毛花很粗很粗，粗得像钢针一样，毛尖还扎手，可是粗毛花里，还隐藏着一种特有绒毛，比绵羊毛贵重，价格也可以高上好几倍，它可以在毛纺业上成为一种贵重的原料。听了勃朗的介绍，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联想：我原对社会发展史是无知的，参加革命以后，才知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猴子可以进化成人，人是否也能再退化成猴子呢？我觉得人身上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兽性。人是否也和这些羊一样，会由家养变为野生，再由野生变为家养？太可怕了！

据说在澳大利亚国土上，既没有老虎，也没有狼，这便为野羊提供了有利的生活条件。而且这种野羊繁殖力很强，在澳大利亚森林里成群结队，到处游荡。勃朗父女，不但人人有自己的汽车，还有飞机。他的大女儿就是很好的驾驶员，所以她经常驾着飞机，到森林里去寻找，发现了野羊群，就与妹妹分头去捉。在他的牧场里的野羊，都是她姐妹捉回来的。

勃朗的牧场，有多少英亩，当时他是讲过数字的，因为我是个怪病，从来对数字不感兴趣，就没有去记它。我们坐着勃朗的汽车在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地上奔驰了好大会，他才将车子停下，跳出驾驶室，两手叉腰，向四面一望，说道：“我的羊全躲到哪去啦，怎么一个也看不到了。”

草原上，还洒着霏霏细雨，可是风很大。我走出车子，差点被风刮倒。勃朗伸手将我拉到他的身边，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到我的身上。他个子很高。他的雨衣披在我身上，正好拖到脚面。他对我上下打量一下，又从头上取下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哪知他个子高大，头也特别大，他的手刚一放开，帽子便从我的头上随风刮走，我和他追了好远，才把帽子追回来。

他的小女儿，开着汽车，带着一条狗赶来了。这条狗，就是我们在他家课堂前看到的关在铁丝笼里的那条身体矮小的白爪白颈的黑狗。勃朗走到女

儿的汽车旁，咕噜了几句，不知他是和女儿或者是和狗讲了什么，只是见他的女儿，在狗头上拍了两下，然后开开车门，那狗便跳下汽车，走到勃朗脚跟，往草地上一坐，仰起头，看着勃朗。

勃朗为着替我遮风挡雨，始终与我紧紧挨在一起。见狗坐在面前了，他便将手举起，在半空划了一个大弧形，嘴里嘘了一声，那黑狗呼噜跳起来，放开四蹄，奔向无边的草原。

狗，那条神奇的小黑狗，在那风雨中，越跑越远，越远越小，不一会儿，再也看不见了。不过，我的两眼，还是朝那小黑狗奔跑的方向眺望着。

过了一会，不，应该说是好大一会，只见天与草原相接的远方，慢慢升起一片灰蒙蒙的云头。那云头越升越高，慢慢向我们涌来，越涌越近，我终于辨别出，那不是云头，而是羊群。

那羊群，在草原上奔跑着，忽儿向左，忽儿向右。但是，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始终结成一团，朝着我们所在的地方跑来。

羊群奔跑到勃朗面前，突然发出一阵叫声，不知是向主人问好，还是诉说别的什么。勃朗将手扬起，嘘了一声，那小黑狗按照勃朗的手势，在羊群后边坐下来。那些数不尽的膘满肉肥的大绵羊，转回头看看小黑狗，然后，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只挨着一只，好像以亲昵的目光，看着它们的主人。

这时，我问勃朗：“你这些羊，长年放在野外？”

他回答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昼夜，它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吃着，玩着，游荡着。生活得很好。因为在我的牧场里，有着它们吃不完的草。”

“冬天怎么办？”

“我们这里冬天不下雪，它们不怕冻着。”

“根据我的常识，绵羊是怕遭雨淋的。”

“我的牧场，周围都有树木，下雨，它们自己会躲到树棵里去。”

“自己？”我不禁愣了一下：“这些羊没有人看管？”

他风趣地回答：“人工太贵，我们雇不起人。”

“那你……”

未等我把话问出口，他指指羊群背后那条小黑狗道：“全靠它。”

“它？”

“二十个牧工的工作，也赶不上它。到了剪羊毛季节，只要把它放出去，羊群会一个不少地被赶到指定地点。剪完毛，它又将一群一群赶回到草原上。”

“那你的羊，不是用人工配种？”

“不，我的种羊和羊群不是放在一起生活。待到春天，母羊发情季节，放种羊一个月的假期，让它在广阔无边的草地上，过一段甜蜜的生活。”

“那产羔呢？”

“何时放出种羊，何时应产羔，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到时候还是由它，”他指着那条小黑狗，“将羊群赶回，把母羊和羔子分开，各立门户，自由生活。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并不难。”

“不怕你的羊，长年在野外生活，有丢失？”

他摇摇头：“我们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只羊，连一只小羊羔也未丢失过。”

不管他怎么摇头，我对他的回答，是有点不怎么相信的。我想，他根本不可能把几千只羊，普查一遍，记下准确的数字，他怎么可能知道有无丢失

呢？

我们的谈话还没有完。他的小女儿来通知他：为学生教课的时间到了。

原来，墨尔本教育机关，和勃朗签订了长期合同，每日有 100 到 120 名中学生，到他的牧场来上课，由勃朗任教，专授牧羊知识课程，风雨无阻。我们随同他回去，参观了教室和学生午餐食堂。为着不妨碍勃朗的讲课，便向勃朗夫妇和他的两个女儿告辞了。应该再赘一句，这四个人，是否就是勃朗的牧场或者还兼畜牧学校的全体职工呢？我想起他的狗。

牧师和他的两个女儿

一些澳大利亚朋友，在我面前，有意或无意，常常在言来语去中流露出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在人口平均收入方面已进入世界上前八名的行列。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就业情况良好，法律规定，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八，政府就得自动辞职。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失业者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的。

在阿得雷德作家周期间，我遇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姐。她的中国话讲得很不错。我问她的名字，她说叫榛莽。但她又声明说：“这个名字是假的。”

榛莽现年 26 岁，是一位曾留学中国的大学生，她所以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就因为她是一个失业者。好像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到中国留过四年学，回到自己的祖国，还是没有职业，有点太……。

榛莽的父亲是牧师，已是 78 岁的老人，已退休。他们家的生活，全靠父亲过去的储蓄。据榛莽讲，每年约有 1.4 万澳元的利息收入，生活也算过得去了。

她的父亲一生无子，只有两个女儿。榛莽是老二。她的姐姐沃里现已 34 岁了。

沃里是个爱放纵自己的姑娘，从小就不受管教。父亲无法，便将她送进中学，强迫她住校。有一天夜里，她竟跳窗逃走了。父亲又把她送到艺术学校去，想用艺术吸引住她，使她的性格安定下来。

沃里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她的成绩很好，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又发生新的支叉——使她父亲不可原谅的支叉：她竟然宣布她是无神论者，还倡导什么性解放。宣扬无神论，就是对上帝的背叛，倡导性解放，就是对宗教伦常的亵渎，这对于做牧师的父亲来说，当然是大逆不道，于是便将沃里逐出家门。

沃里亵渎上帝，却喜爱动物。她不但学了好多饲养动物的知识，研究各种动物的特性，还会给动物看病。她的住房，既是动物园，又是动物的诊疗所。她长年与狗、猫、蛇、鸟、袋鼠、树熊吃住在一起。据榛莽介绍，澳大利亚是地球上年代古老的陆地，在内陆地区，沙漠里寸草不生，既无野兽的足迹，也难听到鸟鸣。但是，沃里却不畏艰苦，冒着生命危险，到那里去考察和研究。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沃里在摄氏 50 度高温的死一般寂静的沙漠中，意外地发现了埋藏着的宝石，还找到鱼和贝类等海洋生物的化石。后来，她成为一家宝石店的女店主。

沃里虽然在阿得雷德自开一片宝石商店，但是，她仍没有放弃研究动物的工作。

在澳大利亚，蛇是不常见的爬行动物。据说，一天有这么一家人家突然发现屋里有一条长虫，怕得要死，谁也不敢去动它，只好打电话给爱护动物协会。爱护动物协会接到电话，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去的人，一看是蛇，也感到疹得慌，不知如何办是好。这时，有人提到沃里，说她是养蛇的人，一定知道怎么办。电话打到她家，她来了。其实非常简单，她提起蛇的尾巴，在半空抖了几抖，往带去的口袋里一装，拿回家里。从此，沃里被聘请到爱护动物协会工作。但是，她的父亲仍不允许沃里进入自己的家门。

榛莽在她父亲的心目中，是最理想不过的女儿。她既是上帝的虔诚的崇拜者，又是父母的无条件的顺从者。她 18 岁中学毕业后，父亲让她报考大学，在报考之前，请了家庭教师，为她上了一个月的打字课，然后带着她到欧洲去旅行。

她的父亲原是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到西欧去旅行，第一站当然是英国了。她随着父母，坐上轮船。到了英国，天天忙着跟父亲去看他的老同事，老朋友，还有亲戚。一连忙了两个多月，还没有看完，她实在有点发腻了，便向她父亲提出，她不想旅行，只想工作。父亲便答应她的要求，将她送到瑞士一个国际基督教大会堂工作。名为接待员，实际做的是打字、接电话、卖邮票之类的事。她说，她虽是出生于一个牧师的家庭，对教会的实质并不了解。她在国际基督教大会堂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她多少才有点明白，所谓上帝，只不过是“愚民”、是“欺骗”。她便毅然离开了国际基督教大会堂，投向深山，在一个小村子的旅馆里帮助旅客铺床，洗衣服，打扫房间。通过劳动的机会，与社会取得接触，很好的练习了她在中学学过的德语和法语，因为这个小村子全是说德语的，旅客中又常常有说法语的。

榛莽在瑞士工作了两个多月之后，随着父母，坐上轮船，回到澳大利亚。她考进了大学。

她在大学里读的科目是：汉语、音乐、法语、人类学、亚洲发展和中国政治学。她对中国有了兴趣，大学一毕业，便申请来中国留学，专门研究中国音乐。

榛莽在中国留学四年，学的是乐理。回国后，因为全国大学都没有这门课程，她只有失业在家。

按照澳大利亚国家的规定，失业者每周可以领取失业福利费 58 元，另外还发一张失业卡。有了这个卡，一不交所得税。二是到国家医院看病受到优待；三是坐公共汽车、电车不买票。还有住房也受到优待了。但是，她总觉得，一个出国留学四年的大学生，回到国内，仍是一个失业者，靠领失业金维持生活，总是有点不大光彩。

她对我说：“我出生在澳大利亚，也到过西欧，比较起来，我还是向往中国。”

我说：“我们中国，在经济上，目前还不太富裕。”

她说：“我希望过一种有道德、有理想的生活。人，总不能只为了物质享受活着，不能光为了钱活着。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真挚的友情，有高尚的道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如果只讲金钱，只讲物质，而人情淡薄，尔虞我诈，太没有意思了。”她发表了这番感慨之后，又对我说：“我很怀念在中国的四年。我又申请了，再回中国去工作。我估计，会被批准的。”

“大概什么时间能去？”

“最迟到秋天，就是今年的秋天，我一定到中国去。”

我握握她的手：“好！我欢迎你，欢迎你到我家里作客。”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

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的早晨，榛莽和一位老人赶到旅馆去。榛莽介绍说，老人就是她的父亲。我一看，这位老人，足足比我高有八九寸，一头白发，连胡子和眉毛都成银色，便问老人道：“你的女儿，要到我们中国去工作，你同意吗？”

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榛莽告诉我：他如果不同意，就不赶到旅馆来送行了。我向老人表示了谢意，又转向榛莽：“好！中国见！”

“中国见，中国见！……”我们的汽车已转向高速公路，榛莽和她的父亲及其他送行的人，还排列在旅馆的大门前，向我们招着手。我还隐约地听到那三个字：中国见！

悉尼街头拾零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最主要城市。但是接待人员告诉我，我们访问昆士兰的目的，不是想看城市，而是去游览黄金海岸，因为黄金海岸是世界著名的游览胜地。可是按照接待单位的时间表，我们晚上6点才去黄金海岸。据说从住地到著名的“冲浪者天堂”还有六十多公里路程，赶到那里，已是日落黄昏，这还游个啥呢？接待人员讲，可能是让我们去看看黄金海岸的“夜生活”。

“夜生活”这三字，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名词，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也不清楚。但是，既然安排，我只好乘车去了。

我不懂洋文，沿途只看到霓虹灯闪烁。汽车在公路上驰骋。大约在7点50分，到了一座城内，进了退伍军人俱乐部。我这才被告知，我们的车子已穿过黄金海岸，到了双城。

从退伍军人俱乐部出来，已是深夜11点40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心里好不气恼！也就向我们大使馆的翻译提出：“这样的安排是不大合适的。游览黄金海岸，既未看到海，也未看到岸，什么‘夜生活’，也不过是马路，霓虹灯，喝酒，跳舞，看电影，有啥好看的呢？”可能是我的意见起了作用，第二天早上告知我，去悉尼的航班已作了改变，原定从布里斯班乘机，改由黄金海岸上机。我一听便明白，所谓改变，就是为我们重游黄金海岸提供一个机会。

黄金海岸，真是名不虚传，确实是一个游览的好地方。可惜给我们的时间太短，只有4个小时，不过我们还是充分利用了这4个小时，观看了水上滑板表演，欣赏了海豚的嬉耍，还到了“冲浪者天堂”，在那4米多高的巨浪中，搏斗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悉尼，已是下午近5点了。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港城市，新南威尔士州首府，也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市。据澳大利亚朋友介绍，澳大利亚号称全国有1500万人口，实际只有1400余万，但是，墨尔本和悉尼两个城市，就占去一半。

悉尼位于塔斯曼海伸入大陆25公里的杰克逊湾两岸，有长达1100米的大铁桥连接城市两端。悉尼大剧院就在大铁桥旁边的海面上。我们去参观的这一天，正好是建桥50周年。因为是大桥生日，任何车辆也不准从桥上通过。我们只能站在大剧院的广场上，听我们的司机的介绍。悉尼这座城市，是由许多小市镇组成的，小镇与小镇之间，有树木青翠的天然大公园，占全市面

积五分之三。天然公园里有许多珍奇动物，尤其是袋鼠，在这个公园里最多。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一走进树林，就会被袋鼠围住。悉尼又是澳大利亚经济、交通、贸易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天然良港之一，有定期海、空航线联系英、美、新西兰等国家。工业方面，以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化学和纺织等为主。文化艺术方面就用不着多讲了，看看大剧院就知道了。

悉尼大剧院，确是很了不起的建筑。据司机讲，主厅——音乐厅有 2600 个座位；另外还有三个小厅：一个电影院，一个话剧院，一个歌剧院。这四个厅的支架全部是用的铝合金，墙壁的玻璃板是法国特制的一种防弹玻璃，顶层的瓦片是瑞士的。整个剧院的建成，共花费一亿零二百万澳元。

据说对于大剧院的建造，当时在州议会中曾有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悉尼只有三百多万人口，已有歌剧院和音乐厅了，不必再花这么多钱，在海面上建一个大剧院。另一派意见认为，悉尼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建一个像样的剧院，有世界影响，花得再多一点也值得。但结果还是建了。按照目前剧院收入来计算，在 17 年之内不但可将投资全部收回，政府每年还可通过剧院卖出 120 万元的彩票。

离开悉尼大剧院，我们沿着海边，在悉尼市郊绕了大半个圈子，又转向市中心。因为沿海边全是浴场，我们在“冲浪者天堂”游过水，再看这些浴场，已不感兴趣了。

车子行到一条街。奇怪，怎么在街头有用汉字写的对联？

澳陆风光物阜民康邦交友善

中原气象德门义路礼让仁风

我请司机将车停下，下了车，走到街里去。

这条街不长，站在牌楼下，可以看到街的那一头也有一个牌楼，牌楼上也有汉字对联。可惜只看清上边一半，写的是：

继往上国衣冠……

开来大同世界……

街上的酒楼、菜馆，招牌都是写的中文。走进商店里，发现货物也大都是中国产的，连蔬菜店里的榨菜也是从中国运去的。

翻译告诉我，这就是人们讲的唐人街。所谓唐人街，也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我们离开北京已有二十多天了，对这条街感到格外亲切，便以主人的身分邀请司机，在一家菜馆，共进午餐。

我们在澳大利亚游览了六个城市，从未看过电影，为着了解澳大利亚的电影艺术的发展，我们也曾访问一个电影学校，亦与学校师生座谈过，但是总想能看一次电影，实际了解一下他们电影艺术水平的高低。走进第一个电影院，看看广告，全是香港和台湾的影片，无意思。又到第二个影院，发现放映的影片全是西方的，从那些五颜六色的剧照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它的内容，也不外乎“色情”“凶杀”四个字。我们正要离开，这时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说，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贴到从维熙身旁，伸出手，向维熙要香烟。我们在澳大利亚走了六个城市，所见到的澳大利亚人，不分男女，对我们都表示很热情，很友好，却从未遇上这么一个要香烟的女孩子。她拿到香烟，仍不离开，又伸手要火，而且用英语跟维熙说个不停。维熙听不懂她的是说什么。我便走过去，问她道：“你要什么？”

她一听我的口气比较严肃，便走开了。事后司机才告诉我：那种女孩子

是悉尼的雏妓。这些小女孩不但在电影院门前可以遇上，别的街上也可以遇上。不但夜晚出来拉客，白天也站在街上，兜揽生意。听了他的介绍，我许久讲不出一句话来。

也是在悉尼街上，我们见到两个男人，怎么看他也是男人，可是他们却着一身非常鲜艳的女人的服装，脸上搽着粉，头上戴着花朵，颈上挂着晶光闪闪的项链……。看了使人感到恶心。据介绍，这种异态“女人”，在悉尼很时髦，因他本来是个男人，经过一种“最现代化”的手术，已变成女人了，而且是最时髦的女人，不但有恋爱的自由，还有结婚的权利。这种异态“女人”与男人在街上手挽手行走，可以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真是当今世界，无奇不有！

我们的汽车，转向一个车辆较少的街道，正行之间，忽见马路旁，一个年岁约摸七十上下的老人，手中拿着一块黄色的木牌，往空中一竖，我们的车子便停下来。

我还以为是什么检查站。可是那个老人看也不看我们，待两个小孩过了马路，才将手中的黄牌放下，车子放行了。我问翻译：“这是干什么？”

翻译说：“黄牌警察。”

黄牌警察？我在澳大利亚走访了6个城市，逗留22天，未见到一个交通警察，也未听到过喇叭的叫声，怎么到了悉尼，在这个小街道上冒出个“黄牌警察”呢？

翻译向我解释，所谓黄牌警察，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些退休者，自愿走上街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些义务性的服务工作。他们是专门为保护儿童安全的义务工作者。

在澳大利亚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都是高速公路。公路上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来往不断，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横穿马路是不易的，尤其小孩子更为危险。因此，他们设立的工作点，大都不是在繁华市场或者交通要道，而是在一些小街小巷，没有红绿灯的岔道口，或者靠近小学和幼儿园的周围。他们手中的黄牌，大约有一尺长，八寸宽，下边有个二尺来长的木把，可是他们的权力却很大，只要他们手中的黄牌一竖，不管什么车子都得停下来。

“要说权力，我想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权力吧，一个退休者，能有拿起黄牌的权力，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尊重这种权力！”

这是我当时对翻译说的话。

时间虽然很短……

我和从维熙都不懂洋文，只有艾明之稍稍懂得一点。因此，我们从不在于没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离开旅馆。这一天下午，艾明之突然游兴大发，提出要逛超级市场。我因天气太热，不愿出门，同时，对逛市场也无兴趣，便没去。维熙便与他去了。

他们下午1点去的，到了5点还不见回来。我正在家发急，晚上还有华侨约会。我便问陪同他们去的郭贵芳：“他们已经4个小时了，怎还不回来？”

小郭说：“我与格雷走时，他们两人还在超级市场，说转一会儿就回来。”

“这两人真没一点根。走时，我还关照他们，人家陈兆华晚上5点来接我们。”

“他们知道晚上有约会，就应该回来哟……。”

我们两个人正在发急，艾明之和从维熙走进房来了。

我对他们回来迟了，很不满意，说：“你们明明知道晚上有约会，怎么到这么晚才回来呢？”

从维熙脸上还带点温色，沉沉的，一声不吭。艾明之有点尴尬道：“我们今天，出了笑话。”

我一听说出了笑话，忙问：“笑话？出了什么笑话？”

艾明之道：“我们从超级市场出来，我说应该往右拐，他硬要往左，走错了路……”

从维熙抢着申辩道：“怎么又是我，我说你走得不对，你不相信嘛。”

我一听说是走错了路，也就放心了，对艾明之道：“你不是会两句洋文吗？”

艾明之红着脸，笑着：“最后，还是我那两句洋文起了作用。”

他的两句洋文，是起了什么作用呢？

是这样：去超级市场时，是翻译郭贵芳与格雷领着他们去的，到了超级市场他们便对郭贵芳说：“你有事就先走吧，我们在这里转一会便自己回去。”两人走超级市场也只有一个多小时便出来了。超级市场四面都是门，进这门出那门，就是两个不同的街道，是应向左呢？还是应向右呢？两人都搞错了方向。走呀，走呀，就走出市中心了。

这个市，一出市中心，便有一公里宽的环城公园，花草，树木，到处都是差不多，不熟悉道路的人，也确实有点不容易分辨得清。

他们两个人，一路上，他埋怨你，你埋怨他，埋怨来埋怨去，埋怨到最后，两人干脆在马路旁大树底下石凳上坐下，不走了。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未有留下姓名的朋友，一见就知他们是两个迷了路的中国人，便主动向前问明他们的住址，开出自己的车子，将他们送回旅馆来。

我与小郭听了他们讲了详细经过，都非常感激，又埋怨他们没有问明这位澳大利亚朋友的地址和姓名。如问清了，我们应该去向这位朋友道谢，或者至少要写一封感谢信嘛。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位澳大利亚人说的一句话：“中澳人民之间的友谊，确是非常深了。”

这是我们去访问曼南村时，一个铁工的夫人——派特，她这样说的。派特还向我们描绘了九年之前广州杂技团去曼南村演出的盛况。曼南村是不大的集镇，全村各行各业全算在内，也不过两千多人。只和我们一个大队的人口差不多。可是欢迎广州杂技团时，排列街上的欢迎队伍却超过两千人。因为，不但全村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出动了，还有附近的也来参加了欢迎的行列。

在那里，欢迎一个外国演出团，完全是靠群众的自愿，既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存在“组织动员”，是人民友谊的表示。派特说，她之所以向我们描绘一番欢迎盛况，只是为着告诉我们，曼南村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特别深厚的。她用“深厚”这两字，表现曼南村群众的自豪。

在我们从曼南村回来的路上，汽车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房里出来两个人，看了看车里的乘客，又同司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个去取加油器，另一个赶快拿来一个铝桶和洗帚，为汽车洗除泥土和灰尘。这类可能不大引人注目的事，或许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的一种高尚的社会风气。但在我看来，也可能

是对中国人友好的举动，因当他们加好油，洗净车子之后，都向我做了一个表示非常友好的手势。

我的这种判断，在我到了墨尔本之后，通过几个澳大利亚朋友的口，得到了证实。

墨尔本大学的西门教授，在他的海滨别墅里为我们举行了非常丰盛的家庭晚宴。不仅西门教授一再向我讲，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宽广的；参加晚宴的一些学者们也是这样讲，连西门的夫人举杯时，也说我们两国人民应该珍惜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

安德森是澳大利亚一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他去年访问中国时，我们虽是见过面的，但还称不上是老友。这次，他刚刚在头一天晚上参加了招待中国文联代表团的宴会。宴会上，因为多贪了两杯中国茅台酒，他醉了，在楼梯口，由二楼滚到一楼，被连夜送进医院，头脸缝了十几针。第二天当他醒来时，听说我们已到了墨尔本，便从医院跑回家，向家人讲他要到旅馆看我们。他的夫人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缠着纱布，脸上挂着彩，手也受了伤。她怕客人知道他因喝醉酒而滚下楼梯，受了重伤的事，有损一个作家的形象。他的儿媳妇也在旁劝他说：“堂堂的一个大作家，头上、脸上，还有手上，扎的、包的，也不怕中国作家笑话你。”他却说：“正因为我带着伤，从医院里跑出来，才能表达出我与中国作家的友谊，是真挚的。”他终于逃避医院的护理，拒绝夫人和儿媳妇的阻挡，跑到旅馆来，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密交谈，在我一再的劝说下，才又回到医院去。

还有一位小说家叫沃腾。我曾读过他的小说《不屈的人们》。

沃腾先生现年70岁，原是墨尔本笔会主席，现在专门从事写作，他为人非常诚恳、坦率、热情。一见面就告诉我们，他听说我们要去拜访他，非常激动，立即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好朋友，约他们到他家一起接待我们。他说：“澳大利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已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在150年前，中国的淘金者已和墨尔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一边讲着中国淘金工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友谊历史，一边又从书橱里拿出两本英文本的小说，送到我面前，说：“这是丁玲和老舍的小说。我很喜欢丁玲的小说。”

我不认识英文，对小郭说：“你看看，这是丁玲的哪一部小说。”

小郭看看书名，告诉我，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我便对沃腾说：“我开始学习写作时，就读这部小说。它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很喜欢它。”

一谈到作品和作家的生活，我们的谈话格外投契，格外亲切了。他说：“我有一位老朋友，推心置腹的朋友——马歇尔。……”

我一听说马歇尔，忙插上一句：“马歇尔的小说，我看过，有中译本。”

他接着说：“我本想约他一起和你们见见面，谈谈心，很不巧，我打电话给他，他进医院了。”

“是病了？”我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他慨叹一声：“唉！他的身世很惨。写了一辈子小说，出了好多书，如今年老了，唉！年老了，儿女都不问他。一个人，孤单单的一个人，只有住进老人院。”

我又问道：“老人院有人问吗？”

他说：“老人院是政府办的，属于慈善性质。那里有医生，有护士，生

了病，总还有个人照顾。”

我们从两国文学现状谈到作家生活，从开展笔会活动谈到如何加强两国作家的交往……谈了很长时间。当我提出告辞时，他仍依依不舍，又邀请我们到他的花园里，欣赏他亲自培植的各种花草。后来当我们走出他的家门，在他的门前与他合影时，他建议我看一本书，这本书是写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淘金的事情。我问小郭大使馆是否有这本书，小郭说她看过，有这样一本书，名字叫《中国来的淘金者》，作者是香港人，但有一半欧洲人血统，名字叫吉延斯，是位女作家。沃腾还表示。他要向写澳大利亚历史的人提出建议：写到墨尔本的开拓与建设，应重重地写上中国人一笔。在我和他握手告别时，他与他的夫人，同声说：“遗憾的是，我们相见太晚，交谈的时间太短。”

我说：“时间虽短，我们之间的情谊却是深厚的。”

“我经常想能到中国旅行一趟。”

“但愿我们能在中国再次相见。”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缅怀祖国

飞机，从堪培拉到墨尔本，再由墨尔本转航阿得雷德，总共航程，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到阿得雷德正是午后，天气非常炎热，走下飞机，好似猛一步跨进淮北农村的烤烟房，连那水泥地上都喷出热流，直往怀里冲。

从飞机的舷梯到出口处，满算也不过二百来米的路，我艰难地走着，从头到脚都沁出汗珠。我想是因为我穿的西装，太厚。

我一边擦着脸上汗珠，一边走出出口处，这时，只见一位袒胸露臂的女士，好像一只百灵鸟似的叫着，展开双臂，向我猛扑过来。

起先，我还以为她是一位西方女郎，见面了，她却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个中国人，她的名字叫：陈兆华。

由于连续几天的旅行生活，再加天气闷热，我的心脏不大适应，在飞机上已有点不舒服，到了旅馆里，虽是有了空调，仍感到头晕目眩，连挪动一下也感到是负担，当然更懒得去招待客人了。她倒像主人似地问我了：“我们喝点什么吗？威士忌？啤酒？橘子水？汽水？咖啡……”

我一手托着额角，抬起眼看看她，道：“什么也不想喝，只想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她便走到冰箱前，说道：“我可得喝一点，嘴早都发干了。”边说边自己打开冰箱。

她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而且也是非常会说话的人。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说道：“半月之前我就打听到，你们三个人要来阿得雷德。今天，不，是昨天，我向外交部问，你们什么时间到，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到机场去接你们，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到机场去接你们。”

听她口气，好像与我们三人之间某一个人很熟悉似的。我问道：“你回过国吗？”

“我前年回去的，北京，上海我全到了，就是没有去你们安徽。”

“安徽有世界闻名的黄山……”

“黄山！黄山归来不看山。看了黄山，澳大利亚就没有山了。”

“山还是有的，不过矮了一点。”艾明之在旁插了一句。

我便将话题转到上海，问道：“你们在上海见过面吗？”

陈兆华道：“没有见过面，我读过《火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我也读过，还有你的《风雪》。”

她这么一说，我便明白，她不过是读过我们的作品，并不认识我们，便说：“很抱歉，但愿你不要中毒。”

“你放心，我是不会中毒的，因为我没有看出它的毒在什么地方。”

“不是毒草，也许是一棵莠草吧。”我又补充了一句。

“当时我们学校，都在批《风雷》。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别人越批评我越是要看，两天就把它全看完了。”

“这么说，当时你还在国内？”

“我怎么不在国内呢？我是在国内上的学。当时还是红卫兵小将哩。”

“那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我来的时间可长了，1970年就来了，因为父亲是华侨，看国内武斗，不放心，就把我接出来了。我们一家都在阿得雷德大学。我在阿得雷德大学任教，丈夫在阿得雷德大学图书馆工作，一个男孩在大学读书……”

当时，我们的住处人很多，有的是华侨，有的是从国内来的留学生，都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一点国内情况，尤其文艺界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国外，所能知道的情况，全是从海外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有一些消息是很不真实的，有一些又真假难辨，这就更引起他们对国内事情的关注。他们要询问的许多事情，我们当即都作了回答。虽然回答得简单一点，但是，他们都很满意的离去，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回答是真实的。

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的前一天晚上，出了一个笑话。艾明之和我讲，有个华侨已来好几次电话，一定要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我们便接受了邀请。下午5点，我们从曼南村回到阿得雷德，一位华侨已在旅馆里等着，我们连脸也没来得及洗一洗，就忙着又上汽车。我刚刚坐上汽车，又来了一辆车来接我们。我便问艾明之道：“你怎么一个女儿可以嫁两家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搞了半天才把事情弄清楚。这两位华侨，一名姓郑，一名姓许，祖居全是广东，我和从维熙不懂广东话，艾明之自称是老广东，因此，凡是说广东话的朋友拜访或电话全由他出面接谈，郑、许两个姓，他弄成一个人了。既然两家全来接了，我们三人只好分开，艾明之和从维熙跟郑显威去，我和翻译郭贵芳到许志诚家去。

许志诚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一早上跑到二十多公里之外的地方把他的母亲接来，还有他的亲戚和朋友，找了许多。这一晚上，我们不是在吃酒，而是在谈祖国。每个人都是在谈自己，在谈自己的童年，在祖国受过什么教育，游览过祖国哪些名胜古迹，从桂林山水，到苏、杭二州，对祖国一草一木，都历历如在目前。

也是在阿得雷德。一天，我们在银龙酒家午餐，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拿着一个凳子，坐到我们身旁。她自我介绍说，她叫邝志忠，出生于广州，也在广州上的小学，还当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如今成了银龙酒家老板。她再三向我们提出，要请我们到她家去作客，由她亲自做一次家乡饭招待我们。我们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只好答允在我们离开阿得雷德这天，上飞机之前去她家。

我们所以答允去她家，只是表示盛情难却，并没有想要她招待我们。哪

知她得到我们的应允，头一天便和弟弟，还有弟媳妇在家忙开了，连夜亲自做好鲍鱼鸡丝粥，烤鸭，沙河炒面等等，在家等着我们。我们问她为何要为我们这么忙碌与花费呢？她回答得非常简单，是出于对祖国的怀念。她认为我们能到她家去作一次客，就等于她回一次故乡。

我说：“你在这里混得还不错嘛。”

她说：“从物质上说，我们是不错。我在阿得雷德开了银龙酒家，我的先生在墨尔本也开了一个饭店。我们两幢很漂亮的洋房，有游泳池，有娱乐室，坐在家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欣赏各国的舞蹈、音乐和风光，但是，我的心仍在祖国，思念祖国，思念乡亲。因为那是生我、哺育我的地方。”

还有，我们到了墨尔本，我一看日程表，有“王大卫宴请”一个项目。我便问翻译：“王大卫是什么人？”

翻译告诉我，王大卫是墨尔本一个顶大的华人财团的名称。王大卫的父亲是江苏海门人，于1948年到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市中心开一个工艺品公司，墨尔本的工艺品全由他独家经营。

王大卫本人，在两年前已去世，现由他的夫人继任董事长，她的大儿子王兴卿在经营总公司业务，下边还有八个分公司。

王兴卿亲自来接我们，并与他的母亲，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弟等等，陪同我们参观他的公司门市部。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名的工艺品，在他的公司里都能看到，也都能买到，在门市部陈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工艺品，从小小的竹筐到地毯，从草麻织物到玉雕，应有尽有……。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他们母子的讲解。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讲解并不是为着向我们做广告，而是要我们知道，他们对祖国是多么热爱和怀念！

到了昆士兰，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六十多人的欢迎宴会，也不是在宴会上那些部长与上层人士为着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讲的很漂亮的祝酒词。而是在宴会之外的华侨，不管走到哪里，所碰到的华侨，无一不把我们当着亲人看待，他们的千言万语，最后都归结到一句话：缅怀祖国！

到了悉尼，崔更生总领事约请我们便餐，我问他：“你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对祖国的情感是如何的深厚吗？”

他说：“我们都很了解。要算华侨，在澳大利亚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华侨已入了澳籍了，只能称为华人，但是，他们虽入了澳籍，心还是向着祖国，怀念着祖国。你不管走到哪，他们成立的团体，挂的牌子，还是‘华侨社’或者叫‘华侨联谊社’。”

说来说去，得出的结论，仍是四个字：缅怀祖国！

澳洲之绿 ——访澳随想之一

从维熙

我喜欢绿色。

盛夏时，当我穿过滴青的梧桐林；严冬时，当我凝视着流翠的松柏，心中总是荡起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和快意。尽管，绿色在美术家的调色板上属于冷色；但那浓绿、淡绿、葱绿、嫩绿、水绿的色彩，仍然是城市最好的美容大师。

此次，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尤其感到了绿色的珍贵，并且从中受到启迪。我国阳春三月，正是那里的秋天，但澳洲的几大城市：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阿得雷德、布里斯班仍然在大自然的绿色包围之中，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的任何方向漫步，都跨越不出她绿色的怀抱。

由于澳大利亚的城市已然完全被绿色所覆盖，“禁止践踏草地”的藩篱早已取消；相反，绿色的草坪还常常成为人们狂欢的场地。我们去参加的澳大利亚“艺术节”，在阿得雷德的大草坪上开幕；就连“作家周”开会的会址，也不选择在礼堂的大厅，而是在绿草如茵的多伦斯河畔，搭起几座彩色帐篷，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青青的草坪上开怀地畅谈。绿色，不但给“艺术节”和“作家周”增加了奇异的色彩，一扫阁楼中交谈的沉郁暮气；而且，使人感到这是在充满诗意的绿色中探索诗；在大自然的襁褓中探索着文学的美。因而，艺术在这儿找到了最美的舞台，它便于把每个艺术家的情感燃到沸点——这，就是绿色给予我的新鲜感受。

我曾就这个问题，和澳大利亚一个诗人攀谈过。他诙谐地说：“花草太多，也有副作用。就拿首都堪培拉来说，每到草绿花红时节，市民就闹一种叫‘花粉热’的流行病。由于在草坪上种的花儿太多，空气中弥漫着的花粉气太浓烈了；使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不断流鼻涕、打喷嚏。可是我们宁愿接受这样的惩罚，也不愿意减少城市中一点点绿色。因为绿色不但可以美化城市，而且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我们走访澳大利亚期间，不但发现城市很重视绿色的装点，就是在乡镇也很注意播种绿色。在阿得雷德远郊的南曼中学，我们发现了淹没整个校舍的人工草坪。校长泰勒先生告诉我：“绿色不仅可以陶冶学生心灵，而且代表着学校的教育文明。我们非常珍惜绿色。”

是的，澳大利亚人是竭尽全力去保护绿色的。我们走访几大城市时，不但常常看见人们开着剪草机修剪草坪；在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一块草坪上我们还看见几个孩子玩完了澳洲式的手脚并用的足球之后，把他们吃过的面包纸、罐头盒都一张张一个个地从草坪上捡出来，扔进垃圾筒。在阿得雷德“艺术节”开幕的夜晚，我们和几万名澳大利亚人坐在草坪上，观看意大利艺术家的演出；我们身边几个澳大利亚青年，一边看演出，一边喝啤酒、吃柑桔。但当午夜散场时，这些年轻人不忘把酒瓶、桔皮……带出草坪。我想：这也许是澳洲之绿常青之故吧？！

澳洲神话 ——访澳随想之二

从维熙

参观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的当天，适逢悉尼大铁桥过五十岁的生日，汽车一律不许从铁桥上通过。在蒙蒙细雨中，汽车拉着我们绕桥而行，使我们有机会观看了悉尼城市的宏伟建筑和悉尼现代化大型海港的奇丽景色。车上的澳大利亚朋友告诉我们，一百九十多年之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能有今天的面貌，应该感谢“澳洲之父”。

我们对这个词儿感到新奇。他告诉我们，远在三万年之前亚洲的土著人迁到澳洲，他们对澳洲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多是过着原始的生活。这是澳洲的远祖。澳洲的现代化进程，则开始于 1788 年的 1 月 26 日。那天，一个由 11 条船组成的船队，抵达了亚各逊港。带来 700 多名囚徒，余下的不足三百人是押送囚徒的英国水手和士兵。英国当时所以把这些囚徒运到荒芜的澳洲大陆，不仅仅因为在美国独立后，英国失去了偌大的殖民地；而且也由于英国泰晤士河上的监狱船只过分拥挤，因此责令船长阿瑟·菲力普给囚犯们寻找服刑的“乐园”。自从寻找到这块“新大陆”后，不少英国移民来到澳洲，英国继续把大量囚徒，飘洋过海运往澳洲，让他们在这里谋生。后来，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发现了金矿，于是中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日本、德国、南斯拉夫，玻利维亚等国的劳苦人民，闻讯纷纷远涉重洋而来。这些人成了开发澳洲的元勋，创造了澳洲的富有；这中间，还有中国人的一份功绩呢！

听起来，这很像个神话，但却是澳洲崛起过程中的事实。在堪培拉，《半球》杂志主编亨德森先生请我去他家做客时，他就曾说过：“中国人聪明、刻苦、勤奋，我们早就从澳洲发展的历史中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很早就是朋友了。”在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布莱尼在为我们举办的午宴上，举着酒杯向我们祝酒时说：“中国朋友是我们最欢迎的客人，因为这块土地上，也有你们的父辈人的血汗和足迹。”

澳大利亚人是珍视创业者们的遗迹的。他们尊重历史，对谱写了澳洲“神话”的囚徒和各国来的移民，常发怀古之幽思。在墨尔本、悉尼……等大城市，除有中国式建筑的唐人街之外，在摩天大楼脚下，还保留着古老的有轨电车；在无人管理的现代化电脑银行之旁，舍不得拆掉淘金者住过的古老房舍。在和澳洲大陆隔着巴斯海峡的塔斯马尼亚岛，保留着岗楼陡立的监狱遗址，甚至在离霍巴特不远的古老的村庄，还完好无缺地保留着由囚犯们建起的拱桥。在阿得雷德远郊南曼中学的美丽校舍中，我们对一幢和时代极不协调的石砌房屋感到不解。泰勒校长告诉我们说：“这座石房离现在有一百多年了，是德国来的淘金者住过的房子。我们从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搬来，再按照原样盖在这儿，以不忘这些澳洲之父——因为没有他们的创业，就没有今天澳大利亚的‘神话’。”

澳洲之觅 ——访澳随想之三

从维熙

在澳洲的 21 天的访问中，我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寻觅着澳大利亚的民族灵魂；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崛起的独立国家来说，这是比任何物质财富，更值得珍贵的东西。

之所以引起我的这个联想，是受到了一件事情的启发：我们刚抵达澳大利亚的第二天，在堪培拉市旁听了高等法院审理的一桩案件后，刚刚走出法院的大门，陪同我们参观的澳大利亚朋友，诙谐地指着草坪对我们说：“就在这儿，英国女王种了一棵小桉树，当天夜里就被人偷走了。”“为什么？”我有点惊愕。“可能是出于对女王的膜拜吧！”

从这时起，我就开始寻觅澳大利亚真正的灵魂了。记得，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奠基人——作家亨利·劳森，曾用那只饱蘸着浓情的笔，唤醒澳洲的民族意识，从而使亨利·劳森的名字，传出澳洲，走向世界。我不能理解，在这位作家已经作古了几十年的今天，还有人信奉“图腾”。

我曾就这个现象，求教于很多澳大利亚朋友。我说：“澳大利亚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但是，能不能这样解释：偷桉树的现象，比经济上的扒窃更值得深思？”

澳大利亚知识界的朋友们，对那个偷桉树的人是鄙夷的。他们叫我们去看一部叫《加利波里》的电影，并告诉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见澳洲人的灵魂。这是一部由彼德·韦尔导演、轰动了全澳洲的电影，影片描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英国派去强攻土耳其阵地一座悬崖陡壁——军事要塞加利波里时，导致一万多名澳洲青年牺牲了性命的历史故事片。影片用鲜血筑造成史实，向派遣澳洲青年攻打“加利波里”的肇事国，提出了抗议。影片拍成在 1981 年，历经八个月的放映，盛况空前，至今观众仍然不断向我们推荐《加利波里》。由此，我似乎抚摸到澳大利亚的脉搏，睨见澳洲人的民族精灵了。

澳大利亚人民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是牢记不忘的。在克里斯菲大学门口，一个学习东方语言的澳大利亚女大学生，谈起《加利波里》时，激动地说：“这是我们独立的澳洲的最大耻辱，至今，每到四月，我们还纪念这个难忘的‘死亡节’。”

我想：这就是澳大利亚觉醒的民族之魂吧！因为在克里斯菲土著人的博物馆里，我曾看见一棵古树根刻成人像的神——图腾。讲解人员对我们说：“这是过去远古澳洲顶礼膜拜的偶像，这个年代，在澳洲正在宣告结束。”

澳大利亚的红心

宗 璞

璩玛有个小小的习惯，怕下楼；因此当然也不能上楼。我们在阿丽思泉古斯艺术馆的圆厅里走着，见厅中心有一个螺旋形的小楼梯，梯侧有小喷泉，暗红色的灯光照着喷洒的水珠。我请她到厅边小坐，不要陪我上去。她说到上面就可以看见这个艺术馆的主要内容。她用了一个字，我一时想不起那英文的意思。“上去便知。”我想。

跨过暗红的喷泉，缓缓上到梯顶，我不觉吃了一惊。我怎么忽然来到了澳洲中部的荒原上、旷野间？苍凉而豪迈的中澳大利亚景色，扑向我眼前，这样辽阔，这样一望无际；又这样寂静，这样无动于衷，只有远处小小风车给人一点动的感觉。似乎时间也被这豪迈苍凉羁留住了。那一直伸展开去的原野，直到天边，看不见了，却又明知它还在继续伸延，简直使人想赶过去看个究竟。在棕褐色，有的地方是暗红色的原野上，铺缀着一丛丛灰白的草，一丛丛暗绿的榛莽。再高一些是那一对称为孪生兄弟的橡树，它们真像彼此的影子。最高的植物是一株尤加利树，它那灰白的树皮，显示着充满了生命力的筋骨。天地交界处有一段远山，又有一座淡蓝色的平顶山，像一个倒扣的长盒，后来知道它的名字是考诺山。又有一座稍长的，一端扁平的浅棕色的山，后来我知道那便是世界最大的独石，艾耳石。

我循着楼栏走了一圈，才悟出那英文字义是全景画。这画面形成一个圆圈，观画人站在中央。近处 20 英尺的泥土植物全是实物，连接着 20 英尺高的画面。画面不但集中了澳大利亚的有特点的景物，还画出了那原野的苍郁混沌的神情，使人不觉大有“天地悠悠”之感。

次日我们乘车行驶在真正的澳洲内陆原野上，离艾耳石越来越远，这种“天地悠悠”之感也越来越强烈。车行几个小时，眼前总是莽苍苍一片。忽然远处出现了那淡蓝色的考诺山。以后我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它总是保持着那淡淡的蓝，虽然远，却很分明。走着走着，考诺山不见了。太阳没遮拦地照着，蓝天亮得耀眼。地下的草格外灰白，榛莽的绿显得格外干涩。而路呢，不知何时起，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如果不是亲眼得见，实在难以想象土地能红到那样地步。这红色在那全景画中并不突出，大概是要留给人自己捉摸吧。于是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草是白的，路是一味地红。风吹草低，便是原野的活动，便是原野的声音。

我拿出“罗吉的地图”，想看看行程远近。罗吉是气象学家，是璩玛的儿子。在悉尼那几天，都是他开车。离开悉尼时，他送了我这份地图，还有一个复活节巧克力兔。他对璩玛极为体贴关心，总是在她需要时及时出现。“这样孝顺儿子不多了。”璩玛常说。我也为她高兴。

罗吉的地图告诉我们，艾耳石有 3.2 公里长，2.4 公里宽，335 米高。艾耳是一个人的名字。1872 年最初来到这石山的欧洲人取此名，艾耳本人与这石山并无关系。这里原有土著，现在都迁往别处了。他们有蛇人的传说，山的阴阳两面有两种蛇，后来成为两个部落。我不禁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龙，其实也是由蛇图腾演变来的。看来在远古时代，蛇的势力不小。

我们到了。艾耳石从近处看如同一匹趴卧的大兽，棕色的纹理好像大象粗糙的皮肤。石山上有好几处洞穴，有的洞中有简单的原始的画，都保存得

很好。头一天在阿丽思泉，璩玛曾请一位研究土著生活的英国朋友来见，他对他们的画很了解，圈圈点点，曲线直线，都有意义，都在诉说一个故事或一种感情。只是有些内容他们不愿人知，他也就闭口不言。在他那里见到一些画，圈、点和线的形状、颜色都很和谐，倒有点像当前抽象派的画。

节目中有一项是观赏艾耳石变换颜色。我们清早出发，登上一个沙丘，东张西望。向东看日出，向西看石山的颜色。石山在黑暗里黑黝黝的，黑夜渐渐淡去，石山逐渐显出棕色的皮肤；朝阳在天边涂抹着彩霞，石山在不知不觉间也涂了一层桔红色。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一刹那，据说石山会像着火一样通红，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见到这奇观。又因为东张西望不能兼顾，对两边似乎都无多少心得。从沙丘上下来，璩玛笑道：“走了几万里路，临了石山不变颜色。”“总得把最奇物的留给想象。”我笑答。其实眼前的景色已经够奇了。在灰白和暗绿相间的原野上，破开一条鲜红的大路，向石山缠绕过去。远处虽有总是那样蓝的考诺山和另一座奥尔加山，近处的艾耳石却显得这样大、这样孤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抛掷在这里，遗忘在这里。它像澳洲一样，终于被发现了，而且成为胜景。我记起 T·哈代所著《还乡》的第一章，“一片苍茫，万古如斯”。那描写伊登荒原的文字是多么美——还有那红土贩子。现在科学发达，当然不用红土染色了。

“这路，这土，多么红……”我喃喃道。

“这是澳大利亚的红心，”璩玛说：“澳大利亚的红心欢迎你。”

红心两字并非璩玛发明，在导游画册里便是这样说的。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坦露的红路，真像敞开了赤诚的胸怀，那是人民友好的心愿。我向她感谢地微笑，默默地俯身抓起一把红土。原来在土著的许多美好的传说中，确有红土染身的故事。说是在世界尽头住着一个女人，她的职责是早晨点火照亮世界，晚上熄火让万物安息。在点火与熄火时，她都要用红土装饰自己。红色反照在天上，便成了朝霞和落日的绮辉。

我们沿着红色的路，下午便返回阿丽思泉。在渐渐合拢来的暮色中，西天却逐渐明亮，越来越红，很快就成了一片通红。红云上压着一层层灰黑的云。这里没有别处落照的千百种颜色的变幻，整个天空，只有红与黑两种颜色。红云真像在天上烧着大火，因为天地是这样无边无际，火也烧得透旺，烧得恣意，从天的一端直烧到另一端。偏又有层层黑云，有时在红云上压着，有时在红云下托着，更显出那壮丽的通红来。通红的天连着通红的地面，仿佛从地面上也在升起红云。真使人感到一种浩大、神秘的力量。大概是那世界尽头的女子在撒扬红土所致吧。

车上几个小孩在说儿歌：“彼吉博吉胖墩墩，拉着女孩们不住地亲；一伙男孩来游戏，彼吉博吉跑开去。”在清脆的童音中忽然发出一声赞叹，璩玛说：“看那边！”和通红的西天遥遥相对，在草莽中升起一轮明月，月轮很大，染着淡淡的金黄，默然俯视着这原野。我忽然想起内蒙古草原上大而圆的月亮。不也就是这一个么？它冷眼观看了亿万年来地球各处人类的发展。不知地球上何人初见月，也不知月亮何时初照人。人的智慧发展到今天，月亮本身的奥秘也已让人探得去了。

日落的壮观持续约一小时，夜幕终于遮盖了一切。路边的地灯告诉我们已走上柏油路，红土的原野越来越远……

“告别了，澳大利亚的红心。”我在心中说。我已从自然景色中苏醒过来，和车上的旅客攀谈着。旅客来自澳大利亚各阶层，也来自世界各地。谈

笑问，我也学会了璘玛小时候就在说着的儿歌：“彼吉博吉胖墩墩……”

其实我虽然离开了那红色的原野，却并未离开澳大利亚的红心。牧场上，大学里，繁华的大城和清幽的小镇中，到处都遇到热心朋友。南澳大利亚的库诺本小学特地赠我一把银色的小勺，柄上有校徽，盒底写着：“请冯女士用它的时候记住我们，并请转达对中国小朋友的友谊。”

访问小学校时，我被安置在大沙发上，孩子们围坐在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校长科博狄克先生多才多艺。他手弹吉他，领着孩子们唱欢迎歌。我讲我自己的古老伟大正在建设的国家，讲了我们小学生的一天的生活。应校长之请，我也讲了《露珠儿和蔷薇花》这篇童话。我很怀疑我的自译能否达意，孩子们却专心地听。讲完了，一个孩子举手问：“那朵蔷薇死了？”“骄傲的蔷薇死了。”我不无伤心地答。

校长让孩子们自由发问，空气很是活泼。问题一个接一个：“中国最高的山？”“中国最长的河？”“中国的牙膏是什么颜色？”“你有多少岁？”我也问他们，问他们的志愿。几乎人人都举起小手。有的要做农民，有的要做理发师；有的女孩愿意做护士，愿做家庭妇女；有的男孩要做警察，要开飞机。只有一个孩子要做科学家，没有人愿当教师。

“如果你几年前来，会有许多孩子要做教师。”校长说：“近来教师失业的很多。”原来澳洲人口增长率趋于零，孩子少，需要的教师也少了。

“不管做什么，”校长又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用的、快活的人。”

临别时，校长从墙上取下两张图画送我。一张是个黄色的小人，那是海盗；一张是用拇指按出来一个个指印，组成一棵树。我想起澳大利亚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一本书名《人类之树》。在人类之树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尽管有种种不同，都该在自己可爱美丽的国土上辛勤劳作，发展兴旺，并且互相友好往来，使这棵大树根深叶茂，绵衍久远。

面对着这张天真的画，不禁又想起罗吉的地图，想起养猪人餐桌上丰盛的糕点，想起明史教授雨中送别，想起每天看着表为我煮鸡蛋的退休老船长……当然，还有代表澳中理事会接待我的璘玛那充满了关怀、作出细致安排的亲切的声音。虽然我免不了常请她重复一次，奇怪的是，我总不觉得她说的是外国话。

还有那奇特的剖露着红土的原野——澳大利亚的红心。

班机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飞行。渐渐地，穿过云层，降低了飞行高度。我斜靠舷窗，看一看陌生的南半球大地。展现在眼底的，是碧草如茵的广阔牧场，蜿蜒如带的河流和公路，显露红褐色斑点的丘陵的山岗和低矮的农舍。渐渐地，看到了海湾，看到了湛蓝的南太平洋。接着来的是大城市上空特有的暗黄的尘雾，透过尘雾的空隙，是林立的高楼，密密麻麻的街道。飞机急速下降，悉尼到了。

“好漂亮。”我自言自语地称赞一句。

我的邻座是一位从香港来的经纪人。他经常往返于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是这国泰航空公司班机的常客。悉尼对他已是司空见惯，但他要对我这位北方来的同胞表示一点关切，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淡淡地说：

“你能相信吗？这是个囚犯建立的国家。”

我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微微一笑，没有搭腔。这位先生的话有一点点历史依据，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且可能由于在香港生活久了，多少还接受些英国人传统观点的影响。

是的，二百年前，世上人对南太平洋中这块奇异的大陆是充满神秘感的。在英国人踏上这块土地以前，好几个国家都有人说曾经在航海途中看到过它的影子。但是说来说去，在人们心目中，那是一个近于蛮荒的世界，没有可耕的土地，没有可以使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野草丛生，爬虫遍地，其中若有人迹，也仅是茹毛饮血的黑色土著。而当时，英国已经发明蒸汽机和织布机，法国的卢梭已经完成被恩格斯认为有辩证法思想的《民约论》，德国的歌德已经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国的曹雪芹也已写出《红楼梦》。

1770年4月的一天，一艘远航船犁开太平洋的波浪，驶近澳洲东海岸，登上一座杳无人迹的小岛，从此结束了这个神奇大陆与世隔绝的历史。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陪我凭吊了这座小岛。它坐落在悉尼南边15公里的植物湾(Botany Bay)。与其说它是座小岛，不知如是一块大岩石更恰切些。这就是当年库克船长(James Cook)最先靠岸的地方，现在成为纪念地和旅游点了。人们来到这里，自然会将遐想投向200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4月17日，库克上校和他率领的远洋航船结束在新西兰的探险和对日蚀的勘测，准备返航回国。可是风向突然变了，吹斜了航船的方向，将他们送到一个小小的港湾。同船的科学家班克斯爵士(Joseph Banks)在日记里记着：

“……黄昏时分，我们在港湾北部一个小岛上登岸，打算寻找一些贝类。”

他们并没有找到太多的贝类，却找到一块大陆，一块可以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相仿佛的新大陆。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天是澳洲新纪元的第一页，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者的眼光。即使没有这一天，没有库克船长和班克斯爵士这艘船，世界终久也会发现澳洲的。澳洲并不是人类绝迹的荒岛，它那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但是，无论如何，1770年4月17日这一天，总还是值得纪念的。所以在小岛上至今还立有一块碑石，刻着班克斯

爵士那段日记。日记作者还写道：

“四野碧绿葱翠，树木丛生……还有大片的青草地，泥土夹有洁白的细沙……”

他们发现了原来认为不可能孳生的植物，就把这个小小港湾称为植物湾。班克斯再一观察，似乎还可以种水稻，栽果树，甚至还可以成为优良的牧场，不禁大为惊喜。本来，库克上校临离开英国前，就奉到一纸密令，要他相机寻觅太平洋中那个传说中的大陆。现在终于意外地找到了，于是他们将详细勘测后的一块土地，命名为“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les）并且正式宣布它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属地。澳洲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此后十多年中，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中的属地，仅仅成为英国植物学家科学研究的领域。路途太远，船只一去一回差不多就要耗费近两年时间。一般人简直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了。直到1787年，美洲独立了，英国政府再不能按传统将囚犯流放到新大陆去，国内监狱人满为患，于是想起这个遥远的“新南威尔斯”。殖民老爷们认为那块土地面积大，离英国本土又远，既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又不用担心犯人逃逸，岂不是上帝所赐的一个理想的“流刑殖民地”？那年5月，海军上校阿瑟·菲力普（Arthur Phillip）率领由11艘船组成的船队，号称“第一舰队”，从英国启程，浩浩荡荡地开到澳洲来。船上载有700多名囚犯，还有两百多名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共1475人。他们呆呆地望着滚滚浪涛，神情忧郁，心情沉重。既不知道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更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返回英国。“第一舰队”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航行了8个多月，才于第二年（1788年）1月26日到达植物湾附近的杰克逊港登岸，在那里插上英帝国的国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悉尼城。当时，包括费立浦船长在内，谁也不曾想到日后会在这儿建立一个国家。1月26日这个日子（在南半球，正是赤日炎炎的夏季），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的建国纪念日。

现代的澳大利亚人，比如我在这次旅行中所结识的朋友，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作家、记者、艺术学校教员、大学生到出租汽车司机、失业青年，包括陪我到植物湾游览的那位青年朋友，谈起这一段早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澳洲的历史，他们倒都不讳言那些囚犯和殖民者的祖先，也不隐瞒早期屠戮当地土著的血腥史实。

有一位教授说过：“坦率说，我并不认为最早来澳大利亚的囚犯都是凶恶的坏人。你知道英国过去的法律是极其苛严的，甚至到暴虐的程度。偷一点小钱、偷一片面包，都要定刑的。有些人为了吃饱饭，干了触犯刑律的事。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另一位记者说过：“有些囚犯在澳洲受到的待遇，比在英国本土还严酷得多，塔斯马尼亚岛上有个亚瑟港，那里还保留当年拘押囚犯的牢狱，关在那里的，据说是案情最重的犯人。牢房里陈列着铁镣、铁链和各种刑具，牢房外面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外边，那时候这条小路由许多恶犬把守着，谁想逃走，只有一条死路。”

还有一位作家对我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些英国皇家军队怎样屠杀澳洲土著的事实。土著们的外表会使你大吃一惊，但他们的性格是善良的，从不主动地伤害外来人。对他们开枪，实在是残酷的、可耻的，是我们澳洲历史上极不人道，也极不光彩的一页。”

无需这位朋友详细描述，我完全相信他这几句最简练而又包含丰富内容

的话。

比较起来，澳洲朋友愿意更多谈的，是早期的开发者们的事迹。因为 50 年后，到 1840 年，向澳洲流放囚犯的制度便已废止。陆续从英伦三岛远渡重洋而来的，是所谓的“自由人”。当他们靠在远洋轮上凭栏遥望东方时，大多数人都充满了欢乐的幻想，好像那个神奇的澳大利亚是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只等自己去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装满了。不料一上岸，一住下来，就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是陌生的，崎岖的，而且是神秘莫测的。他们渐渐发现，这块土地并不像班克斯报告中描写得那么美妙。气候炎热，空气干燥，雨量少得惊人，山峦是光秃秃的，岩石上像火烧过似的寸草不生；河流是干涸的，龟裂的土地像渴倒的野牛躺着直喘气。有的鸟叫起来使人毛骨悚然，有的鱼怪得使人不敢吃它。

这样的天地，人怎么生活下去？

大约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吧，人类总有一种非凡的适应力，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回头的路已经断绝了，要想生存，除了咬紧牙关、埋头苦干以外，连上帝也不曾为他们准备第二条路。

开拓者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终于赢得向澳洲大陆自然界艰辛搏斗的第一个回合。

以后，发现了煤矿，培育了西班牙种绵羊，英国纺织厂里开始用澳洲羊毛。正赶上英国产业革命的浪潮，到处呼吁原料，澳毛成为十分吃香的物资，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奠定自己的地位。以后，又培育了乳牛，种植了小麦和甘蔗。到 19 世纪初叶，金矿的发现兴起了连续几十年之久的淘金热。“到澳洲发财去！”成为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成千上万的人流从英伦三岛涌向澳洲：雇工、技师、医生、会计员、教师、乡村小作坊主，以致无业游民。从 1851 年到 1857 年 7 年中，就移入 40 万居民。19 世纪中叶起，30 年中，澳洲人口由 100 万猛增到 300 万。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80 年来，它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工业交通不断发展，矿产资源不断发现和开采，新的城镇不断建立，终于使世界对它刮目相看了。

我漫步在植物湾头，望着南太平洋的万顷碧波，想象那位库克船长当年冒险上岸的光景。突然又想起前几天在墨尔本菲兹瑞公园曾经参观过这位船长的故居。他的故居本应在英国约克郡的灰堤贝，怎会到墨尔本来呢？原来是澳洲人为了永久地纪念这位 200 年前发现这块土地的人，就商请上校家乡的政府，将他故居那座小屋，整个儿搬到澳洲，让船长从此定居墨尔本。小屋的每一块砖瓦木料，包括铁钉、螺丝，一点不漏地从原地运来，再照原式原样重建。据说屋前攀搭着一株常青藤，也是库克船长少年时常常抚摸的旧物。后代的澳洲人，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

我们离开植物湾，驱车回悉尼市区，过了那座被人戏称为“大衣架”（因为它外形很像一只硕大无朋的衣架）的大铁桥，就进入市中心区。从荒寂的海滩小岛回到繁华嘈杂的高楼群中，好像一下子穿过了 200 年的历史风雨。海涛声，呐喊声，呵责声，鞭打声，野兽咆哮声，碎石铺路声，篝火毕剥声，第一列火车和铁轨的撞击声、港口轮船的汽笛声……全都交织在一起。囚犯的呻吟，开拓者的叹息和祈祷，被当代澳大利亚的谈笑声所淹没了，也许真的只有植物湾那个小岛，还有那位记者说的亚瑟港的牢狱遗址，还残存一些 200 年前的痕迹，其他都不复存在了。我在悉尼、堪培拉、墨尔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现代化的物质文

明，也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即使赛马、夜总会和激光游乐场，也无一不具有现代的声光色彩。古老的艺术进了博物馆，古老的装束和家具成了店家招待顾客的广告。比如前天同两位新闻界朋友一起吃饭的水上饭店，那布置宛似一艘海船，进门上楼，就进了货舱，堆着木箱、粗麻绳和好似正要卸下的麻包。桌椅、船栏都用竹木和棕绳，侍者都穿着白衫黑裤的海员衣，连菜单都印在古拙的薄木片上。若不是楼下有电子音乐声和来往的小轿车声，你会以为是在一艘十九世纪初从欧洲来的远航船上。人们到这里，并没有丝毫的怀旧之情，纯粹是由于新鲜，就同他们走进一家日本饭馆或土耳其浴室一样。

是的，现代的澳洲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祖先，那些胼手胝足、艰苦创业的开拓者。但是他们想得更多的却是今天和明天。当别人问起他们的家谱时，他会告诉你前几辈来自苏格兰的什么山什么河，或是英格兰的什么郡什么村。如果你不问，他们也就绝口不提。要说，就是：

“我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

我在好几个宾馆的小卖部和商店、市场里，都看到出售一种汗衫，上面印有澳大利亚的地图轮廓，还有一行字：

“ I Love Australia (我爱澳大利亚)！”

这就是当代澳洲人的心！

“穿针眼”的外国人 ——记澳大利亚青年汉学家白杰明

陈明仙

5月中旬，丁玲同志率作家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行前，澳方送来访问日程，附带提到，此行陪同是GEREMIE BARME。熟悉他的一位青年翻译嚷道：“他叫白杰明，在中国留过学，汉语好得没治了！”丁玲和陈明同志也认识他。1979年他拜访过丁老，随后写了三篇报道。由他来陪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觉得很合适。

上了飞机，发现诗人牛汉同志带有一本白杰明写的中文书，这可新鲜，便要过来看。原只以为他汉语说得好，倒没料想到还能用汉语写作。这是一本叫《西洋镜下》的集子，1981年香港初版，1983年再版，其中收集了作者1979—1981年初的50篇随笔和杂文。从书后的“新书介绍”栏看，《西洋镜下》（第二集）也已出版。1982年9月作者为第一集写的再版序中说道：“《西洋镜下》辑集发行已经一年半了。据出版者讲，居然有些珍惜‘异物’的人，虽曾看过劣文多篇，仍是甘心掏腰包自愿受‘二茬罪’。本来有人肯买这本小书已属意外之事，现在存书将告售罄，又要再度投胎，不免使我惊疑。”又说：“《西洋镜下》出版以来，承蒙不少评论家垂青。谈论它的书评都十分客气，也给了我很大的鞭策鼓励。”从文章的某些标题就可看出他的汉语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如《拿来而拿不到主义》、《养乎？杀乎？》，《‘知道分子’刍议》，《异样也是常态》，《时不再来》等等，对于一个在1979年时只有25岁的外国青年来说，这样的文学水平，应该算是很不错了。

翻下去，发现他对某些北京的土话，比我这个在北京住了多年的人了解得还多。例如我从他的书中才知道“事儿妈”，是对那些“多事”或“爱管闲事”者的称谓。

从书后的作者介绍和白杰明书中的叙述来看，他是德裔澳大利亚人，曾在堪培拉国立大学攻读语言与中国历史，1974—1977年来中国进修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然后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工作。1980年初开始在澳学习日语，10月后赴日本继续学习。看来他颇有语言天才，除英语是母语外，还学过印尼语、法语、德语、梵语、巴利语、拉丁语、汉语和日语。

飞机抵达悉尼，一出机场海关，就看见迎接我们的人中有个蓄着浓黑连腮短胡的青年人，他就是白杰明。开始因彼此不熟，或许由于腼腆，他显得有些寡言。我便主动与他攀谈，告诉他我们不仅已久闻其名，还正在拜读他的大作。他有点意外，说：“真的吗？”知道共事者了解他，他很高兴，话题自然就多了。

我们是根据中澳文化协定去访问的，在澳的两周里，每天由他陪着按日程活动，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彼此不拘礼节，相处融洽。

开始，我们还称他为白杰明先生，逐渐地也就不把他当外国人看待，丁老按中国习惯叫他小白，这样更顺口，我们就跟着叫开了。他对丁老尽心照顾，上上下下像对自己的老奶奶一样尽心。对我们几个身强力壮者，他又常给加点额外项目，如领我们去中国餐馆用餐。澳各城市中国餐馆林立，价钱又比吃西餐便宜。他本人也中国化了，跟着我们这些湖南人、四川人喝辣椒

汤，吃麻辣豆腐。

他希望从中国作家这里了解些中国文学和文坛的有关情况，但他绝不令人生厌地紧追某些问题不放。他健谈，知道的事也多，行车途中，丁老很喜欢同他聊天，谈些文坛掌故，间或也讲些外国人说汉语的笑话。

他说中国话不仅地道，有时还显得“油”了些，如谈到胡耀邦同志访澳，他说：“我们澳大利亚人很喜欢胡总书记的性格，他同我们霍克总理可‘哥们儿’了！”

他对学语言有兴趣，肯钻研，方法也对头。他在文章中写道：他上大学学汉语不到一年半，因厌于课程内容枯燥，请老师介绍一本语言不太难懂但比较可读的中文书，老师推荐了巴金的《家》。他硬着头皮，在几周内把全书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此后，他继续读巴金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在中国东北念大学时，他与一位日本同学经常表演相声，他们的表演颇受欢迎，成为压轴戏。以后，他就进而用中文写作。据他说，他写作的目的在于“练习外语（汉语）的表达能力，把平时爱说的俏皮话写成文字”。

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地广人稀，未受到大战的直接破坏，社会较安定，工作有保障，加上许多福利设施和社会保险，人民在生活上可说没有后顾之忧。这就养成澳大利亚人及时享乐的习惯，他们承认自己是享乐第一主义者。在这样的社会里，白杰明没有为物质和享受所动，他是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的人。

按他的汉语水平，如想当官，满可以弄个一官半职；如想挣钱，则可到某个公司或商社任职。但他只想做学问，至今仍是堪培拉国立大学的研究生，每月拿有限的奖学金，研究中国的丰子恺（兼及当时的中国文坛）。实际上，他的毕业论文唾手可成，之所以仍保持着目前的身份，主要是为了那种独来独往的自由。丁老戏称他为自由派，倒是很贴切的。他家在堪培拉郊区，占地宽广，他母亲在房子周围种了五百多棵树，他就在这清幽的环境里读书、翻译、写作。有了愿干的事，出来“打打短工”，如这次接待我们这类差使。就这样，他隔一段时间可来中国一次，接上最新的信息。这确是他善于创造学习条件的聪明之处。

显然，他对中国文坛的消息相当灵通，反应也十分锐敏。按他的观点和欣赏兴趣，最近以来，他翻译了杨绛的《干校六记》，高行健的剧本《车站》，甚至连张辛欣新作《北京人》也译了几篇。陪同我们期间，他还在抽空翻译吴祖光的京剧《三打陶三春》，为该剧在伦敦上演配字幕。上次来北京，他采访了电影《黄土地》的摄影师，写文章在香港推荐了该影片。

做学问的人，离不开书。他喜欢书，涉猎也较广。他在中国书店买到一本《贞观政要》，便引其中唐太宗的话（“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写了一篇杂文。他读书时间抓得紧，也肯动脑筋。1980年，他从上海飞东京，在飞机上看完了鲁迅《朝花夕拾》的英译本，由于过去数次看过原文，又曾译文，因此他对译文和注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喜欢通过书结识中国作家。回京后，我问起一位作家朋友怎么认识白杰明的。他说，白杰明在《读书》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经人介绍去找他，他送给白杰明有关的书和资料，还介绍白杰明认识了另一位作家。

他衣着朴素，而且他身上保存的中国“国粹”比我们这些中国人还多。在澳期间，他总穿一件白棉绸中式对襟布扣短褂，这还是他在辽宁上大学时买的。他的外衣是在洛阳拖拉机厂劳动时发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脚下总是

一双黑布鞋。当然，也可理解为这种打扮是西方名士派最时髦的装束。他那条灰布裤子尤其时髦，左膝盖外侧有个带盖的兜，他的钱财宝物都装在里边。丁老笑问他：“你不怕扒手扒你？”他说：“这个位置对扒手不方便，最保险。”参加正式宴会，他也舍不得换掉布裤子和布鞋。

他对学好汉语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在香港《新晚报》上读到一篇以骆驼穿针眼的故事取笑外国人学汉语之困难的文章后，他马上撰文反驳，指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汉语也是一种非常微妙丰富的语言。不过历史再悠久，词汇和语义再丰富还会有人学，也会有人学得相当好。中国人在穿英语这个窄小的针眼，非中国人也会穿汉语的针眼。”此文标题，他冠以《试穿针眼乐无穷》。

白杰明今年才 31 岁，已有了很好的开端，他的路正长。相信他今后会有更大作为的。

“飞去来”与澳洲土著的文明

金 涛

前些日子，整理杂物，翻出一件中间弯曲两头细长的铜器，上面分别铸有澳洲的大袋鼠、考拉，还有澳洲土著人的头像以及他们使用的投枪和盾牌等图形。这件铜质的小工艺品是我访问澳大利亚的纪念品，它是澳洲土著民族使用的一种武器的仿制品。

这种独特的武器，名叫“飞去来”。

由这件“飞去来”，不禁想起年前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情景，但我的思绪更多地追索着在那块广袤大地上生活的一个多灾多难的古老民族……

关于澳洲土著使用的“飞去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做“飞标”（boomerang），对它的解释是：“弯曲形投掷尖刺武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多在狩猎及战争中使用之。飞标有两种，飞标式的棒状武器则是多种多样的。可飞回的飞标（其名源于新南威尔士州的图鲁瓦部落）体轻而细，掷出时可保持平衡，长约3—75厘米，重约340克，其形状有大弯、小弯以至平直的两个边，成一角度，在制作时或在灰烬中加热之后，将两端各扭向相反方向。可飞的飞标曾在东澳大利亚及西澳大利亚流行，有时作为玩具，用于比赛；有时猎手用它模拟飞鹰，以驱逐鸟群，使之进入悬挂在树上的网里。可飞回的飞标是由不会飞回的飞标发展而成，后者在飞行中会突然转向……”

澳洲土著民族使用的可飞回的飞标就是“飞去来”，也有的书上称做“飞去来器”。

真正的“飞去来”，是用硬木片作的，样子像镰刀，它的奥秘全在于硬木片的形状，在空中飞驰时呈螺旋似地转动，所以当它被扔向目标时如果没有击中，还能飞回到投掷者的位置。这当然是需要非常熟练地掌握它的要领。

因此，有的民俗学家考察了澳洲土著民族的“飞去来”，认为它应用了复杂的物理规律，由于每端有不同的平面，它的原理颇似螺旋桨的运动形式。

美国作家、著名记者约翰·根室在他的最后一部世界内幕书——《澳新内幕》中，引述了一位探险家所见到的澳洲土著民族是怎样表演使用“飞去来”的：

因为是为了表演，那些土著将一只死老鼠挂在矮树丛里，那个年长的土著男子宣称，他要用飞去来打那只死老鼠，而且要故意不打中。”他把身子卷成一团，猛然一甩。只见飞去来从左边很远的地方擦着地面打了出去，接着升到15或20英尺的高度。在往回飞的那一刹那，飞去来好像停住不动一般。接着便继续往回飞，这时它降低到膝盖的高度，从死老鼠上面仅仅一英寸的地方掠过。这个土著往边上跨出一步，便从空中把飞去来收了回来。

这段描写令人想起精彩的杂技表演。

据记载，当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南半球陌生的大陆——澳大利亚，和澳洲土著接触后，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飞去来。英国海员菲利普·帕克·金曾经写道：“飞去来是件很可怕的武器。这是一片又短又重的弯曲形木头，用手投出去，在空中旋转推进，投法极为高明，以至只有投它人的人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他还说：“土著成功地用飞去来打大袋鼠。”依我看，飞去来这个武器更多是用来打猎而不是用来作战的。”

这个英国船员据说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飞去来的欧洲人。从此，澳洲土

著的武器不仅为世人所知，而且万万没有料到，飞去来如今已经风靡全球，成为人们健身的一项体育活动器械，尤其受到青少年的欢迎。

只不过，人们玩耍的飞去来，多是塑料制作的。

我是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的首府——帕皮提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的。即使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飞机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空也飞了整整5个小时，澳洲的遥远、远离其他大陆，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虽然澳洲大陆土地辽阔，地形多种多样，兼之气候温暖，动植物种类繁多，适合人类生存，但是在欧洲人踏上这块陆地之前的漫长岁月，澳洲土著民族并没有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取得惊人的进步。据有关资料介绍，在18世纪欧洲人“发现”澳洲之前，在这块大陆生活的澳洲土著约有30万人，分属500多个部落。古人类学家通过发现的古人类头骨等化石埋藏，证明澳洲土著的祖先早在4万年前便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可是，在长达数万年的漫长岁月，澳洲土著依然停留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过着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

不论是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土著，还是大陆上有着深棕色皮肤、个子稍高的土著，他们既不会农耕，也不会畜牧，他们不懂得制作原始人的陶器，也没有固定的家园。有的研究者说澳洲土著是些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为了采集食物，不得不四处奔走，用飞去来器、木棒、长矛和各种打磨的石器猎获大到袋鼠小到蛇、蜥蜴，几乎是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沿海地区和湖泊附近，土著人也用简陋的方式捕鱼。此外，他们也采集植物的种籽、果实和块茎。并且，澳洲土著懂得使用火，而火的使用和熟食，在人类进化的链条上是极重要的一环。

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介绍得知，澳洲土著结成人数不等的氏族部落，大的部落有几千，小的部落仅有百把人。他们和其他大陆的原始民族一样，以各种动物或自然现象为部落“图腾”，并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而图腾崇拜和具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岩画，是他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文化财富。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由于澳洲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澳洲土著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不必担心外来民族的侵入，也没有战争打扰他们安宁的生活，甚至自然界也不存在太多凶猛的野兽给他们以伤害，而澳洲辽阔的土地不乏可以裹腹充饥的食物，他们如同生活在和平安宁的伊甸园，但结局怎么样呢？结局是发展的停滞，文明的衰落，以及民族的衰弱，而无法抗拒外来的冲击。这，恐怕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则吧。

由此观之，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撞击和交融而焕发活力的。流血的与不流血的，野蛮的与文明的，战争的与和平的，形式多样，但不管怎样，唯有接触、渗透、融合、交流，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静止的、封闭的、死水一潭的社会终将走向衰亡。这，当然是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言。

正是如此，一旦欧洲人以贪婪的殖民主义者的目光投向澳大利亚的土地，长期与世隔绝的澳洲土著，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堪培拉住了几天。堪培拉给我最深刻不过的印象是她的静谧、温馨和乡村的闲适。推窗望去，满目是浓荫的参天大树，以及林带之间柔软如绵的草地。造型各异的民居悄然藏在树林后面，小汽车也是悄悄地匆匆来去，唯恐打破了城市的安宁。虽然也有新落成的议会大厦，还有政府办公楼、博

物馆等现代化建筑，但你很难把她和首都或是现代化城市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印象里，堪培拉只不过是大大村庄。

堪培拉有个人工湖，用城市设计师的名字命名，叫格里芬湖。湖上有水柱高扬的喷泉，阳光下彩虹飞舞，煞是好看。我在湖畔散步时，发现那绿茵茵的草地有座用水泥护栏圈起的巨大地球仪，在它金属的空心圆球表面，除了交织的经纬线和地球各大洲的轮廓，还有库克船长的一条弯弯曲曲的航行轨迹。这是为表彰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 200 年而建的一座特殊的纪念碑。

说起澳洲大陆的发现，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从欧洲人的立场提出的，因为对于澳洲土著而言，他们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了少说也有一万年，何来发现之说。这就如同我们常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岂不是笑话。

欧洲人对澳洲大陆的发现，始于 17 世纪，最早踏上澳洲大陆的是荷兰人。1606 年，荷兰航海家威廉·扬茨乘“杜夫根号”船到达澳洲北部的约克角；1642 年，另一位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发现了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以后又发现了澳洲西海岸。不过，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多么大的影响，甚至还弄不清楚所到之地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未知的南方大陆”。

到了 18 世纪，英国人加快了寻找地球上“未知的南方大陆”的步伐。1768 年 8 月，英国著名航海家、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奉命率“努力号”舰驶向南太平洋，目标是寻找南方大陆，终于在 1770 年 4 月登上了澳大利亚东海岸，同行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在这一带海岸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因此这一海湾被库克命名为植物湾。

库克船长比起荷兰人发现澳洲的时间虽然稍晚，但他是真正调查这块陌生大陆的第一人。库克走遍了澳大利亚 2000 多公里的东海岸，绘制了精密的地图，对这块大陆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除此之外，库克船长不仅把英国的米字旗插上南方大陆，而且宣布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占领了这块原本属于澳洲土著人的家园，于是澳洲大陆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正是格里芬湖畔库克船长发现澳洲 200 周年纪念碑的由来。

1788 年 1 月 26 日——这一天后来即是澳大利亚的国庆节——由 6 艘运输船、4 艘海军补给船和 1 艘海军供应舰组成的“第一船队”，经过半年的艰难航程，驶入今天的悉尼湾。这是一支特别的船队，除了 211 名海军官兵和部分官员、牧师、军医及他们的眷属，其余 700 多名乘客都是英国各地监狱关押的犯人。他（她）从英国本土远渡重洋，被押送到遥远的澳洲大陆，等待他（她）们的是远离故国的流放生涯。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澳洲早期流放犯的艰苦劳役和他们对澳洲开发的种种业绩，也无法描写当年发生在流放地的黑暗内幕。我所关注的是，当英国人不断地将大批罪犯运往澳洲，不断地扩展他们的地盘，侵占越来越多的土地，澳洲土著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据约翰·根室提供的资料，欧洲人来到澳洲后，他们对澳洲土著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但是关于这一桩桩血腥的残酷的历史事件，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却视而不见，讳莫如深，往往是一笔带过。我曾经到过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如今是塔斯马尼亚州，这里是皮肤黝黑、个子稍矮、头发卷曲的塔斯马尼亚人的居住地，当初至少有 4000—5000 人。不过，我在岛上并没有见到一个土著人。据约翰·根室在《澳新内幕》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唯一的一次把整个人种彻底灭绝的事就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在那里，两、三千名土著被四处追杀，最后只剩下 200 人左右，又被押到邻近的佛林德斯

岛去。到 1874 年，只有 40 人残存，最后剩下的 16 个人被送回塔斯马尼亚，其中死得最晚的一个名叫特罗卡尼尼，死于 1876 年。”也就是说，在 19 世纪 70 年代，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已被白种人斩尽杀绝了。

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整个澳洲大陆的一个缩影。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当欧洲人不断开拓殖民区，营建定居点时，他们不仅将土著人从土地肥沃的沿海地区驱赶到内陆荒凉贫瘠的地区，而且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1857 年发生的弗雷泽哈姆惨案，是 2 名英国人引起的。这两个无赖从弗雷泽哈姆出发，到附近的土著村落昆加里强奸了 2 名土著女子。在外狩猎的土著男子闻讯后追往弗雷泽哈姆，惩罚了肇事的凶犯。这时，英国人从各处汇集弗雷泽哈姆，仗着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将昆加里以及附近土著村落团团围住，竟然惨无人道地将近 2000 名土著人，不管男女老少统统杀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在南美洲的所见所闻。当年欧洲人踏入美洲大陆后，当地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一如澳洲的土著一样遭遇到极其悲惨的命运。约翰·根室这位美国记者、作家不无愤怒地指出：“白人得寸进尺，为攫取更多的土地开始实行‘驱散’，这是大屠杀的一个委婉说法。他们四处‘猎取土巴佬’取乐，这是他们周末的一种快活的游戏。警察也参加进来，打死那些偷羊的和从不久前还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拿走些物产的土著，以杀一儆百。搞得最凶的时候，他们竟用下了毒药的食物来毒死这些‘害兽’，杀掉他们，剥取他们身上那种具有依尔莎·科赫风格的刺花的皮肤……”

殖民主义者就是这样毫无人性地消灭着澳洲土著，他们的行为连禽兽都不如。他们的罪恶行径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好的注脚。

据有关统计资料，到 19 世纪末，澳洲大陆所剩下的土著仅 6 万人，其中还有不少混血种，而 1788 年居住在澳洲的土著有 30 万人。

人类，只有在美好而宝贵的东西失去之后，才会在事后追悔莫及。

澳大利亚建国已经 200 多年，澳洲土著的境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通过了一些保护土著的法律，划定土著的保留地，等等，但土著问题至今仍是澳大利亚国内一个棘手的敏感问题。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澳洲土著人口锐减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澳洲土著所创造的原始文明的价值，他们竭力抢救这些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澳洲土著研究所的专家们希望趁着土著文化还没有消失之前用影片、录音带和其他技术手段将它保存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人们现在发现，澳洲土著民族并非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是野蛮的、落后的，他们在艺术、文化、音乐、舞蹈、诗歌乃至宇宙观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作为澳大利亚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土著文化是最卓越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具世界意义的。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澳大利亚北部、西北部发现的石窟画，也就是岩画，其数量数以千计，分布在一些洞穴的岩壁和穴顶。岩画题材多种多样，既有神话传说，也有土著人劳动、生活的情景和各种动物造型。特别是一种澳洲土著所创造的透视画（也有的译成 X 光图画），除了阿纳姆西部地区之外，目前全世界尚没有第二例。这种岩画所画的飞禽走兽，不仅画出维妙维肖的外表，而且画出躯体内部器官，像骨骼、肠胃、心脏等，仿佛土著画师具有神奇的特异功能，能透视动物体内的构造一样。

澳洲土著的艺术还有树皮画，葬礼时用的彩绘柱、地面画、文身画和某些有神秘意义的图画。他们自己独特的、充满想象力和丰富比喻的诗歌，土著的诗与歌曲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有原始的笛、枕鼓、牛吼器等乐器，还有内容丰富、既是宗教仪式又有娱乐性质的舞蹈。因此，西方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认为，澳洲土著所创造的精美发达的文化，是一种适应环境而不是使环境适应人的文化，是一种健康向上能满足人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生活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人们，倒是应该虚心地研究土著原始文明的精髓，从中也许不难找到非常有益的启迪和丰富的艺术灵感呢。

申办奥运失败的墨尔本人

冯骥才

一个人精神气质的充分表现，往往不是在成功之际，而是在他的落败之时，一个民族亦然。使我清清楚楚看到墨尔本人的气质，是在他们申办奥运失败的那天。

早在1989年12月我第一次到墨尔本，就发现街头巷尾到处张挂着一张醒目而别致的宣传画——在长方形雪白的底色上，用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各画一笔，形同火苗，飘逸、灵动、美妙；这五笔构成一朵冉冉烧起的彩色的火苗，使人联想到火炬。火焰下是奥运会的五环会徽。画上的五种颜色就是五环的颜色。原来这是墨尔本申办1996年奥运会的标志。它到处飘闪，似乎奥运会在此举行定而无疑了。

进而我发现，无论公家机构还是私人公司，所制作的宣传材料，无不印上这一标志。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符号是一种自我强化。我问一位墨尔本市政府的议员：“你认为墨尔本申办能成功吗？”

他反问我：“世界上还有比墨尔本更合适的城市吗？”

我开玩笑说：“你怎么能把你们的姐妹城市天津忘了呢？”

这位议员笑着表示谦意。其实，没人会责怪这样偏爱自己的城市。赞美故国故土，口气再大也不为过，因为感情总要把事物夸大，理智将事物还原。但墨尔本人如此自信，一旦不能如愿，将会怎样面对现实？

转年9月中旬，我再次去墨尔本参加艺术节，那正是申办奥运的关键日子，宣传搞得热火朝天。我对他们说笑话：“你们把头发丝里的劲儿都用上来了。”此时，我感觉墨尔本人不是在争取奥运，而是迎接奥运了。

一天，我在墨尔本大学演讲后，回到旅馆已劳顿不堪。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我：“你还想在屋里干什么？一会儿奥委会就投票表决了。墨尔本人全部聚到各个广场和市政府大楼前面，准备一夜的狂欢呢！我马上开车去接你！”

我顿时精神百倍，背上相机，想拍下这难得的城市大庆。我们的车子一路奔往市政府大楼，街上无人，万人空巷，激动人心的场面肯定在前面。但就在这时，车上的收音机忽然传出天塌地陷般的消息：1996年奥运会将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举行！我这中国朋友突然煞车停住，沮丧地垂下头来。他在墨尔本生活多年，与这座美丽又优雅的城市情感相通。我摇下车窗，空荡荡的大街上，到处响着收音机反复播送的这一糟糕透顶的消息，我感到墨尔本整个城市挨了当头一棒！

我的朋友叹口气说：“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在亚特兰大，它们用整车皮的美元做后援，还能不成功？”说完，掉转车头送我回去。

走不久，看到黑压压很大一群人穿街而过，挡住我们的去路。这是从聚集地散伙的人们。显然他们都是从市郊远道而来的，此时正奔往火车站返回去。有的手里还拿着自制的小旗、彩带、标语、面具、萤光汽车、国旗与市徽等等，原来是打算庆贺时用的。使我惊讶的是，这些惨败的人们，竟没人吵闹，没人横叫，没有歇斯底里地发泄。好像剧院散场，只有议论和交谈声，怎么？难道奥运会对他们又变得可有可无？

第二天，我举着摄影机拍摄墨尔本最高的建筑物维真特旅馆屋顶上的彩

色气球。这些气球都是昨夜狂欢不成的遗物，但非常漂亮。这时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到我跟前说：“你应当用枪把它射下来！”这是我听到的唯一表露心中恼怒的一句话。然而这位先生说完，转身而去，风度翩翩，也没有大喊大叫。

当晚，我参加墨尔本一些艺术家的聚会。当大家正要举杯时，一位女钢琴家说：“我们今天应不应该喝可口可乐？”

一位大胡子的话剧导演说：“可口可乐公司花了太多的钱，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喝！”

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异口同声说：“我们应该同情他们！”跟着碰杯痛饮，喝掉了昨夜的遗憾。

其实遗憾是很深的，因为这毕竟是一次难捺的失败。但墨尔本人在失败面前，不失态，不懊恼，不自抱自弃，他们表现得如此镇静、克制、尊严，令人生敬。这使我想到两句话：

成功体现才干，
失败表现修养。

悉尼湖上

马少俊

一

澳大利亚正是盛夏。“1956年11月17日”，旅居悉尼的中国侨胞约中国艺术团游赏悉尼湖。

悉尼湖虽然叫湖，实际是一个内海港。这个港坐落在悉尼市的中心，出口处在哪里不晓得，据说只有一个出口，很狭窄，一只小轮船还要侧身而过呢。

水面一直是平静的，没有呼呼的海风，也听不见哗哗的浪响。水色也不像外海那样乌蓝或者乌紫，却是绿澄澄的，所以叫做湖，的确名副其实。

湖的四周，山如围屏。整个悉尼市像一根玉带环湖围山，红砖红瓦的建筑物在山根、山腰、山顶上层层叠叠，衬着暗绿色的树荫——桉树、棕树、刺松、竹子、芭蕉、冬青树密密浓浓，间或露出几枝红杏。杏子熟了，远看极像盈盈茶花。

二

请柬上写得很清楚：“月夜游湖”。

因此，我们到达码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今天按夏历算正是十月十五，却是满天阴霾，看不见月亮，不过这时候谁也顾不上看月亮，侨胞和作陪的澳大利亚朋友男女老少足有二百多人在码头上迎候着，大家见面亲热极了。

上船一会儿，便开动了，这是侨胞租来的一只游湖汽船，容量很大，但是十分挤，熙熙攘攘。侨胞们把大孩子、小孩子都带来了，不少妇女抱着吃奶的婴儿。陈太太生产刚出满月，连小孩子也抱来了。这孩子平时最喜欢睡，今天却特别有精神。我们这个抱，那个抱，他只是笑。妈妈接过去给他吃着奶笑道：

“这孩子好福气，一出世就看到祖国来的亲人！”

我们问孩子叫什么，她说叫“小华”，她紧接着解释这名字的含义，说：

“因为他是中国人！”

三

“小中国人”甜甜地睡了。我忽然想到他需要安静，我也需要安静一下了。

走出舱来，乌云仍然遮着月，湖水乌悠悠的，毫无光彩。青年们在唱歌、拉手风琴；还是回舱找老先生们谈谈吧。进舱来，有几位老年人正在和团员们谈心：

“我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在这里种菜园，现在还是种菜园。不瞒你说，我累年积攒了不少钱，我想献给祖国。比如说吧，祖国盖大楼，我也垫一块砖，总算尽心，一辈子不枉为中国人。”一位老年人说。

团员忙着给他解释：

“老先生爱国的精神很好。祖国人民很关心侨胞，希望你们在国外也好过。你的钱可以好好地积蓄，作为养老之费，将来有机会可以向祖国投资，回到家乡去看看。”

“那是当然喽，古语说‘故土难离’。这里的华侨从老辈传下来一个风俗，老一辈的人每逢年节，总要朝着北面焚香拜礼，这里买不到香，就点松木枝。至于年轻人，他们不烧香，就唱歌了。就这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人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唱，人们很自然地唱起来，整个船舱充满了歌声。

“森卡也！”

一位研究中国古文学的澳大利亚朋友麦休先生鼓着掌说。

麦休先生能读中国古书，念古文，但中国的现代话却不会说。“森卡也”，我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外国话呢。他在我耳边重复了三遍，并用英语来说明，我才大悟，原来是“甚佳也！”

大家笑过一阵子，窗外射进皎洁的月光，麦休先生伏在窗玻璃上望了望，回头说：

“月明星稀，何不一跳？”

“月明星稀”，我是懂了。“何不一跳！”这怎么可以呢？于是我摇摇头，表示不会游泳。

他有点急了，一面说“NO，NO”，一面在自己的眼睛上作手势我这才明白，原来是“何不一跳”呢！

我忍住笑陪着他和几位老华侨一同出舱来。

四

乌云已经散尽，天空一丝云也没有，虽然不像白天那样明朗，却也透着一抹蔚蓝，湖水虽说仍然不免乌悠悠，但也还是乌蓝颜色了。

月亮圆得很，也亮得很，投下来的倒影，在湖面上映出一片亮莹莹的白波，闪闪烁烁，好像一条游龙的银鳞。

麦休先生余兴未尽，见景生情，继续背曹操的诗：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乌鹊南飞——乌鹊南飞……”

背不下去了，我背给他听，有几句我也背得未必全对了。他拊掌笑道：“是了，是了。”

今年我们访问日本的时候，曾遇到一位日本妇女说她崇拜楚霸王，大念“力拔山兮”；今天麦休先生又盛赞曹孟德的诗，这些诗固然是好诗，可是何以没有听到外国朋友向我念杜甫、李白、白居易的诗呢？当然，读的也有，这是凑巧了，想来不觉好笑。

正沉吟间，忽然有人一嗓子喊起来：

“八月十五月光明啊……锵令锵！”

原来是一位老华侨唱了一句京剧导板，又引起一阵欢笑。

明月何幸，今天成了人们谈笑的中心。一时间大家各抒所得，好像都变成诗人了。刘先生正在吟咏着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接着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董先生倚着栏杆，望着水中的月影叹道：

“今天回到老家了！过去华侨中最流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

诗句；现在祖国强盛，心情可不同了，此景此情，应该念成‘低头望明月，举头思故乡’了！”大家一想，果然，又是一片笑声。

五

大家说笑着，船已到湖心，离岸已远了。天空只剩下几个大星星笑眯眯地眨着眼。

湖水好像一面磨光了的铜镜，四下里环山闪着白色、蓝色、红色的灯光。

船身慢慢移动，见湖心有一小岛，上有一排排的小石屋，据说这里叫囚岛，是当年澳大利亚囚禁罪犯的地方，四周水中养有无数大鲨鱼，犯人要想从水里逃走，就一定被鲨鱼吃掉。现在这岛已经改成灯塔了，说起来总算是个进步；但是月光中古窟幢幢，依然浮现着阴森情景。

六

节目开始了，我们走进舱。

一个侨胞小女孩正在跳芭蕾，接着是广东音乐演奏。澳大利亚朋友唱澳洲民歌，演奏民间音乐。

节目完毕，大家请徐光霄同志讲话，光霄同志兴奋地说：

“谢谢大家，希望侨胞们加强团结，热爱我们的祖国；并且和澳大利亚人民友好合作……”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呢，那位花白头发的董先生便悄悄地把我拉到旁边说道：

“徐先生的话讲得对极了，我有感于中，而发于外，你听对不对：叶落总归根，天涯度良辰，同船无老小，一片爱国心。”

我正连声赞好，十几个青年人围拢上来，请董先生朗诵他的诗，大家都赞好。有一个青年说：

“请告诉祖国人民：在遥远的澳大利亚还有这么一些热爱祖国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我们需要领导！”

青年们越围越多，他们有的在悉尼大学读书，有的在码头做工，也有店员、教师、医生、海员。这些青年海员是从香港来的。他们今年6月曾在日本看过我们的演出，这次又看了我们多次演出。他乡又相逢，分外欢喜。

学生们正忙着大考，但是不少的学生天天跑来看戏，有一位从马来亚来悉尼求学的中国青年拍拍自己的衣袋笑道：

“我连看了13场，虽然买最差的座位，钱也花光了。”

我听了既感动，又抱歉。我想，钱花光了是小事，考不好怎么得了呢！月亮偏西了，人们在码头上殷殷告别。

小婴儿在妈妈的怀里睡了多次，也醒了多次。大一点的孩子们也早就打着盹躺在爸爸的怀抱里了。

我们很后悔，如果早知道，今天决不该让小孩子们来；但又很高兴，难得一聚，还是来的好。

“明日见！明日见！”人们抱着小孩子、大孩子在热情地招手。

月光明朗地照着这些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我们的车子越走越远了，但这些身影在我们的眼睛里却显得十分高大。

悉尼歌剧院幕后新闻

王晋军

20 华诞蓦然回首

当巧夺天工的世界著名建筑奇葩——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20 华诞的盛典之机，我又一次来到它的身边，满怀深情，流连忘返。在这蕴藏着万千财富的港湾，举世瞩目的悉尼歌剧院就坐落在一个小型半岛上。犹如巴黎的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它成了悉尼这个南半球现代化大都市最新的标志。悉尼歌剧院占地近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9 万平方米，三面环海，南端与植物园及政府大厦遥遥相望。建筑的最高点距海平面 60 米，相当于 20 层高的大楼。整个建筑外观全用乳白色名贵大理石砌成，雄伟壮丽，气度非凡。歌剧院由音乐厅、歌剧厅、话剧厅、电影厅、大型陈列厅和接待厅组成，另设有各种排练场、化妆室、图书馆、展览馆、咖啡馆等大小厅室共 900 多间，可同时容纳 6000 多人在其中活动，并拥有全世界第一流的新潮音响和灯光，室内装饰设计上乘，材料考究，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

从 1959 年 3 月破土动工，悉尼歌剧院的建筑工期达 13 年之久，耗资数以亿计，实实在在牵动了每一个澳洲公民的心，但令人们深感遗憾的却是，直到如今，它的设计者却未能亲眼一睹它的风采，同澳洲公民同享歌剧院带来的殊荣和欢乐。这到底缘由何在？蓦然回首，我的同行，一位澳洲记者追踪采访来的有关悉尼歌剧院的幕后新闻，令人不禁思绪翩跹，感慨万端。

夺魁方案寄自丹麦

在安徒生的故乡，“美人鱼”诞生的地方，38 年前，也就是 1956 年上半年的一天，一本极普通的建筑杂志被 37 岁的丹麦建筑设计师 J·乌特松随意翻开，谁能想象到这随意的一翻，竟翻开了世界建筑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J·乌特松看到了一则澳洲政府向海外征集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广告，心灵若有所动，然而他却对遥远在天边的南半球的悉尼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身临其境了。然而创作的欲望却不可压抑。几天后，他在首都哥本哈根偶然遇到几位来自悉尼的姑娘，她们是来参加奥林匹克马术赛的，但后来人们却执意把她们称为“命运之神特意派来的天使”。J·乌特松缠住“天使”询问悉尼的状况，“天使”被其执着和热情所感动，向他娓娓道来悉尼醉人的美景，特别向他描述了悉尼港湾一带的旖旎幽静和独特风情……具有诗人气质的设计师被深深地陶醉和感染了，他的创作灵感骤然而至。

没有见过大海却要歌颂大海，这样的诗写出来能打动心弦吗？J·乌特松执意用要自己的设计蓝图构思出一首这样的“诗”来。推翻了一个个构思，撕碎了一张张图纸，度过了一宿宿不眠之夜，在最后截止日期即将到来之前，他终于拿出了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方案。旋即，这卷蓝图经过精心描晒，飘洋过海邮向悉尼，它带走了又一个“安徒生童话”。

纸筌之中力挽狂澜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57年1月29日，在悉尼N·S·W艺术馆大厅，记者云集，镁光灯闪烁不停，评委会庄严宣布——J·乌特松的设计方案击败所有231个竞争对手，独占鳌头，荣幸获选，成为幸运之神！设计者因此得到5000英镑的奖金，名声鹊起。

设计图案一经公布，人们惊喜不已。它那独具匠心的构思和脱俗超群的设计，倾倒了悉尼，折服了澳洲。远望，歌剧院好像蔚蓝色海面上缓缓飘来的一簇白帆；近看，又仿佛被海浪拍涌上岸的一只只白色贝壳，静静地竖在海边。建筑物与海湾的地理环境巧妙和谐地融为一体，既是艺术化的建筑，更是建筑化的艺术，天地间如果没有歌剧院，那将会是莫大的遗憾！

然而，陶醉在狂欢中的人们哪里知道，J·乌特松的方案最初是被淘汰到纸篓子里的一团废纸，在大多数评委的眼皮下被判处了“死刑”。后来，评选团成员之一，著名的芬兰籍美国建筑设计师依洛·沙尔兰抵达悉尼后，提出要看所有的方案，当他从纸篓里翻出J·乌特松的这团废纸时，眼睛倏然一亮，那欣喜万分之状简直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惊呼：“艺术珍品！艺术珍品！！”依洛·沙尔兰以他那睿智的慧眼，力挽狂澜，勇排众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游说”，以致于众多评委后来也感到了其魅力所在，纷纷易帜，与依洛·沙尔兰“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方案最终被评选团确定为优胜者，纸篓里捡回了20世纪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朝野两党争执激烈

喜讯从悉尼传到丹麦，J·乌特松一家欣喜若狂！J·乌特松回忆道：“那天我正在树林里散步，蓦然间，女儿艾英飞也似地跑来告诉我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随后，她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自行车用力扔到了一条水沟里，兴奋而又娇憨地对我说——爸爸！我的赌打赢了，你现在没有理由不为我买一匹马了吧？！”J·乌特松回忆起当年情景，仍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自豪地说：“我的设计方案能够中选，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烫金的请帖发出盛情的邀请，J·乌特松离开自己的祖国，飞赴那个陌生的国度去圆他的“缪斯之梦”。他终于扑进悉尼海湾的怀抱，日以继夜地劳作，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歌剧院的具体设计和建筑工程上。

应当说，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表现了巨大的反潮流勇气，它必然会对传统建筑施工提出尖锐挑战。譬如，如何支撑这个特殊形状的不规则屋顶？怎样才能使它经得起百岁千秋的考验？等等。大量建筑结构问题亟待解决，J·乌特松与他手下的建筑师和筹委会负责人联袂，就顶层建筑、内部结构和整体布局展开科学的研究和讨论，有时争执和分歧异常激烈、尖锐。这时，J·乌特松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要干成一件事，是多么的坎坷艰难！最为不幸的事接踵而来，谁能想到，耗资巨大的工程费用问题，竟然成了当时朝野两党权力斗争的焦点和筹码，两党围绕歌剧院工程费用拨款，开始了一轮“短兵相接的战斗”。

满含悲怆愤然离去

1965年8月，一贯不遗余力支持悉尼歌剧院工程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大选中下台，向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交出了大印。自由党上台伊始，继续对

前工党政府大加指责挞伐，说它“不惜巨额财力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歌剧院是奢侈和浪费”。歌剧院工程合同是由 J·乌特松与歌剧院筹建委员会双方共同签订的，在州政府更迭后，筹委会主席爱莫能助，只得非常抱歉地告诉他：“从现在起，你不得不到公共建筑工程部部长休斯先生那里去要工程经费了。”

摇篮中的悉尼歌剧院建设面临“断奶”的威胁。J·乌特松心急如焚，立即去找休斯，但休斯大方针已定，坚持不同意拨款。许多关心歌剧院建设的人试图说服他，但都未成功。近 30 年后，J·乌特松老人端坐在自己寂静的公寓里。向记者道出深埋已久的心声：“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是我辞职不干，而是我的合同被停止了，我除了被迫离开，别无选择。”

悉尼。国际机场。1966 年 4 月 28 日。J·乌特松偕同他的夫人和 3 个孩子，满含悲怆与莫大的遗憾，愤然离去。当飞机飞越悉尼港上空时，J·乌特松透过舷窗往下眺望，心里像打破了“五味罐”。他最后一次满含深情地眺望了一眼三面环海的贝尼朗岬角——悉尼歌剧院建设工地，不禁潸然泪下，仰天长叹……当时，这项工程连四分之一都未完成。命运多舛，怎能不令设计者焦虑恹惶，依依惜别！

J·乌特松的突然离去，不啻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使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就连同他“过不去”的公共建筑工程部部长休斯先生，也表现出惊讶和遗憾。后来，休斯宣布，由 3 名澳洲建筑师填补空缺，继续完成悉尼歌剧院工程。

既非贝壳亦非风帆

自悉尼歌剧院诞生以来，已有全世界多少诗人、文学艺术家及摄影家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等等手法对它进行讴歌赞颂，恐怕连澳洲人自己也无法统计清楚。而形容最多的，是集中在两个形象上：一说它形若蚌壳，洁白夺目；另一说它宛若巨帆、扬波出海。这仿佛已经约定俗成，成为悉尼歌剧院当然的代名词。

令人竟想不到的是，当记者采访 J·乌特松时，他在歌剧院落成 20 年之际，披露了这样一个秘密：“歌剧院的造型并非风帆，也不是贝壳，而是切开的桔子瓣。”他还谈到：“许多人都说，我的设计是大海的贝壳和航行的风帆赋予了创作灵感，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它只是一枚橘子，你如果将橘子切开后，橘子瓣的形态同歌剧院的屋顶造型是相像的。当然，我不否认，它又恰好与白色的风帆与贝壳类似，但这并不是我当初的本意。不过，我非常喜爱人们把它喻作贝壳和风帆。因为，这两种形象本身都是很美的。”看来，J·乌特松之所以把歌剧院顶部设计得高耸奇特，主要是考虑到海湾环境平坦开阔，歌剧院所处位置视点较低，因此必须在屋顶造型上作文章才能与地理氛围适应，互为照应相辅相成，不致于在视觉上留下遗憾。

婉拒邀请心系澳洲

在澳大利亚，如果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位公民，当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重返澳洲时，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欢迎？回答几乎都是相同的：“我想，他应该得到英国女王或国家元首级的隆重礼遇。”

但非常非常令人遗憾——

1973年10月20日，当英国女王为悉尼歌剧院落成剪彩时，显要聚会，嘉宾云集，唯独不见J·乌特松的踪影；

1978年10月20日，歌剧院举行5周年庆典，他也没有露面；

1983年10月20日的歌剧院10周年纪念仪式上，依然未见他的音容笑貌；

1988年10月20日的歌剧院15周年庆典，J·乌特松的缺席又一次令怀念他的人们大失所望；

1993年10月20日，悉尼歌剧院的20华诞，为期一年的庆祝在这一天达到高潮，举国上下，气氛热烈。澳洲国民，尤其是悉尼市民热切期待着。J·乌特松重返澳洲，光临盛典。回答他们的依然是失望和遗憾：时届74岁高龄的J·乌特松以“患高血压”为由又一次婉拒邀请。

27年前，由于现已周知的上述原因，J·乌特松扔下设计图纸，头也不回，愤然离去。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至今再未踏上澳洲的土地，甚至迄今为止仍未亲眼目睹竣工后的悉尼歌剧院。这一切，究竟是为为什么？简直不亚于一道“新哥德巴赫猜想”。

唯一令人得到安慰和振奋的是，著名建筑大师J·乌特松终于打破27年来的沉默，在目前旅居地西班牙的一个酷似悉尼“贝尼朗岬角”的海岛上，接受了一位澳洲记者的采访，讲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对于悉尼歌剧院国度派来的使者，J·乌特松老人真诚地说：“我看过歌剧院的照片，它的内部设计与我的原设计很不一样。但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奇迹般的经历，比原来预料的要好得多。对于澳大利亚和它的人民，我只有诚挚的爱慕和满腔的热情。”

当问到老人为何要选择西班牙这样一个岛屿永久居留时，J·乌特松老人若有所思，欣然答道：“在澳大利亚的那些年，我从未感到自己是外国人，也没想到过等歌剧院建成后就离开那里。而总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比起丹麦，我倒觉得澳大利亚更像我的家。如果不是情况发展到那种地步，我就在澳洲住下去了，当时我全家人都已拿到了“P.R”（永久居留证件）。我之所以在西班牙的这个岛屿买了地皮，盖了房子，就是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生活风俗同澳大利亚非常相似——我爱澳洲，心系澳洲！……”

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何时会重返澳洲，重返悉尼，一睹自己“孩子”的风采，至今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谜。做为一个悉尼歌剧院的崇拜者，我与澳洲人民一样，祈祝J·乌特松老人在有生之年还千百万人一个夙愿——

重返澳洲，再造辉煌！

塔 岛 悲 剧

王晋军

这并非神话，而是血淋淋的历史：整整一个多世纪之前，人类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族——塔斯马尼亚人，神秘地消失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在百年之间迅即演变为“化石”，进而被人类遗忘，这不啻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塔岛悲剧！

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岛州（ISLAND STATE），位于烟波浩淼的太平洋塔斯曼海上，面积 26, 215 平方英里，距离澳洲大陆东南海岸 150 英里，是人类距南极最近的居民点。

当我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踏上塔岛采访，我感到这里的一切仿佛还是工业革命前的情景，绿草萋萋，谧静，古香古色、原始天然，全然一幅陶渊明“世外桃源”的风情画，与在澳大利亚大陆的感觉截然相反。

塔岛是澳大利亚最小的一个州，隔巴斯海峡与维多利亚州遥遥相望。大自然对塔岛分外垂青，环岛上万公里的海岸线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岛上植物茂密，种类繁多，盛产苧麻草和苹果，素有“大洋洲果园”之誉称。塔岛还是世界上山脉分布最广密的地方，盛产铜、锡、钨等稀有矿产，河流中蕴藏着 235 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塔岛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为澳大利亚旅游、度假、休养的首选之地，故又被称作“渡假之岛”。

然而，“江山如此多娇”，塔岛的故园却早已更换了主人。如今全岛近 50 万的现有人口中，清一色全是欧洲移民和混血种的后裔。就连这里的建筑风格、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及土著文化的痕迹等，几乎都已荡然无存。只有古老、特殊的动、植物群尚可作历史的见证，还有残存于该岛的世界仅有的两种食肉有袋类动物袋狼和袋獾的子孙，可以见证昔日的血雨腥风……

历史学家告诉我，塔岛早在澳洲大陆发现之前就被撩开神秘的面纱。1642 年 12 月 1 日，荷兰航海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等人在距现今的亚瑟港东海岸某处登陆，令他们惊喜的是在这儿听到了人声，并在不远的森林里的一棵树上发现了砍成的踩脚槽口，从步履的距离看，似乎这儿住有一族巨人，他们顿时胆怯了，于是便慌忙逃回船上。直至 1773 年，陆续驶来一些英国探险船队。1788 年，布莱船长和他的“邦特号”在冒险湾靠岸，种下了塔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批苹果树。1803 年，约翰·鲍恩中尉从新南威尔士出发抵达塔岛，奉命来为囚犯建立一个监狱殖民地。1804 年，澳洲继悉尼之后的第二个古老都市霍巴特（现为塔斯马尼亚州首府）在塔岛诞生。到了 19 世纪中叶，霍巴特成为捕鲸和造船中心，曾经喧嚣繁荣一时。市内货栈林立，商贾云集。用石头建造的巧夺天工之作议会大厦和皇家歌剧院巍然耸立，拔地而起。但由于塔岛远离大陆，其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更被殖民统治者看中，此后塔岛变成了“帝国的监牢”，大量接纳了来自英国的重刑罪犯。

与此同时，严酷的现实是，另一种更残忍的犯罪也正在塔岛进行。

1803 年到 1853 年间，塔岛白人激增，皆为来自英伦三岛的囚徒和负责押解的军、警、宪人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那些杀人狂、酒鬼、惯偷、赌棍和娼妓潮水般涌来，在塔岛干下了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杀人勾当。他们的屠刀直指塔岛真正的主人——世代在塔斯马尼亚繁衍生息的当地土著人。

塔岛土著人被人类学家通称为大洋洲尼格罗（黑种）人。他们身材中等，男子平均身高为 1.66 米，女子为 1.51 米。其肤色纯黑，眼睛呈黑色，鼻翼宽，鼻孔扁阔，鼻梁下凹，头型较长，脑容量较小，男女平均为 1200 毫升。

塔岛土著人文化具有独特风格。塔斯马尼亚语是一种与任何语言都没有联系的简单胶着语种。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前，他们仍处于钻木取火的石器时代，完全过着采集、游猎的原始共产生活。塔岛土著人约有 20 多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分为若干民族，部落内部平等，酋长自然形成，且不搞世袭制。他们没有衣着，终年裸体，女子则在下腹部围一小块袋鼠皮。婚姻方面，他们实行民族外婚制，多为一夫一妻，抢婚之风盛行。塔岛土著人的贪淫观非常严格，乱伦或通奸的男女分别以石斧、石矛处死。巫术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崇信万物有灵，巫师进行符咒和放血乃是唯一的医疗手段。在进入青春期时要举行特殊的成丁礼——文身，以尖利的贝壳有规则地在手、腿、肩、胸部割出伤口，搽涂木炭粉，愈合之后，便留下成排凸起的疤痕。

更为怪异的是，塔岛土著人常把已故亲属的肢骨或颅骨当作护身符挂在颈上，借以保佑平安。而土著人主要的护身武器则是石矛、石刀和狼牙棒，他们在狩猎时常常采用焚烧山林的围捕法进行。部落狂欢舞会是塔岛土著人的主要娱乐形式。其时，男女裸体，身涂油脂，粘土和红赭石粉，妇女用棍棒和鼓打拍子，舞蹈内容有打猎、求爱、祭神、战斗，节拍刚健，动作剧烈，通宵达旦狂欢始尽。塔岛土著人还喜欢在树皮、茅屋、岩壁上绘制粗放的木炭画，内容有人、兽、日、月、海、山、水、火、几何图案等，至今岛上仍可见他们雕刻在辉绿岩上的象形浮雕画……

土著人在塔岛这个“世外桃源”祥和宁静地生息着，他们从来不懂得什么是阴谋、蹂躏、仇杀和战争。

当塔岛土著人对登陆的白人殖民统治者报以十分友善的态度之时，殖民统治者却以铁与剑、血与火来给予无情的回答。

1804 年，塔岛白人殖民统治者初开杀戒，残忍地屠杀了整整一个土人部落！旋即，引发了全岛土著人的愤怒反抗，复仇的烈焰与屠杀的火光，交织出一幅世界近代史上的悲壮画卷，长达 30 年之久的塔岛悲剧——“黑色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

白人殖民统治者不仅强盗般侵占塔岛土著人家园，贪婪无度地掠夺性开采岛上自然资源，而且对土著居民进行了最野蛮的奴役和最残酷的镇压。以抢劫为生的罪犯对土著人的暴行罄竹难书，他们对土著人妇女施暴，或奸淫杀戮，或活剖孕妇，惨剧频频发生。在波特阿兹的一座古老监狱旁，我采撷到这样一宗历史事实：一白人殖民者杀死一土著男人后，抢走了他的妻子，凶手还把死者的头颅割下来，硬逼着挂在死者妻子的脖颈上，让其跳舞唱歌，强装笑颜，不许有丝毫悲伤的表情。土著妇女在饱受这种残酷的蹂躏之后，还不得不为殖民者留下许多混血后代。一个海豹加工厂的白人老板，到土著部落里捉回来 15 名妇女，尔后把她们押解到巴斯海峡的一个小岛上，强令她们潜水捕猎海豹。老板每次上岛巡视时，如果收不到一定数量的海豹皮，他就要把这些妇女吊起来严刑拷打 30 多个小时。白人殖民者真是比野兽更凶残，他们把屠杀土族人当成一种游戏，一大乐趣，常常相邀野游，一顿暴食豪饮之后，挑选几个流放犯为助手，带上狼狗和猎枪在灌木丛中逡巡搜捕，有时一天就能猎杀好几个土著人。更有甚者，他们竟把夜袭土著部落营地当

成一种酷爱的“体育运动”，展开所谓的“杀人竞赛”，塔岛土著人开始遭受一场空前的劫难。

据资料显示，当首批白人殖民统治者登陆时，全塔岛土著人约有2万人，为了一劳永逸地彻底解除土著人自卫反抗的威胁，时任总督亚瑟悍然决定把全岛土著人都移居到一块保留地去。他悬赏每活捉一名未受伤成人奖5英镑，每活捉一名未成年孩子奖2英镑。在官方的怂恿鼓动下，殖民者竞相捕杀土著人，死伤甚众。1830年，总督亚瑟又派出5000名军警和自愿的白人，携带枪支及手铐脚镣，在全塔岛组成搜捕土著人的环形包围圈，实施“铁壁合围”的“三光”政策。当这个耗资3万英镑，为时数周的包围圈在塔斯曼半岛合拢时，捉到的仅是一名妇女和一个儿童，大部分土著人宁死不屈，均在“扫荡”中死于非命。

1832年，“黑色战争”终于结束。当最后一批土著人被捕获时，殖民者当局群魔乱舞，弹冠相庆。捕获“功臣罗宾逊”竟被捧为上宾，得到400公顷赏地和20万法郎的赏金。同年，幸存的120名（一说203名）土著人又遭厄运，全被流放到长64公里、宽24公里的弗林德斯岛上，他们失去了亲人，丢弃了家园，满含愤懑和悲怆，被像野兽一样圈囚在岛上一片荒凉的沼泽地里，在水深火热之中残喘挣扎。1847年，这些土著人再被迁往塔岛的蠓湾，到12月20日，他们还剩46人。17年后，即1864年，仅有一个名叫威廉·兰尼的男子和4名妇女幸存，而这最后一名男子也于1869年去世。至此，塔斯马尼亚土著人已完全失去延续民族生存的可能性。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时刻：1876年。

1876年，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人——妇女特鲁加琳娜也含恨离开人间。

从第一名英国白人殖民统治者踏上塔斯马尼亚岛，到该岛全部土著人彻底灭绝，前后仅仅经历了73年的时间！

塔斯马尼亚岛，73年的人间悲剧的结果是：一个含辛茹苦、顽强生息了漫长岁月的民族永远辞别了这个世界！但是，请记住：它并非大自然的罪孽，而完完全全是人为的阴谋！

当我要离开塔岛时，心情格外压抑、沉重。塔岛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令我心悸，令我沉思。在那些毛骨悚然的遗址中，我获得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从另一个角度来思忖，应该说这又是一笔难以估价的宝贵财富。伫立霍巴特最高点惠灵顿山巅，浩瀚的太平洋尽收眼底，我想到，这个世界虽然比昨天更美好，但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幽灵尚在，阴魂未散，每个热爱自己民族，热爱和平生活的善良的人们，请警醒，请记住这73年间上演的塔岛悲剧吧！

市井风情逛老城

王晋军

OLD SYDNEY TOWN——老悉尼城——一个默默的、很不起眼的地方，谁能想象到，它竟是今日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度过“童年”的地方。

澳大利亚人也同中国人一样怀旧。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文化并无鸿沟与差异。来到悉尼，澳洲朋友都大力举荐老悉尼城，说“不到此一游，那你就算没来过悉尼”。看来，它在悉尼人心中的分量，都要高于巧夺天工的世界建筑奇葩悉尼歌剧院了，可见确非一般。

老悉尼城位于现悉尼城北部的戈斯夫尔区，太平洋1号公路的旁侧。城内完全是200多年前悉尼开埠初期的市井原样。置身其中，有道是：“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没有了大都市的嘈杂与奢闹，体验着上一个世纪的质朴无华，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风 车

一进入老悉尼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巨大的荷兰式风车，在微风中缓缓地转动。哇！大风车！过去只是在《唐吉珂德》流畅优美的文字里见过风车，主人翁身穿盔甲，坐骑瘦马，大战风车……如今这实实在在的风车竟是有三层楼房那么高耸的庞然大物，在老悉尼城低矮的建筑中，更显得威武突兀，仿佛羊群里的一只骆驼。不管怎么说，大风车是老悉尼城最鲜明的标志。

大风车在老悉尼城的创建发展过程中立下了不朽功勋。那时没有电，大风车提供了全城唯一的自然动力，碾米、磨面、做工、轧棉花、榨油等等，陪日伴月，周而复始，历尽沧桑，默默奉献。此刻，当我登上风车顶端，用手轻轻抚摸那木制的巨大叶扇，它依然坚实牢固，旋转自如，可见材料之考究，做工之精湛。

石 径

老悉尼城里没有柏油路，因为那时柏油路尚未问世。清一色的石质小径，分不同路段，或用卵石，或用石条，或用青石板，精心垒砌，铺垫而成。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磨砺，它已凸凹不平，常走的地方，甚至磨出了一条深深的沟壑，但它却光亮如镜，照出了多少历史的画面，让游人研读。

“嘎嘎”、“咚咚”、“嘟嘟”，各种不同的脚步声，在石径上踏响，在静谧的老城里，给人一种在喧闹的都市里绝对听不到的音响效果，进而生发出一种怀古之幽思。当年，被从英国流放来澳洲的囚犯，就是从这石径上踏出开拓和垦殖“南方大陆”的行程。因此澳洲人又说，老悉尼城的石径，是现今所有澳大利亚高速公路的“发源地”。

骑 士

要数风流骑士，还看老悉尼城。

当我入得城中，忽听一阵马蹄声“得得得得”由远而近，再定睛一看，马头高扬，铜铃披挂，上乘英格兰服饰装扮点缀的皇家骑士，好不威风！好不潇洒！好不得意！

这时，一位英俊魁梧的骑士翻身下马，在我面前猛一磕腿，尔后一个英国式敬礼：“Welcome to old sydney town”。随即，这位骑士告我，他是卫士长，过去，这队骑士是专门保卫总督的。今天，每一位来自世界各地而慕名光顾这里的游客，便都是他所要保卫的“总督”。回溯到1788年2月7日，悉尼第一任总督菲利普就是在这样一队骑士的护卫和军乐队的伴奏下，召集了全体登陆人员大会，军法官宣读了发给菲力普的军职任命状和冗长枯燥的训令。菲利普把手按在他所携带的圣经上面，宣誓就任总督兼驻军司令官。自那时起，殖民工作在澳大利亚东部展开，白种人终于拥有了澳大利亚。

老 船

在河湾里，停泊着一艘双桅老船。

据悉，它是1787年5月13日由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碇南行的船队中的一艘。当时，菲利普总督率领第一批囚犯乘坐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行进，其中巡洋舰1艘，护卫舰1艘，运输舰6艘，补给船3艘。后来，澳大利亚人以一种奇特的自豪感称这支船队为“第一舰队”。

踩着舷梯下入底舱，上下交错的小吊床，依如当年，未改变丝毫模样，上面睡着的，仍然是当年“囚犯”，舱中的一切摆设，也如从前。虽已抛锚，但风儿吹来，仍轻轻摇晃……在这静谧的港湾里，我想，头枕着波涛睡觉的囚犯们，睡梦里露出的绝不会是甜美的微笑吧？

法 庭

这是澳大利亚法庭的“老祖宗”。

屋顶已经坍落，但椭圆形的石砌审判台依然完好无损。法庭四周的墙体为方石所垒，虽然个别处有缺陷，然而整体上讲依旧保持着威严的容颜。

我进得法庭时，大片的阳光直接洒落这石拱建筑，多少给严峻的氛围带来一些轻松和惬意。稍过片刻，又一轮审判开庭，大法官身穿特别制服，正襟危坐，律师、原告、被告、书记员以及其它法庭人员各就各位，台下的旁听者也都屏气息声、目不转睛，认真谛听，一切都那么紧张有序，一切都那么严肃认真，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在“作戏”。最精彩的是到了法庭辩论阶段，唇枪舌剑，侃侃陈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幽默机智俏皮的辩词，不时引来轰堂大笑，以致于大法官不得不常敲“镇木”：“肃静”、“肃静”叫个不停……

监 狱

那时的澳洲，还没废除死刑和鞭笞，刑法异常严厉。

几声鸣枪过后，一队士兵押解着几个判过刑的“罪犯”，来到离监狱不远处的行刑场。只见士兵将犯人反绑在受刑板上，背部朝人，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一声令下，但见行刑士兵手执刚从水缸里取出的皮鞭，“啪！啪！

啪！”开始在罪犯的背部猛抽，横竖交织，直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一打听，才知“罪犯”是因不堪苦役而哗变、逃亡被追捕回来的。

判刑过后，“罪犯”被押解入住监狱。这监狱也为石垒建筑，窗口很小，安着拇指粗的钢筋，里面黑洞洞、阴森森，分别设有重刑、轻刑、单人、双人和多人牢房。牢里只有简陋的床铺，下面用稻草垫起，牢房外由狱卒日夜把守。

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在这所监狱入口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游人可能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到了“断头台”。据说，“断头台”安置在这里，是为了“杀鸡给猴看”。

教 堂

老悉尼城里的“圣菲勒”教堂，恐怕也是整个澳洲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了。英国人信教，澳大利亚人焉能不信？信教的多，教堂就不能少。因而我在澳大利亚游历，有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在这方国土上，没什么，也不能没有教堂。

“圣菲勒”教堂看上去要朴实得多，面积也不大。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教堂该有的，它都有。在入口处，有免费供人索取的圣经宣传材料。在橱窗陈列处，还放置有两个世纪前教徒们和传教士使用过的以小羊皮作封面的圣经。虽然内页都已斑驳褪色，但它毕竟还是完整无缺，上面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划满了重点符号，足见教徒们的无限虔诚和刻苦程度。教堂里的坐椅，已磨得光滑如镜，许多地方都凹了下去，这无疑是在教徒们“坐功”不浅所致的缘故吧！

匠 铺

老悉尼城里的各色匠铺星罗棋布。

这大概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最原始的雏形吧？林林总总的工匠们，还在那里用最原始的工具，以小生产的形式，制造着许多优秀的手工艺品，不禁让人啧啧称绝。

沿着石板小径，铁匠铺、瓷器铺、金铺、木器铺、蜡烛铺、弹花铺、纺线铺、毡毛铺、泥陶铺等等，两面排列，红红火火，异常繁忙。工匠们一如当年，在昏暗的作坊里，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活儿。在一家泥陶铺，我看到工匠用双脚蹬着一个带链条的轮盘，均匀地转动着他工作台上的泥坯，他不时用手变幻着角度在一个刀具上切削，不一会儿，一个造型别致的泥胎陶器工艺品便脱颖而出了。这些匠铺大部分都是前店后厂，边做边卖。当你做为一个顾客兼游客来到这里时，你尽可以讨价还价，挑肥拣瘦，店主绝不会有丝毫冷眼。当你满意之时，也就是店主的得意之刻，因为，它的产品从产到售出，还不到两个小时，资金周转如此之快，何愁不能早日发家致富？

商 号

人常说，市井繁华，多靠商号“锦上添花”，这话一点不假。古镇上的纷纭商号依旧是那个时代的格局，那个时代的装潢，惟妙惟肖，原汁原汤，

一点都不“走味”。虽然小门儿小脸儿的难与今天澳洲超级的 DAVID JOHN, GRACE BAO 相媲美,但它们本身的原始风貌,就是一笔无法估价的财富。

当我进入一家礼品商店,一对“演戏”的新郎新娘刚选购完婚纱、皮鞋、文明棍离开商店,前往教堂举行婚礼。这家店主告我:那时,老悉尼城里的人们结婚,都要来此选购礼品,才能完婚,这已约定俗成。当时的人只要英国没有妻子,就可以在此觅人缔结合法婚姻。这里的婚礼虽不像电影里那样“魂断蓝桥”,悲欢离合,但结婚毕竟是喜事,他们以喜剧开始,又以喜剧告终。弦外之音,商号的历史功绩,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诸如杂货店、面包坊、布店、副食店、肉铺、餐馆、乐器行、打字机行等等商号,都有自己的招牌,醒目地挂在各自的店铺门前。店伙计的吆喝叫卖声,也时常传入耳朵,不由得让你回头再观望一下这“狂跌”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然后再决定上不上“钩”。

牛 车

“老牛拉破车”已是一句民俗俚语了。在老悉尼城,老牛拉的却是非常考究的包厢座车,上面乘客里除平民百姓外,不乏达官显贵,太太小姐。

早期古镇,牛车是理想的交通工具。一驾车,通常由4头牛拉,其中1头驾辕,3头拉套,再加上一个车夫,每天按固定的线路在古镇里环行,通常走的是主要繁华干道,设有几个类似今天的“BUS STOP”,但也不是那么死板,随叫也可随停,顾客至上,优质服务,包你满意。我在一个车站候车尝试着乘坐了一回牛车“BUS”,乘客们全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待车停稳后,按部就班上车入座,人人都一副绅士风度,绝不会有抢座吵嘴的现象发生。对女士,那是绝对优先优待,这一规矩,即便在牛车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人多座少时,男士肯定会主动谦让女士落座,这种礼貌,一直保存至今,并在全澳洲推广开来。

因此,许多游客不得不感慨万般,曰:“牛车犹在,世风‘不古’”。

而车夫却笑吟吟风趣地问:“你们要乘车去哪里呀?回中国吗?……”

旧 装

古镇风情妙趣横生,男女不改旧时装。

大街上,各色人等,男女老幼,统统穿戴旧装,初衷不改。这种服装穿在身上,仿佛200多年前的时装模特儿,在向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摩登”人尽情表演,展示一个遥远的梦,一种遥远的服饰文化,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据介绍,这里有若干服装确实确实是当年古镇上的“原汁”产品,现已成为世界各大文物收藏商们竞相追逐的“高档文物”。他们出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以求购得一套这样货真的旧装。但古镇的人们却不为所动。老祖宗留下的传家宝,岂能轻易拱手相让,让它“掉”到了钱眼里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穿旧装的“臣民”,才使今日的人们更增添了对老悉尼城的神秘感和向心力。

再看那旧装,清一色英格兰“版”,女士坤包小帽,褶皱长裙,男士燕尾西服,文明礼帽,充溢着一种古香古色的情调。小孩与老人的旧装,则特

别宽松肥大，是不是多少也喻示了那时生活节奏的安谧与散漫？

穿旧装的人们，却没有人回答，而是依旧那般高傲，那般轻盈地从老街上招摇而过……

学 堂

前方传来朗朗读书声。

one、two、three、four、five……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环境幽雅，这可算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再看那学堂。白墙红瓦，窗明几净，在整个老悉尼城，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一流建筑了。学堂内，课桌依然按原来格式摆放，桌面和凳椅都已磨砺的油光放亮。黑板上，颜色未褪，仍像墨染一般，黑底白字，分外醒目，不论坐在教室的哪个角度，都看不见太阳折射的光线。游人们不得不佩服当年老悉尼城里舍得花钱办教育的那些人们，并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敬意。

“教育是立国之本”，现时在学堂里的一位老师这样对我们说。她还介绍道：那时，建国初期，有关法律就明文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必须进入学堂学习，这是带有“强迫”色彩的，否则就是犯了法，要追究家长的法律責任。

在这澳洲最古老的学堂前，我忽而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哪个国家狠抓了教育，哪个国家才有辉煌而灿烂的前途。

邮 局

这座 POST OFFICE，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所邮局。澳大利亚史书记载：1809年，第一个邮政局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老悉尼城内开始营业。

遥想当年，一个邮局一间房，几个 POSTMAN，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腿跋涉；再看今日，澳大利亚邮政经营着约 5000 个邮政局和 6000 辆邮政车，为澳大利亚约 580 万个居民通讯地址和 57 万个商业地址服务，并雇佣 3.5 万名全日制工作的职员，每个工作日处理约 1400 万份邮件，人们怎能不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呢！

在邮局外面，伫立着一个历尽沧桑的邮筒，它的样式，一定是今天伫立在全澳几十万个邮筒的原形，因为从总体上看差异并不太大，人们纷纷站在这里拍照，以作永久的纪念。而更多的观光客，则争先恐后在这里向远在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发寄明信片，为的是盖上一个老悉尼城澳大利亚最古老邮政局的邮戳。我想，离它价值连城的时候，为期不会太久远了。

于是，我也在这里发出几封寄往中国各地的明信片，以为永久的忆念。

夕阳西下，两百年漫长的时光，倏地而过。一天的时间简直太短、太短，历史的沧桑变迁所给予人们的，实非高山流水的曲韵。老悉尼城固然没有北京故宫的富丽堂皇、气宇轩昂，但它朴实平凡，更像一个普通人，给人一种可以接近的亲切感，让人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读、去看、去想、去听、去满怀新奇和惊喜地体验悉尼的“童年”。

牛车“BUS”的铃铛响了，我们悠悠穿过老悉尼城出入口处的“时光隧道”，从两个世纪前的昨天，重新返回到了即将迈向 21 世纪的今天。这时，一位伟人的一段著名论述，在我耳畔响起：“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

关系还给人自己。……”

我想，“OLD SYDNEY TOWN”——大概就是这样一本有关澳大利亚历史的最佳史书。

访 澳 记 略

李庚

1982年3月，当我国还是冬末而澳洲已是初秋的时候，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我们只在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富饶地区，访问了4个城市，为时又仅3周，不过是走马观花。但由于主人妥善安排，短短的21天，我们参加了有各国作家、艺术家集会的阿德雷德艺术节；和几十位澳大利亚的作家、艺术家，书刊的编辑人，电视、广播、艺术团体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会见了他们国家和州的主管文艺工作的官员、主持对华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负责人；接触了十几位澳籍华裔文学和历史学教授及学中文的学生；访问了澳大利亚普通人民的家庭；参观了两处重要的文艺活动中心，两个主要的电影制片厂，两个剧团，三所著名大学的文学院东亚系和最大的艺术学院，以及图书馆，战争纪念馆，城市建设展览馆，美术馆，私人画廊，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电视台，手工业制品工厂；观看了音乐、舞蹈、歌剧、话剧、电影、电视剧、杂技直到各种在公园中的群众性的露天演出活动；此外，盛情的主人还让我们游览各地市区，古迹，海港，牧场，酿酒厂，动、植物保护区，著名的风景区，包括农产品集市，周末娱乐点等等。所有活动，着重在文艺方面，但也五花八门，有时一天有五个活动项目。因此我们的访问还是接触面广，内容比较丰富的。这里所写的，只是一篇“记略”。

中澳远隔万里重洋，现在乘波音747客机，9小时就到了。天涯已是比邻，两国变得近了，互相了解和人民之间的往来也就更加重要。

澳大利亚国土为我国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中部、西北部有广阔无比的未开发的和荒凉的土地，它发达的农牧业，主要靠的是东南沿海林木水草丰饶的地区（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澳毛世界闻名，过去澳大利亚号称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现在它已经“从羊背上跳下来了”，60年代它连续发现全国处处富有矿藏，成了世界矿产的主要供应国。神话般的大量铁矿、铝矾土矿、镍矿给澳大利亚带来新的巨大的财富，刺激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现在全国每年饲养的美利奴羊还有1.75亿万只，羊毛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百分之三十，但它已不只是“世界牧羊人”，早已成为工业化的国家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劳动力用于制造业，几乎和美国一样。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口只有1437.6万人，但近20年来移民不断增加，使澳大利亚现在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140多个民族，80种语言和20种宗教信仰。在澳大利亚最早定居的土著居民，据说至少在三万八千年以前就从亚洲来到了这里。现在，澳大利亚人承认这是澳洲大陆一段古老漫长的历史。但通常他们说起澳大利亚作为国家的历史，总说是“才一百几十年”或说“才二百年左右”。这是从1788年英国第一批移民来到，正式建立了殖民地开始算起，或者追溯到1770年詹姆斯·库克率英国舰队到澳洲东海岸，宣布这里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时为限。我们在访问期间，常听到澳大利亚朋友对我们说他们的国家“历史比美国还短，更比不上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零头”。这是谦逊的实话，但同时也听到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迅速发展自豪的语言。

澳大利亚平均国民收入还次于新西兰，但也达到一万美元。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城市建设得很漂亮，公共设施很讲究，周末市面很繁荣，据说私

人汽车每三人有一辆，70%至80%居民有私人住宅。澳大利亚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内战，澳洲当代历史学家克拉克的《澳大利亚简史》上说，澳大利亚国内发生过的最大的流血事件，就是1854年11月在巴拉腊特，军队镇压采金工人暴动，那次采金人死伤55人，军队死伤15人。当然，他没有把18世纪到19世纪中白人屠杀、压迫土著民族，使土著由原来的三十多万人减到不足十万的这种经常发生的不叫战争的战争算在内。20世纪以来，国内没发生过面临革命的危机。近年，工人罢工频繁，但一般都只有经济要求，不带政治色彩。虽然工党议席多，但自由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执政已有20年，看来还要蝉联下去。一般人的感觉是政治上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还好，有抢银行、珠宝店的大案子，小偷小摸极少。凶杀案也比美国少得多。传说70年代初，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要求移居澳大利亚，来“过安全安静的日子”。

但是澳大利亚并非天堂，所谓福利国家实行高工资，高消费，但同时也是高生活指数、高税收。我们访问了一位华女士，她是银行的小职员，未婚，周薪252澳元，所得税每周要交54元，房租（两室一厅）每周94元，与人合租，自己要付47元，伙食每周要40至60元，还有一百元左右，要开支水电、交通费，购置衣物用品，如果要去看戏，电影票一张5元，话剧得15至17元，歌剧或舞剧，门票高达20至25元。上饭馆食物就贵了，一杯咖啡得花4澳元，一餐得十几20元。她的生活水平是高的，但并不宽裕。前几年在澳大利亚就业还不太困难，但由于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今年3月份政府公布的澳大利亚的失业人数，已达48.26万人，达20年来最高比率，为全国劳动力的7%。失业救济金头一年每周五六十元，连续失业三年后就减到三十余元。一位从越南逃出在中国餐馆当夜班服务员的华侨女学生告诉我们，她每周只能有25至30元用在伙食费上——那是仅仅能不饿肚子的水平。外国记者报道说：虽然澳大利亚以它的各大城市没有贫民窟自傲，但其实每周只能以37元以下的收入维持一家生活，处在贫困线下的人，仍是数以万计的。

我们去特鲁普话剧团看戏时，一位女编导对我说：“你不要看我们表面上很繁荣、安宁，实际上贫富悬殊非常严重，2%的人占有91%的股份和土地。少数人财产巨万，像我们的演员，周薪只有108元，每年不演出的三个月里，连这点收入也没有。”澳大利亚列格拜出版公司的总经理罗·戴维斯告诉我：文艺创作一般销售1000至2000册，1000册以内的收入全归出版社，1000册以上才按定价30%抽版税给作者。多数人必须兼做其他工作。除了著名作家，或写出了畅销书，作家的生活是不稳定的。我们第二次到悉尼时，市中心街道两侧隔不远就有一大堆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垃圾，地上也散落着许多罐头盒和食品包装纸，这是因为清洁工人又罢工了。当时悉尼天气转热，但我们住的豪华的希尔顿旅馆餐厅和上演《天鹅湖》的大歌剧院里，却停止了供给冷气，原来是电厂工人也在罢工，市里电力不足了。

澳大利亚朋友中的有识之士，对他们的国家还有更大的忧虑，他们说：澳大利亚这二十多年迅速发展，主要靠发现了丰富矿产的“好运气”，现在发现矿产的速度已经超过开辟外销市场的速度，而世界市场的旺淡需求和价格，不是澳大利亚能左右的。澳大利亚虽然发达起来了，但过分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以这些出口所得占国家收入主要份额，从长远看，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经济的命运。迅速开发矿产的资金，相当数量靠外国投资。现在每年涌入澳大利亚，投在工业上的外资约为10亿美元，这里面英国历来占1/3，美国

已占半数，日本正在赶上来，近几年它已经收买了好几个重要联合企业 50% 以上的股权。现在大约有 1/4 澳大利亚法人资产完全由外国投资。在制造业，则占到 2/5，而通过部分所有权控制的企业又远远超过以上的比例。出于悉尼和墨尔本高级旅馆的，很多是外国公司的经理和高级职员。外国人控制了矿产、汽车、炼油、石油销售等等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饭锅里插着别人手里的饭勺。这些朋友说：不要看我们的经济很有发展，我们对自己国家经济的自主权却是不完全的。

还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澳大利亚只有 1400 多万人口，国家希望今后 20 年内能再增一倍，达到 3000 万。前二十几年增长的人口 4/5 是本地出生的，但是本地的出生率自 1970 年后逐年降低，现在人口增长率是每年 1.05%，隐藏着将来劳动力的危机。有位作家对我责备他的同胞：“我们的人太自私，怕生孩子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影响自己的休息和娱乐，就不管社会的需要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移民，有一种老爷式的论调，说：“让日本人来给我们当技术员，土耳其人来当工人。”但移民已经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多民族、多种文化、习俗、多种信仰的复杂情况，带来政治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持稳定的问题，因此又不敢放手大量移民，1971 年以前每年入境移民七万余人，现在每年的限额是两万人，其中华人（包括台、港）限在这个数目的 8%。可见澳大利亚是旧澳洲人（他们的称法，指英国血统，本地出生的）和新澳洲人（指各国移民），白种人和非白种人之间要保持一定比例的种种考虑。需要劳动力和如何增加人口，经济发展要求和政治上的顾虑，存在很大的矛盾。

澳洲人的祖先，不论是英国流放犯或中下层自由移民，历史上都有开发大陆艰苦劳动的经历，现存的老一辈也经过并不那么富裕的日子，澳洲人一般工作紧张，劳动效率高，但是所谓福利国家助长了一代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和习惯，年青人热衷于游艇和冲浪，每逢赛马更是万人空巷，他们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下午许多人早下班，星期六、星期日两天的周末是“神圣的休息和娱乐的日子”。《半球》杂志的主编鲁·汉德森对我抱怨说：“我们这里老人要死不能死在星期五，因为周末殡仪馆、火葬场，谁也不来给你收殓、火化、办丧事，要等下星期一上班了才行。”

澳洲也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生活的影响，悉尼市里离海德公园不远，有个王家十字区，是夜生活的中心，那里有下流的夜总会，有男女脱衣舞，有妓女还有妓男。我们接触的知识分子都以此为耻，绝口不提这个地方的存在。但就我们看到的情况，澳大利亚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好的，人们更热心的是户外的体育活动，街上大部分行人的衣着、举止都还文雅、稳重，奇装异服和轻浮的表现不多，像阿得雷德和堪培拉，居民似乎还有英国乡村绅士派的古风。肯尼利先生（名作家，澳中理事会理事）和一位印刷厂厂长彼·西蒙斯都说，他们不喜欢一般美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轻浮和自私虚伪的作风，厌恶他们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肯尼利说：澳大利亚人只有到了美国的农村，才能见到和自己感情、习惯接近的人。（据他们自己说：由于历史情况，澳大利亚人是很看重“伙伴情谊”的。）澳大利亚上映的电影和电视剧，大部分靠进口，但他们有检查制度，过分表现凶杀、色情的东西禁止播放，我们在旅馆注意看了一下夜 12 点以后的电视，的确没有不堪入目的节目。已去世的著名美国记者约翰·根舍认为澳大利亚人尚能保持比较纯朴严肃的生活作风。以西方标准来看，他的评论还有一定的道理。

访问中，我们感受到了澳大利亚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独立的国家的意识的增长。澳大利亚从 1788 年起是英国的殖民地，到 1901 年才由各殖民地组成联邦，算是英国的自治领，直到 1931 年才成为独立的英联邦成员国，现在，澳洲人不但已经不再承认英国是宗主国，而且表现出对过去这种关系不满的思想，我们在阿得雷德看的电影片《驯马人莫兰特》，反映澳大利亚士兵，被英国调遣去参加它在南非和布尔人的战争。为英国卖命，但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故事，是一部对宗主国揭露和抗议的影片。在墨尔本，又给我们看了影片《加利波里》，它强烈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司令部硬派澳洲兵强攻土耳其海岸悬崖绝壁上的要塞加利波里，以至在这里断送了 1 万多名澳洲青年的生命。（澳大利亚人每年 4 月 25 日纪念这个伤心的登陆的日子。）这部电影表达了澳洲人民积郁的民族感情，被观众称为澳洲最好的影片，已经连续放映了 8 个月。我们在阿得雷德艺术节听青年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英国国立歌剧院音乐指导马克·埃尔德，首先要乐队演奏至今还是澳大利亚国歌头一节“上帝保佑我女王”的时候，剧场观众起立参差不齐，使他不得不一再用指挥棒敲乐谱架子，示意和等待全场起立。这时陪同人连忙告诉我，澳大利亚已经谱写了自己的新国歌，正在等议会正式通过。澳洲人过去忌讳说自己是被流放者的子孙，现在却有不少人不讳言这一点，甚至有些人谈起还带点夸耀的意味，这也表现了他们不再以英国法律的是非作为自己判断问题的神圣标准，透露了一种对过去叛逆的情绪。澳大利亚文化界人士和政府的文化官员，对我们一再强调：他们的目标是要摆脱单一的英国文化的影响，建立自己独特的多元（指包容多民族文化的）的澳大利亚文化。二次大战以后，澳大利亚和美国关系密切，甚至追随美国，派遣自己的军队参加了美国的侵朝和侵越战争。但是最近里根政府玩弄两个中国的诡计的时候，澳国政府明确表示了不同意里根外交政策的态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澳洲人对澳大利亚在世界上应处的地位认识上的变化。过去，澳大利亚人一向认为他们是“被上帝放错了位置的欧洲国家”，以自己属于西欧行列为骄傲。现在却强调澳洲的地理位置，倡言它不单是连结东西方的桥梁，而且应该说它是属于亚洲的国家。地理学家还宣布了令人惊奇的发现，说澳属新几内亚这个有几十座高度在万英尺以上山峰的大岛，是喜马拉雅山脉通过整个马来群岛海域水底，到这里又隆起而成的。亚洲山脉延伸到澳洲前沿，土著人种来自亚洲，这都被用来说明澳大利亚本来天然的和亚洲有更深的关系。

当《半球》（副名：一个亚细亚和澳大利亚的杂志）主编汉德森再三向我表明他的刊物不受政府在政治上的干预，他是个完全自由的编辑人时，我问他：既然他的政府供给这个刊物的经费，并且是由政府提议创办的，难道政府对办杂志的方针没有任何要求？他回答道：“说老实话，当然是有的”。他说，政府的要求就是：这个杂志以专门介绍亚、澳两洲、太平洋、印度洋上各国、诸民族的历史、现状、文化、风土习俗等内容，来表明澳大利亚对这些国家、民族的关心和重视，表明澳大利亚和亚洲各国相同，都属于东方。我说，你们不是尽力保持澳大利亚是个白人国家么？他说：是的。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是处在有色人种的大海中间，我们和日本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和亚太地区的繁荣昌盛有越来越密切的利害关系。军事上，英国已经实际上无力帮助我们这个联邦国，美国也削弱了它对澳洲承担的义务。中国强大了，是太平洋地区对北方的屏障。我们应该加强和亚洲的关系，以东方国家一员

的态度，摆好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他问，你理解我们这种看法么？你赞成么？我说，我理解所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赞成为保护这种共同利益的政治上明智的现实的考虑。

我们遇到的许多澳大利亚朋友，对中国是友好的，热情的。据他们介绍：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有对华交流的专用拨款。这就是日本、澳洲和新西兰，而对华交流专款在澳大利亚政府文化交流费用中占第二位。（第一位用于和日本的往来中。）澳中理事会和对中国的交流工作也是很积极主动的。要和中国友好是有原因的。澳大利亚有识之士，已经把 50 年代孟席斯叫嚣共产主义对澳洲威胁的鬼话，抛到一边去了。他们不仅了解了中国是没有对外扩张野心的国家，而且认为有了中国巨人，北方的野心家便难以南下而牧马于澳洲。他们认识到中国对他们是个极大的市场，尽管目前由于中国经济调整，作为它的第四位贸易伙伴的贸易数字有所下降，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中国发展和澳洲的贸易，未来有无限的潜力。而且他们不存畏惧之心。认为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经济领域中对他们没有威胁。不像日本，虽然是澳洲不可少的贸易伙伴，但是日本咄咄逼人，雄厚的资金、技术和经商的手段，使他们对我们的公开说：“日本人可怕。”

中国悠久的历史对澳洲人有强大的吸引力，明清画展在澳展出两个来月，尽管入场券平均 4.5 元（成人票价高），盛况始终不衰，观众达二十几万人次，为历次展览所未有。澳大利亚委员会（管文化艺术活动的官方机构）主席帕斯科博士就带全家人参观了四次之多。特鲁普通话剧团、奥兹马戏团，出版家、作家、演员、学中文的学生，只要是还没来过中国的，都纷纷向我们提出访华的愿望。澳中理事会执行主任梅卓琳女士预计，筹划中的秦兵马俑展览，将会引起又一次澳洲人欣赏中国文化的高潮。她说：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是了不起的。

但是，澳大利亚人熟悉了我们的周鼎汉刻（出土文物展览）古代绘画，也看到了中国的京戏杂技，却对近代当代的中国文学了解极少，除了各大学中文系师生，知道鲁迅的人寥寥无几，更不要说茅盾、郭沫若了。我碰到的作家，只有到过中国的小说和电影剧作家科奇一人，除了爱读白居易的诗（艾黎译本），还说他喜欢王蒙的小说，特别是《蝴蝶》。这种情况，除文字隔阂之外，主要是我们对海外的宣传介绍工作做得差，《北京周报》、《中国文学》在澳发行没有打开局面。我在悉尼、墨尔本，和黄源同志跑过多家书店，只在一家儿童书店看到三本外文出版社的书：《神笔马良》，《中国民间故事选》和《西游记》（插图加英文简短解说）。据说三本书，特别是《西游记》还有销路，可惜到的书不多。澳大利亚小朋友普遍都知道“神奇的中国猴子”，遗憾的是他们脑子的孙悟空形象，是来自日本改编的《西游记》电视系列片的。澳大利亚朋友也抱怨难得看到中国的新电影，中国使馆招待场，常常是些老片子。电视台提出要购买中国的故事片和风景片，因为他们只缺少中国片子。看来澳大利亚人很希望多了解中国，多看到中国的文艺作品，而且交谈之间，我们感觉他们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的戒心，不像美国或有些东南亚国家那么大。这里有很大的进行工作的可能性，可惜我们远不够主动、进取，没有把工作认真做上去。中澳两国多方面交流还不够发展，也影响到学中文的澳大利亚学生的出路，三个国立大学东亚系都各有 60 至 100 学生，但去年墨尔本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生只有 3 位找到了对口的职业，陪同陈登科等同志的一位留学中国的女士，回国后也找不到职业，这还是她

第一次的临时被雇用对口的工作。因此报考学中文的学生，已有下降的趋势。（学日语的毕业前就被聘定了。）尤其要考虑的是，单是悉尼就有四五万华侨，可唐人街仅有一家书店，卖的全是台湾和香港出版的图书刊物，两家电影院放映的也全是台、港的打斗片和言情片。《人民日报》在悉尼只能看到三周以前的，而台湾《中央日报》却两三天就到。报摊上仅有的中文报是《星岛日报》澳洲版（3月1日出报，3日的报上用了中华民国纪年，过几天又改回公元纪年）。澳洲对华广播有国语、粤语，运至广西，云南都收得到，据ABC广播电台研究调查部主任说，他们每日都收到中国听众几百封来信。而在澳洲，却基本上听不到我们的对外广播。这些都使我们深感是个问题。

国家富裕，政府也注意发展文化设施。举世闻名、号称悉尼人两大骄傲之一的悉尼歌剧院，耗资近10亿美元，于1973年竣工。仅其中可容2700多观众的音乐厅，每年就有287场大型演出，此外还有小型剧场，放映厅和画廊同时举行活动。阿得雷德也有70年代末新建的艺术活动中心，也是个综合性的宏大建筑物。首都国立美术馆之外，各州还有各州的美术馆，收藏都很丰富。国家对芭蕾舞团，歌剧院，交响乐团都给以数量很高的经费补贴。堪培拉国立图书馆建筑优美，阅览室和书库都有充分可供使用的面积。收藏有图书300万册（中文书近15万册），杂志4.7万多种，电影片4.3万部。（包括《白毛女》）照片、唱片各30余万张，以及其它。经费充足，只每年收购影片的经费就是3500万澳元。在那里黄源、袁文殊同志都看到了他们写的书，才旦卓玛同志也看到了藏文经典。这个图书馆设备现代化，随时可以和欧、美的大图书馆通过电传互相查阅交换资料。我们看过三处植物园，一个动物保护区，规模都很大，都保护得很好，没有人攀折花木，袋鼠敢于从人手中取食，草地上也没有人惊扰鸽子。阿得雷德的前南澳大利亚州殖民地总理府，修复建馆，全州各地都有人送来古老的摆设、用具，每天还有许多妇女来义务工作。陪我们参观的副馆长，每介绍一件百年上下的收藏品，就要说一句：“这在我们很古老很宝贵了，在你们历史那样长的国家里，就不算什么了”，生怕我们见笑。其实，这倒很使我们有所感触，不由想到我们有的人任意糟蹋秦砖汉瓦，真比不上人家那么珍视历史遗留下来的每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澳大利亚建国以来，有过9次对外战争，除了参加世界大战派兵到北非和纳粹作战，在新几内亚抵抗日军进攻，是正义的战争外，其他都是追随英、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的非正义战争，我看到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澳洲兵在北京街道上跃马横刀的照片，很不舒服，对陪同人员说：“你们不必让我看这张东西，我看了不高兴。”在中国学过美术的陪同罗小姐说：“我很抱歉，我们这里，缺乏区别战争性质的观点。”我原谅她对这种陈列品的改变是无能为力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把从1885年以来9次战争中10.2万个战死者的姓名刻在铜牌上，排满两道长廊，和设立一个建筑、布置都精美的战争纪念馆是企图对国民进行战争教育，也是明白的。

澳大利亚政府对文艺有其“开明”之处，比如现有140个民族当中，土著人和白人之间，由于过去的历史，对立的心理状态仍很突出。参加作家周的一位土著作家玛·瓦特逊女士，一见中国代表就上来打招呼，送给我们土著民族“国旗”式样的纪念章。说道：“这纪念章上，黑色代表我们民族的肤色，红色代表我们在被掠夺的土地上流的血，黄色代表太阳，是我们的希望。你们讲自己的语言，而我们在1870年就失去了讲本族语言的权利。过去

白人占我们的牧场，现在矿业公司又掠夺我们的山野。我们要改变受压迫的状况，就要进行革命。你们的革命已经成功了，你们是革命人民的代表，一定能体会我们的心情。”我对这样的谈话，不好表示意见，只能郑重地接受下她的赠品，别在胸前，热情握手祝贺她个人文学事业的成功。

土著的民族情绪澳洲政府是知道的。他们对土著人从20年前开始，采取缓和矛盾，承认土著独特的风俗和文化，并允许他们享有公民都有的社会福利待遇，适当改善其生活的政策。阿得雷德艺术节中，一位土著画家在艺术中心一面长约30米，高5米的大壁画中心，画着一个土著儿童，身穿的白背心上红字大书“是我们发现了库克”（意思就是澳洲本是土著的土地，不是库克发现要归属白人的新大陆），州政府对此并不加干涉。上面提到的特鲁普通话剧团，是专演揭露澳大利亚当前社会问题的戏的。州政府不以为嫌，也给它一年6万元的经费补助，占剧团全年开支费用的一半。有位澳籍华裔作家，要写一部以淘金华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那时白人排斥华人，诬蔑了这段历史，作者意图写出真实情况，澳中理事会已经决定资助她来广东侨乡搜集资料。澳大利亚政府类似这样一些做法，是为了缓和历史形成的和现存的矛盾。更主要的是土著人民目前并不能形成一个威胁现存制度的力量。特鲁普通话剧团观众不多，一场戏常常只有五六十人看，剧目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揭露的问题并没有打在点子上，小骂起不了大风浪，不如以宽容来表示所谓“民主”更为有利。

澳内政部秘书（相当于我们常务副部长）的马克米歇尔先生说得很动听：“我们相信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文化才会繁荣起来。有不好的东西，市场（指观众、读者）不允许。我们信任人们的良心。”但我们细问了他们如何去管理文艺团体，他说：“我们不过问人事，只管审批工作计划、核定经费，应该拨给的就给，不需要的可以不予资助。”可见也不是真的一切不管，在补助与否这关键问题上是没有自由的，管的文章是在经济上做的。上面说过，澳洲政府对电影、电视有它的检查制度，我们的询问，是从侧面驳回他们认为中国文艺不及他们享有自由的想法。

澳大利亚国家对团结国内各民族，还有更积极的方针，这也体现在频道国家电视台的工作上。这个电视台在悉尼初建时只用7种语言，发展到现在悉尼台有57种语言广播，墨尔本台有41种语言广播。1975年开始有北京话和广东话广播。它大量输入各国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及介绍各国风土人情的纪录片，片上加英文字幕，但一律保留原来各国语言的对白。使各族人民感到澳大利亚不排斥他们固有的文化并且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

但是要建立澳大利亚独特的多元的文化并不容易，我们在澳洲处处看到英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英语是澳大利亚国语，文学创作都用的是英文写作。悉尼、墨尔本处处保留着英国式的建筑，两个大学最早的建筑全是牛津和剑桥大学建筑的翻版，学校大部分是英国学制，用的是英国课本。古典芭蕾舞，现代舞的导演，交响乐的指挥都来自英国。（《天鹅湖》男女主角演员是一对原苏联裔的夫妇。）土著人的绘画很有澳洲独特的色彩，但还没有见到把它吸收融合到澳洲现代绘画中来。我谈过话的作家，几乎都认为得过诺贝尔奖金、作品富有澳洲个性的怀特，和著名诗人劳森都已经过时了。有的作家还介绍了近年兴起要写世界性题材，追求所谓具有世界性风格的文学思潮。我对澳大利亚文学所知甚少，只看过怀特和劳森的作品。这两个被看做过时了，那么现在有哪些杰出的公认可以代表澳洲文学的作者呢？在询问中没有

一致的意见，对近年扬名的肯尼利有人称赞，有人不屑一提。似乎还没有公认的代表澳洲文学走上一个新阶段的作品。什么是澳大利亚独特的多元的文化，如何去创造、发展独特而又统一的多民族的澳大利亚的文学艺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远未解决，要达到这一目标，看来还有漫长的道路。

澳大利亚的舞蹈演员、乐队都经过严格训练，素质和基本功都很好，演出水平相当高，就是现代舞的演员，基本功也很好。可是他们的舞剧内容，虽然没有美国现代舞的虚幻、狂乱，也令人难以理解它要表现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究竟是什么。我看了现代舞《当我们展望的时候》以后，请导演乔·泰勒帮助我理解这个舞剧的内容，他的回答是，“我也说不清楚，凭你直接的感受去理解好了。有些艺术，是不必去找解释的。”我只好笑而不再多说。

我只看过悉尼的新南威尔州士立美术馆和科曼先生的私人画廊，早期的油画和雕塑，初看琳琅满目，细看后我的结论是，过去这些画家有的跟上了欧洲美术已经达到的一般的成熟的水平，但是并没有更具有独创性的画家和十分杰出的作品，有的画反映的生活内容确是澳洲特有的，但许多画的风格、手法、构图、色彩，似曾相识，可以说步步跟着欧洲走，反而没有土著人绘画能给人一种全然新鲜独特的感觉。受法国印象派影响的作品之后，就是现代派的、抽象派的了。除了其中一位画家的变形肖像画和个别风景画很吸引我以外，多数只是这股潮流席卷西方世界时的一般产物。版画协会里看到的版画，也是抽象派的作品居多。这些我还可以对其中个别作品的构思和奇特的手法有所欣赏，使我最不满意的是摆在阿德雷德艺术中心屋顶平台上的两座所谓“雕塑”，一座是几辆涂上土和石膏的破旧汽车，另一座是杂乱摆成一组大小不一的陈旧的冰箱。我认为这两位所谓“艺术家”，不过是会想出别人还没想到的点子的人，他的所谓艺术不过是愚弄人的艺术罢了，这里看不出什么思想感情内容，也感受不到任何形式的美。

我参观了悉尼的约翰·桑德斯印刷厂，机器设备全新，全部自动化。印刷品质量精美，但印象最深的一是人少，尤其管理人员少，二是厂内到处干干净净，三是噪音很小。印刷厂没有纸库、书库，用纸及时送到，印好书当时发货，连切下的零碎纸边也及时打包作为回收原料马上送回造纸厂。阿得雷德的列格拜出版社是澳洲最大的出版社，南澳最大的售书店，兼营出版和国内外发行业务。去年出版的书约 120 种，只有七个编辑，（只管审读，加工发稿，组稿由社外特约编辑负责，）4 个美工设计，两人管印刷，因为澳洲印价高，90%以上的书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印的。小说一般发行 1000 至 2000 册，通俗的侦探、谈情故事书可以销到 5000 左右，介绍花、鸟的能销 7000 到 1 万，今年有本讲钓鱼的书，已销 4 万册，还要加印。总经理戴维斯说，澳洲多数人是为消遣才看书的。专出严肃的文学创作，出版社是维持不下去的。他认为经营出版事业第一重要的就是要能出版公众感兴趣的书籍。他说：“我们不受政府控制，完全听市场的。”我在书店看到书价很高，薄薄百十页的普及本，定价都要四五元。书店里的百科全书、各种大型辞典，一些著名作家全集，美术画册，多数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出版的，很少见澳洲自己的版本。书店里图书种类繁多，外国出版物占很大数量。共同的特点是书刊的用纸和印制质量都很高。

奥兹马戏团技艺水平并不甚高，应该一提的是它只有 15 个人，天天演出整两小时的节目。每个人又是演员，又参加乐队，还兼管搭棚子，架设看台，运道具，卖票，收票。每个演员不只会一样本事，往往一人能演多种节目。

他们在开幕和节目进行中，善于鼓动观众情绪，使观众参与到表演中去，造成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气氛。堪培拉演出的歌剧《爱情的灵丹妙药》，是19世纪前期，意大利作曲家唐尼佐兹的作品，内容不足观，但演出的歌唱水平不错，值得注意的是除主角是专业歌唱家以外，参加演出的大部分是业余的演员。

澳大利亚文艺界的朋友，很关心我国的文艺政策。汉德森很郑重地问我：“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答复，你要觉得难以答复，也可以不回答。”我说：“我想我们没有不可以谈的问题，你尽管问吧。”他说：“我想知道中国的作家究竟有没有写作的自由。他们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我说：“中国作家享有充分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和决定他自己要写什么。但是社会对作家有要求，作家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写什么是有客观要求，也有主观考虑的，这种要求和考虑，都不是对写作自由的限制。而是社会的自觉，作家的自觉。我认为没有绝对的自由，你说有吗？”他笑了，沉吟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绝对自由的确是没的，我常想作家只有自己在思考时有无限自由，但真正坐下来写的时候，我就要考虑，写出去读者会有什么意见，报纸、刊物能不能刊登，这就得修改我原来的有些想法，其实，我写东西也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的。”和外国朋友摆出自己的观点，倒能互相谈得通，这是我不只一次的经验。

在澳华人约有10万至13万人，华裔教授、学者更想了解国内情况，也更关心祖国文坛，在与墨尔本大学东方学院和东亚研究系师生座谈时，围绕批评《苦恋》的问题，教授和学生都激动地提问题并和我们争论，我们几个人的回答显然没使他们完全满意。但所有的不同看法，甚至诘问，都不是恶意的。会一结束骆惠敏就跑过来拉住我说：“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人太容易激动，我不过是怕国内政策上又有什么变化，我们在海外的人怕国内政策发生变化，关心文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的心情，也许比国内的人更急切，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会后，这十几位和我们激烈争论过的朋友，和我们共进午餐，有的人带来家属，亲自驾车陪我们外出游览，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小坐，晚上又和我们欢宴一堂，对我们表现了真诚的热情。使我们深深感到他们确实是关心祖国的情况，关心国内的文艺、学术前途的，虽然有不了解，有不同观点，但并无任何恶意。我们应该做的，是坚持正确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拿出我们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事实来，并加强和海外学人的联系，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使他们能为我们对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宣传和团结工作起更多更好的作用。

阿得雷德艺术节，据说地位已居世界第二，各国作家、艺术家到这里来介绍或朗诵自己作品的片段，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当保加利亚一位诗人讲到：“我们反对外来干预”时，全场热烈鼓掌。会议也有专题讨论，有一个题目是：“编造还是写真实的世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作家周进行活动的形式，会场设在草地上的大帐篷里，关心文艺的群众可以和参加会的作家一样自由出入。不单旁听，也允许提出问题，使作家和读者打成一片。为艺术节举行的各种演出全部公开售票，什么人都可以来观看，因此艺术节吸引了广大的群众，活动完全是群众性的。可惜中国作家和主办者联系迟缓，只得到南斯拉夫代表让出的一次发言机会。会场外的售书亭里，也几乎没有中国作家的书出售。

三周访问，给我留下的最强烈的感想是：对澳大利亚在文化、文艺交流

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应该做、可以做，问题是如何采取主动态度，认真、切实地去加强对澳活动。

澳洲“天鹅城”

史宗星

“到了珀斯，别忘了去看看黑天鹅。”临行前，几位去过珀斯的朋友都这样嘱咐我。

我怎会忘记呢！亲眼目睹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的黑天鹅是我长久的企盼了。

飞机降落时，珀斯已是万家灯火。刚步出机场，一个天鹅图形的霓虹灯便闪烁在我的眼前，仿佛是在亲切致意。乘车去旅馆的街道两旁，各种形状的霓虹灯天鹅接连“飞”来，使人眼花缭乱。真不愧是“天鹅城”！抵珀斯的头一个夜晚，虽然还没见到活生生的黑天鹅，但我已感觉到澳洲大陆最西端的这座城市具有很特别的韵味。

第二天适逢周末，朋友开车带我驶向天鹅河畔。想到很快就能了却一桩心愿，我心里还真地荡起了几分激情。

刚踏上河边的草地，一群黑天鹅便游上岸来，昂首挺胸地朝我们走来。我赶紧把带来的面包片掏出来，这下子可热闹了：数十只黑天鹅把我团团围住，都伸长了脖子讨食吃。

我与之嬉戏，仔细地端详它们。如同我从别人的描绘中得到的印象一样，黑天鹅的风姿的确不凡。羽毛黑黑的，略带圆圈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随微风徐徐舒卷；翅膀展开时，能闪现出一小片白羽，更添了几分华贵和优雅。那张红色的嘴最是有趣，像叼着块红宝石似的，嘴上的白色模带宛若红宝石上又镶了一条白玉。当时，正巧有一群海鸥也钻在黑天鹅群里凑热闹，那黑白相映、天然成趣的景象，着实令我看得发呆了好一会儿。

当天晚上，在西澳州政府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我与邻座的一位女士谈起了黑天鹅。她是当地人，在州政府里任职。我告诉她上午我在河边看到了黑天鹅，而且是平生头一回。她立即高兴得眉飞色舞，那兴奋劲儿看起来比我还浓烈得多，且带有几分骄傲的神情。“啊，那就是我们西澳州的象征！”她马上递上一张名片，“你看，黑天鹅就在我们的州徽上。”我端详着名片上烫金的西澳州州徽，可不是嘛，在两只面对面站立的袋鼠中间，果然有一只正在碧波中漂游的黑天鹅。

谈及黑天鹅，她那般激动，这我完全能够理解。就如同别国人谈起大熊猫时，作为中国人的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情感的。但后来，当我阅读一些材料时却蓦然发觉，我对那位女士的情感并没完全理解。她的兴奋和激动，并不仅仅因为黑天鹅是珀斯特有的珍禽，而且还在于珀斯的发展史同黑天鹅有着某种联系。

珀斯的历史上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17世纪，一位荷兰航海家探险来到印度洋东岸，发现了一个宽阔的河口，在驾船逆水而上时，发现了一群群在别处从未见过的天鹅，黑羽红嘴，美丽动人，于是他这就为这条河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天鹅河”，从此标进地图，一直沿用至今。

又过了个把世纪，即1829年，英国人来了，看到天鹅河的河口面对着印度洋，地位颇为重要，便在河两岸建成了移民点，并以英国苏格兰的一个同名城镇“珀斯”命名。显然，那是一种殖民性质的占领，但珀斯最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笔者没到过英国的珀斯，很难做比较。听不少人说，英国的珀斯如今已比不上澳洲的“天鹅城”。“天鹅城”更美丽，更有生气。这倒不是殖民者的功劳，而是后来人们在“天鹅城”一带发现了宝藏，有淘不完的金子，也有世界上最富有的铁矿。宝藏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天鹅城”也就兴隆起来了。尽管它在地理上显得有点偏远，但这丝毫没影响它发展成一座既幽雅又现代化的都市。站在“帝王公园”的最高点上，我俯视着这样一幅画面：天鹅河将珀斯分成两半，一桥飞架南北；两岸既高楼林立，也花木葱茏；河面宽阔明净，彩帆与黑天鹅结伴同游……

澳大利亚牧场假日

史宗星

一个光亮的奶桶放在肥大的牛肚子下面，牧场主为游客示范如何挤奶。他边挤边问那些凑在前面的孩子：“牛乳上有颗小钻石，你们看见了没有？”小毛头们赶紧把脑袋伸过去，好奇地寻找着。说时迟，那时快，牧场主的手稍一用力，一束洁白的奶汁喷射而去。小毛头们“遭殃”了，脸上头上尽是奶滴，尖叫着蹦跳开去，待明白上当之后，又扮着鬼脸笑个不停……这是澳大利亚牧场假日中常有的情景。日后，每当这些孩子清晨端起奶杯的时候，想必不会不回忆起这个快乐的经历吧？

澳大利亚的牧场旅游业正方兴未艾。尽管这个国家有美丽的海湾和沙滩，湛蓝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但澳大利亚毕竟是“骑在羊背上”立国的，只有让游人领略真正的牧场风情，才能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澳大利亚。从游客方面来说，也有同样的欲望。海外来客若不去牧场一游，就如同“到了澳大利亚没看一眼悉尼歌剧院”一样地遗憾，因此，每天都有许多满载外国游客的大巴奔向各个牧场。本国的都市居民同样钟爱牧场风光，他们常于周末和假日，自己驾车，带上孩子，选一个离家不太远、花钱不太多的牧场小住几天，大人们借机放松一下身心，暂时忘却世事的纷扰和生活的劳累，而孩子们则可亲近自然，了解在都市里无法见识到的乡村生活。

于是，许多牧场主除继续生产羊毛和牛肉外，纷纷改建房舍，接待游人。有的规模虽小，却具浓郁的家庭气氛，很适合三四口人之家或一两对夫妇度假；有的规模则超过 200 个床位，像是一座牧场旅馆，适直接待海外来的大型旅游团。房舍里整洁、舒适，起居设备一应俱全，经旅游管理部门评定后定为三星、四星和五星三个级别，花费却比都市里的同类旅馆便宜好多。

牧场为游客提供的膳食，十分丰美，许多是自产的，像牛奶、鸡蛋和牛排，其新鲜程度是住在都市里享受不到的。有的牧场在客房里装上电炉、烤箱、冰箱，备有锅碗瓢勺和刀叉餐具，让游客按自己的口味和经济能力进行自炊。澳大利亚牧场和乡村旅游局的官员介绍说，迄今全国已经接待游客的牧场有 2000 多家；在全国旅游总收入（1993 年为 80 亿澳元）中，牧场和乡村旅游收入所占份额达三成半之多。

人们到了牧场，那分恬静，那分清香，让你即刻有进了“世外桃源”的感觉。敦厚可亲的牧场主还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更增添了几分情趣。观看剪羊毛和牧羊犬表演，是各旅游场必不可少的项目。数十、上百只羊儿，本来在牧场上悠然徜徉，待两只神气十足的小牧羊犬放进围栏之后，羊儿便听候牧羊犬的调遣，乖乖地聚拢在一起。这时的游人，可偎着羊儿拍照。有首歌唱到：“我愿做一只小羊，偎在你身旁”，此刻，人们便可真正地体验一番当牧羊女或牧羊娃的滋味了。

在牧场度假，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他们喂牛、喂马、喂袋鼠、挤牛奶、捡鸡蛋、骑大马……每样活动都令孩子们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他们在柔软厚实的草地上“摸爬滚打”，结识各种小动物，感受了大自然的无比美妙，增长了不少见识，为他们的童年岁月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不枉此行！”不管是大人还是儿童，不管是海外的游客还是本国的城市人，在结束他们短短几天的牧场假日的时候，都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大概正是基于来自游客的这种令人鼓舞的良好反应，澳大利亚旅游部门正加紧制定一项更完善的“牧场和乡村旅游”发展战略，据说年内出台，其要点之一是，借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良机，将牧场假日旅游变得更具魅力。

澳大利亚：蜂拥而至的“背包青年”

史宗星

一向过惯了平静、舒坦日子的澳大利亚人，这两年惊奇地发现，越来越多的来自北半球的“背包青年”闯进了他们中间。空旷、寂静的澳洲大陆因而多了几分喧闹，也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与外界的新潮。

特别是眼下这个季节，到处都能碰到来自西欧、北美、日本的青年男女，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每人都背着鼓囊囊、沉甸甸的背包，装着吃的、穿的、睡袋、药品、雨具、照相机、指南针、垂钓器、防晒油……徒步跋涉在澳大利亚的城镇、牧场、丛林、沙漠和漫长的海滩上。尽管旅途充满艰辛，还有几分惊险，这股“背包旋风”依然越刮越猛。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去年，来澳大利亚背包旅行的已达 20 万人，平均年龄 24 岁，在澳平均停留 190 天，人均每天花费 40 澳元。也就是说，这些“背包青年”不仅在澳洲大地上洒下了艰苦跋涉的汗水，而且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多达 15 亿澳元的年收入。然而，对大多数“背包青年”来说，辛劳但不觉累，花钱而不遗憾，因为澳大利亚独特、新奇的自然风光给了他们终生难得的经历和享受。

“背包青年”的长途跋涉多半是从悉尼出发，沿着东部蜿蜒崎岖的海岸线北上，经过风光旖旎的麦夸里港、科夫斯港，到达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冲浪胜地拜伦角。在那里，他们滑水嬉浪，饱晒太阳，尽情地玩个痛快后又打起背包，经过蔚为壮观的大堡礁，奔向北领地的达尔文。然后，他们折回南下，穿越荒凉的中部大沙漠，游爱丽丝泉，访艾尔斯石，一直挺进到南澳洲的首府阿得雷德。不知何时形成了一个习惯，“背包青年”都喜欢赶回悉尼附近的邦迪海滩过圣诞节。南半球的圣诞节，同北半球的景象迥然不同，不见皑皑白雪，只有似火骄阳。“背包青年”悠闲地躺在海滩上，享受着阳光，领略着海浴，有种在别处难觅的特别情趣，数月跋涉的劳累随之一扫而光。

“背包青年”颇为耐苦。风餐露宿，及节衣缩食，即便住旅馆，也是四处寻找最廉价的客栈，不像平时对床位的舒适和卫生的标准那么挑剔。他们旅行，主要靠自己的两条腿，偶尔搭个顺风车，省点力，也省些钱，但往往会“搭”出悲惨的故事来。4 个多月前，来自英国的两位“背包女孩”在从悉尼去维多利亚州途中，搭上了一辆面包车，结果一去无音信，全国上下四处找寻，她们的父母也心急如焚地从英国赶来。直到 9 月的一天，两人的尸体才在一处偏僻的丛林里被发现，其中一具用大石头压着，上面盖着树枝和树叶。消息一公布，全国震惊。自那以后，“背包青年”、特别是那些没有男伴的女孩子，再也不敢搭车了。

接待蜂拥而至的“背包青年”，如今成了澳大利亚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服务行业。这几年，全国出现了百余家背包旅游公司，还成立了全国背包旅游协会。各地已建起 102 座为“背包青年”特设的旅社。最近，也就是在两位英国女孩发生不幸之后，背包旅游协会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利用电脑系统将“背包青年”的姓名、地址等细节记录下来，通过代号 008 的免费电话加强联络。该电脑系统，可检查“背包青年”的行程信息，一旦他们在预定的时间内未到达旅社，通过电脑便多少能了解到一些情况。有人预测，随着接待工作的改进，特别是安全措施加强，将会有更多的“背包青年”踏上澳洲大陆，并无声地影响着澳洲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张神秘的肖像画

戴茸

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访问路线，我们经过澳大利亚的首都——静静的堪培拉城，直奔四季如春的悉尼。听说，悉尼是不夜城，是情侣的天堂，是孩子们的乐园，是奋斗者的战场。

我们是傍晚时分才抵达悉尼的。正式活动结束时，已是晚上 11 点了。长途旅行，再加上“马不停蹄”的会谈、参观，此时，真叫人感到疲惫不堪。

冲洗完毕，我无意地走向二楼凉台，想在入睡前松弛一下紧张了许久的肌体、精神，也想趁机看看这座都市的夜景。抬头远眺，寂静的夜空，月亮像一个美丽的大玉盘高高地挂在苍穹之中；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不停地在朝你挤眉弄眼。说实话，这里的星星、月亮看上去的确比其它地方略大些，有一小圈儿吧。访问的前几站，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后来，终于有人按耐不住了，向当地陪同询问其原因。澳大利亚朋友解释说这是真的，并不是视觉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澳大利亚距南极更近的缘故。再俯视下面的街道，嗨，好不热闹！道路上车水马龙，行行色色的人穿梭似地行进在姹紫嫣红的霓虹灯中。突然，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对情侣，只见他们俩人手挽着手，亲昵地偎依在一起。在五颜六色灯光的陪衬下，那位女士一身黑白打扮，反差很大。她穿着入时的白色高跟凉鞋，黑色超短裙，手里还挎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白色坤包，一幅时髦女郎相。然而，令我有些奇怪的是她走路的样子显得有几分做作，看上去好像有几分羞涩。

不知是什么声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起来一看时间还早，不便打开电视打扰他人。于是，我悄悄地走下楼，来到服务台，与值班的小姐聊起天来。这位小姐是七八年从另外一个城市——佩斯来悉尼求职的。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不难看出她挺喜欢这个地方，对悉尼还是蛮了解的。这里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有些还没来得及问，她已经开始主动说出来了。不知不觉，话题涉及到了旅馆附近的环境，我很想知道周围都有哪些名胜值得看一眼。没料到，她说这条街本身就是一大景观，这里是同性恋相聚的地方，来自全澳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同性恋都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此。难怪，昨夜那幕让人感到有些非同寻常的感觉。

一周下来，时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张神秘的肖像画。这是一幅仅有 96 厘米，宽 66 厘米的肖像画。画面上是三个抽象人物，他们既无性别，又无相貌，但在造型上又都各具特点。由于颜色的不同，被分别称为蓝人、红人和绿人。另外，在画面的右下角还有一只棕黄色的狗——艺术家的爱犬。这就是那幅耐人寻味、充满着无限猜测的肖像画的全部内容。

据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自从 1983 年艺术家马丁·肖将这幅画随着自己的其他作品一同在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美术馆、图书馆和剧院展出以来，引发出了千千万万的反响。不知有多少人曾在它面前驻足忘返，喃喃自语。有人说这幅画描写的是雅典的画意人体；有人说是清晰的纯影人体；有人说是内涵深沉的写实人体；有人说是稀奇古怪的抽象人体；也有人说它是上述各体的融合体。然而，肖对这些评论都不屑一顾，因为他关心的并不只是该画本身的艺术性或其价值，他想要知道的是人们对画面上这三个人各代表的是哪些澳大利亚人的猜测。为此，肖请观众把各自的姓氏、性别、年龄、

职务及猜测的结果都写在登记簿上，然后再将来自不同展区的登记簿整理编成年鉴。肖说：“这是艺术上首创的收集性文献。”年鉴忠实地记载着各种有趣的答案；有些是著名的澳大利亚人，有些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人士；有些是国内名流，有些则是在某一地区或某一特定圈子内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大名在一本又一本年鉴中时隐时现。然而，这些人中将有谁会被后人永久地铭记而连续不断地载入史册？对那些扬名一时又被后来的所“遗忘”的人又该如何看待？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那些名人生活的社会与我们现在的将有什么区别？又是怎样通过年鉴那不断变化的内容反应出来？肖坚信这些信息将是历史学家们要研究的无价之宝！

他说：“这幅画应该是一种催化剂，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这种二维艺术世界之中，并通过这种广泛的参与，使人们普遍地、清楚地看到一个社会缓缓的变化，同时也能使社会看到自身以及其在变化中的形象和价值观。”因为他希望绘画能充当一种反射镜，通过镜中的反映物使人们对艺术，对社会、对历史能有所领悟。

结识艺术家肖多年的美术馆研究员理查德先生说：已近不惑之年的马丁·肖曾向他透露过，说他以前从未画过肖像画，而且，他觉得他日后也不可能再画肖像画了。他说肖曾满怀信心地对他说：过去的10年，围绕着该画所开展的活动正在遍及澳大利亚的每个角落，同时正在向海外延伸。他希望这一活动持续10年、20年、50年，甚至100年。而随着这些年鉴的不断发展，人们终有一天会挑选出一个最能捕捉到时代精髓的形象和代表人物。理查德先生说或许这就是艺术家标新立异的所在！

当人们饶有情趣地翻开那一本本年鉴时，或多或少总是要感到一些艺术家超越艺术世界、将艺术与社会、历史、政治……巧妙地融汇到一起的匠心。人们发现在过去十年里，答案和猜测最为集中的是：蓝人——运动员；红人——电视明星；绿人——政治家，这其中也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的推断。而前总理基廷则认为：蓝人——澳大利亚工人；红人——艺术家；绿人——观众。这些都可以说是严肃而又有趣的回答。然而，这三个人研究代表的是哪些澳大利亚人？很显然，这是艺术家马丁·肖的秘密。理查德先生告诉我们：“说实话，观众和读者没有必要再去追问，因为艺术家曾发誓要将这个秘密带到自己的坟墓中去。”

我们对澳大利亚不很熟悉，故不敢贸然猜测上面的三个人究竟代表的都是什么人。只是情不自禁地感到：这幅肖像画似乎具有一种超凡的能力，唤起人们如此的好奇，如此积极的参与，大概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

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绘画艺术

戴茸

数百年前，在澳洲这块古老而孤立的大陆上，有一类与世界上其他人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澳洲土著人。那时，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语言，终年与桉树相伴，与袋鼠、鸭嘴兽为伍，过着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生活。在山间丘陵，他们栖居于洞穴中，以防不测；在森林灌木丛，他们用树枝架棚，苫以兽皮、树皮，并用它遮身御寒；在干燥的沙漠原野，他们则筑沙墙，挡风露宿。澳洲土著人就是在这种与大自然抗争的漫长的生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澳大利亚逗留不长的时间，我们发现透过澳大利亚的博物馆、美术馆，透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绘画艺术，对其土著人珍贵的历史文化可见一斑。

据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专修土著人绘画艺术的专家介绍，由于澳洲土著人在历史上没有文化记载，其文化也多半表现在口头流传下来的神化故事、歌吟、绘画、雕刻和习俗之中，而绘画是记录土著民族历史及传播土著民族文化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媒介，被人们视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形成与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在南澳的纽拉博尔（NULLABOR）发现的洞穴壁刻——土著人的石壁画，距今已有两万年的历史。这些绘画除用象征手法表现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之外，还以具象手法记录他们的风俗习惯、神化故事及渔猎生活。因此，澳洲的土著绘画又被人们称为“可视文化”。“梦创时期”（DREAMING TIME），被土著民族认为是整个世界的伊始，天空大地、人类万物皆生于此。当时，世界混沌一片，只有一条巨蟒——土著人相信这是神的化身。这条巨蟒熟睡后，梦见了土地，土地就出现了；梦见了人，人就出现了。所以，世界是由神创造的，神控制着万物的变化。这种对自然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土著人的绘画艺术之中，并成为土著绘画艺术始终描述的主题。

澳洲首都堪培拉的一位学者告诉我们，当地土著语言中无“画家”一词，绘画一般被土著人视为生活必修课。当土著人儿童长到一定年龄之后，便开始跟着长辈在各种东西上描画。随着年龄的增长，描画的范围逐步扩大，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因此绘画技能亦不断提高。不过，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土著人绘画形式基本上分为三种：石壁画、树皮画和沙石画。

石壁画是以凹纹刻在洞穴或山岩的石壁上的，因而得名。其表现内容多为“梦创时期”的神化传说及人和动植物等，绘画形式比较简单，包括几何图形和物象，一般都寓有一定的涵义，是一种视觉语言，记录或象征某种事物或事件，如河溪山峦的地理位置、祖先的足迹及捕猎路线等。石壁画又分为刀刻涂抹和直接描绘两种，所用颜料多取于画址附近的褐色、白色矿石，并将其磨成粉末调制而成，画面一般与实物大小相等。目前，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见到这种简朴的石壁画，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多集中在西澳的金伯利斯（Kinberleys），及昆士兰州的约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这些画尽管历尽沧桑，有些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依然清晰可辨。

我们在金伯利斯看到了一些石壁画，其中最为壮观的一幅画的是恐龙图。这只庞然大物，正悠闲自得地在林中的池塘边汲水，不远处还有几个人好像不敢靠近似的在一旁注视着。恐龙头顶褐色的颜料十分清楚。

沙石画则可以说是居住在沙漠地区的土著人创造的杰作，多集中于澳大

利亚中部的沙漠地带。主要以沙石、树枝、木炭和羽毛等物做画，在一块平整、洁净的地面上构成一定图案，然后用颜料、动物血在上面描抹，表现的主题大都为神话故事。这种沙石画多用于祭祀仪式等，仪式结束后，一般不再保留，因此，没有太古老的作品保存下来。

树皮画的历史不像石壁画那样悠久，是近一个世纪在澳洲土著人中盛行起来的，现已成为土著人绘画的最高艺术成就之标志。其内容也以“梦创时期”的神话为主，还有大量表现袋鼠等常见动物和狩猎情景的内容。在表现手法上，既具象征性又显抽象性，其突出特点是土著人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运用了西方现代绘画技巧，以点、线、圆、几何图形形成固定图案来代表一定的事物，构成画面，传情达意。这些画看上去颇似西方现代装饰画，其实，它业已成为土著人的典型艺术作品。

在悉尼的一家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一幅保存尚好、距今约有百年的树皮画。画的是猎人正在追逐一只硕大的袋鼠。在这张完整的按树皮上，袋鼠几乎占去了画面的5/6，或许是艺术家有意识的夸张。而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四肢、躯干，甚至它的五脏六腑都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因为画家运用的是一种透视法。原本透视法像照X光一样，能将生物的骨骼再现在平面图上，澳洲土著人的这种透视法似乎超越了X光，更进一步将生物的内脏勾画出来。据说，老一辈的土著人能够“读懂”这种绘画的内容。树皮画的材料在澳大利亚垂手可得。生长笔直的桉树，其光滑细密的浅褐色外皮为这一绘画形式提供了天然优质的材料。土著人将树皮割下来，经过烘干、压平后，以树枝、人发或植物纤维束等为画笔，用赭石、土块、锰石、木炭和蛋汁、血、兰花汁为颜料。近年来，也有人开始使用化学树脂颜料来作画。树皮画的传统颜色为黑、白、赭红、黄四种。由于树皮画易于携带、保存，使土著绘画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不仅绘画数量大增，而且表现的内容与风格更加丰富多彩。

澳洲土著人在从事绘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本民族的绘画传统，使其像一种有形的文字记载着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这一幅幅作品犹如一个个历史画面，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以及浓厚的原始文化气息。这种用自然的方式再现自然原貌的视觉艺术形式，可以说是澳洲土著人的独特文化传统。

三游悉尼港

唐永兴

悉尼港是世界名港，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它又是游览之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200 万澳大利亚人今年在这里大规模地庆祝澳大利亚开国 200 周年，因为它是这个南太平洋国家的诞生地。

歌剧院“扬帆”欲出海

我第一次游悉尼港是在游船上参加一个午餐会。边进餐，边游悉尼港。

游船离开码头往东行驶，一幅独好的风景画映在背后：单拱形的悉尼大桥飞架南北，把悉尼南北两半连在一起。大桥南端，是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在歌剧院后面，大银行、大公司、大饭店的高楼鳞次栉比，黑压压一片，好像是哪个孩子在他爸爸作画的时候，在画面上胡乱地涂了几笔墨水，却弄拙成巧，非但没有破坏整个画面，反而把悉尼港的景色烘托得更加突出。

画面的主景是悉尼歌剧院，它那大小不等的十个贝壳形屋顶有分有叠，像一叶叶风帆，在初秋的阳光下，那乳白色的瓷砖贴面看上去更加白净、明洁，与蓝色的海水交相辉映。从远处海面上眺望，歌剧院就像一艘出海的航船。

游船在港内游弋，许许多多的小艇，鼓着风帆，有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各种颜色，侧畔而过。在远处和近处，还有一些帆板爱好者脚踏一叶木板，手扶片帆，随风滑行。

可是在 200 年前的 1 月 26 日，当英国的库克船长率领一支 11 只船的船队，载着 736 名英国犯人在这里登岸时，这里灌木丛生，满目荒凉。随后英国犯人和移民以悉尼为基地，越过西边的兰山山脉，把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比中国小 1/5 的澳洲大陆，从此这块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成了以欧洲白人为主的发达国家。

吞吐货物千万吨

游悉尼港，还得游里港。商港就在里港。

里港湾多水深，水面宽阔。因为离出海口有 10 多公里，并且拐了几个弯，所以风平浪静。这里库克船长决定在这里登岸定居的原因。

我第二次游悉尼港是陪同一个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船只往东开，游外港，观赏悉尼歌剧院，后掉头西行，穿过悉尼大桥，进入里港。

一个个码头景色出现在眼前。

那是达林码头，停泊着正在卸货的散装货轮。

在格列比码头，几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正在装货，巨大的吊车代替了成百上千人的劳动。

在粮食装运码头，几条封闭式传送带像巨臂那样向外伸展。如果它们同时传动装粮，会把吨位小的粮船冲沉。

再往前是怀特湾的集装箱码头和蜗牛湾的木材码头。

商港码头总长有 16 公里，货物吞吐量每年在 2000 万吨以上。因为悉尼

港目前已达到饱和状态,所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港口已在悉尼港以南 10 公里的植物湾建成。1788 年库克船长在悉尼港登岸之前,先来到了植物湾,但他认为那里风大浪高,不宜建港,不宜成为一个定居之地,于是放弃了这块地方,继续北上到了悉尼湾。然而,200 年后的今天,随着世界建港技术的发展,植物湾新港成了悉尼市第二良港。

曼利冲浪戏水

曼利,在悉尼港的北角。那里滩浅,是游泳避暑之地,又是冲浪运动的地方。

这次我是陪一个艺术团去曼利。船从悉尼歌剧院出发,因乘的是飞翼船,所以十几公里的航程,只用了十来分钟时间。当游船从 1500 米宽的海港入口处飞驰而过时,那浩瀚的太平洋一线连天,真是极目天舒,令人心旷神怡。

十月季节。北半球秋高气爽,南半球却已春意正浓。虽然还不是游泳季节,曼利海滩显得十分宁静,但在远处洁白的浪尖上,有几个黑点在移动,那是有人在作冲浪运动。

冲浪运动是运动员站在一块狭长的冲浪板上,在海浪中滑行。他们霎那间被颠上了浪尖,忽又滑入谷底,一起一落,忽隐忽现,要点胆量和技巧。一旦身体失去平衡,板飞人翻,但转眼之间,他们又窜出海水,踏上冲浪板又去海浪中滑行。

1960 年的世界冲浪运动比赛就在曼利举行。这一运动已成为澳大利亚人喜爱的一种运动,目前参加者有 25 万,他们中有不少世界最优秀的选手,曾在近几届的世界冲浪大赛中获奖。

海豚表演

唐永兴

随着一声哨响，球被一只海豚抛到空中。表演开始了。

顷刻之间，球又落入水中，随即又从水面托起，飞上看台，引起观众一阵骚动。这是另一只海豚的表演。

这是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马里兰水族馆的一场海豚表演。看台上一阵骚动之后，海豚表演馆又陷入一片寂静。

两只海豚都亮了相。它们听辛普森发出的哨声指挥。海豚的听力很强，比听力最好的人还强五六倍。辛普森是海豚表演的训练者，又是“导演”。

一只黄球吊在离水面七八米的高空，海豚将出水击球。辛普森一声哨声，第一只海豚出水，它就像从水下发射的导弹那样升空，几乎以垂直的角度射向黄球，用头击中目标。接着是第二只海豚的表演，它以同样的动作出水、升空，但到达目标时，却一个180度的转身，头朝下，尾朝上，就在那一瞬间，它用尾击中了黄球。两只海豚的表演双双获得了成功，其准确度好像是事先经过计算了似的。辛普森说，后者比前者难，算是绝招。

真是不可思议！看台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海洋动物中，海豚算是表演大师了。

马里兰水族馆有海狮和鸬鹚表演。在陆地上行动十分笨拙的海狮下到水里，立刻变成了一流的游泳好手。两只海狮在池水中以箭一样的速度追逐捕捉小鱼，表演了它们的游泳天才。但同海豚比较起来，海狮的表演只能算是二流的。水族馆还有几只鸬鹚，其中一只鸬鹚曾在电影“风暴少年”中担任重要角色。电影拍完后，它作为明星回到水族馆，同其他几只鸬鹚一起表演，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海豚接着给观众表演了“投篮”和“双豚舞”。投篮不是百发百中，也有失误，但命中率算是高的。“双豚舞”有点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女子花样游泳比赛，两只海豚同时表演，动作默契，轻松自如。

钻圈是最后一个节目。钻过水面上空的圆圈，要求力量和技巧，并非轻而易举。但是两只海豚都获得了成功。第一个圈蒙着一张白纸，随着哨音，海豚出水、升空，以鱼跃姿势，穿透薄纸而过，溅落水中，动作干净利落。第二个是钻火圈，另一只海豚也以常人不可相信的正确性，一钻而过，尽管烈火熊熊，看上去也怕三分的。

绝妙的海豚表演，给游客增加了知识和乐趣。在阵阵笑声之余，谁能知道，训练海豚表演，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辛普森说，耐心是训练海豚钻圈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训练陆上动物有时辅之以拷打、威吓，但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训练海豚。他还说，如果在训练中海豚出现烦恼，必须马上停止训练。

辛普森还谈到了他训练海豚钻圈的方法。他说，训练海豚钻圈是先将圈沉没水中，海豚每钻过一次，就喂食一两条鲜鱼，随着时间的推移，圈逐步提高，露出水面，一直升到空中，如果海豚一钻而过，就算初步成功。训练高空击球的办法也一样。

在训练中，鲜鱼自然必不可少，而且要活鱼才好。

这种别开生面的海豚表演，为这个水族馆增加了许多的门票。但是为了

保护海豚的健康，水族馆每天只安排两场表演，上午和下午各一场，以免海豚过度紧张和疲劳。

悉尼“谊园”

王孟兰

说起悉尼，人们往往只想到贝壳形的歌剧院，恢弘的海港大桥。其实，悉尼还有不少好去处。坐落在达令港畔、与中国城毗邻的“谊园”便是引人入胜的一景。

“谊园”乃友谊之园。1988年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前夕，悉尼华人社团倡议兴建一座中国花园，作为中澳两国人民友谊的像征。此举很快得到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赞同，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和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已分别结成了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于是，由广州园林局负责设计，指导营造，与新州港务局合作，历时一年余，占地一万平方米的“谊园”按期落成。

“谊园”面向海湾，帆影鸥波，涟漪万顷，颇得城市山林之趣。其结构运用了传统中国园林手法，寓开合回环于十数亩纵横之内，凿地为湖，叠石成山，以水为中心，环绕水面运用山、水、石、树和建筑物合理布局，构成了“门庭景区”、“竹石山房”、“山涧瀑布”、“翠峦云阁”、“山林野趣”等诸多景区。楼台亭阁、山水桥石、树木花草，丰姿多彩。

一对石狮，威武地站在大门两侧。曲折的回廊，像两只大臂膀，从大门内左右张开，环抱湖水。亭间嵌空龙壁，仿戏水以争珠；竹石山房，待鸣琴以引凤。园的后部，转为石径，蜿蜒而上，到达山巅，即是园中的最高建筑物“澄观阁”。它有三层檐，呈六角形，金黄瓦，朱褐墙。于此俯视湖水，波光潋滟；远眺港湾，海风徐来，令人心神俱爽。转身望去，蓝天白云间是悉尼高塔和摩天大厦，与眼前的古典亭阁绘于同一画面，既协调又新异，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园中无论是亭壁树石，还是室内陈设，无不浓缩着中国园林艺术的悠久历史，饱蘸中华民族文化的乳液。石狮巨龙，栩栩如生。诗书画廊、琴棋茶舍、桌几锦屏，别有一番韵味。松、竹、梅、荷、兰、菊木雕画，李白、杜牧、李商隐的佳句，更为园林添诗情画意。“石舫”棋盘，跃马飞车攻围破阵，“文轩”茶室，幽幽茶香品茗叙情。就连山脚下那片石林，也惟妙惟肖地向人们叙说着阿诗玛姑娘和邪恶作斗争的中国民间故事。园内还有不少对联佳作挂于亭上。在“梨香荔影”亭有这样一幅：创业辟荆榛，市尘康衢，瀛海今看新世界/登临遣客思，红棉丹荔，故乡同此好湖山。勾画出侨胞在异乡建基创业的艰辛和遥思神州故土的恋情。游临此处，远方游子怎不触景生情！

“谊园”无处不展示中澳友谊情怀。那匠心独运的“双亭”、“双龙壁”，分别象征姐妹省、市。堆砌假山、石兽的石灰石产自新州，有的是5亿年前泥盆纪的石头；影壁石则来自广东南部山区，属于稀有的风化石灰岩。从广东移来的红棉、梅花、丹荔、牡丹、杜鹃、榕、榆、柳遍植园中，因悉尼气候常年温和湿润，故园内一年四季姹紫嫣红，花香扑鼻，柳枝低垂，竹叶青翠。

作为悉尼一必游之地，“谊园”引来游人络绎不绝。没到过中国的游客来到园内，犹如踏上了华夏大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步入此地，如同回到了久别的故土。

重温淘金梦 ——记澳大利亚旅游胜地金币山

王孟兰

从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驱车西北，沿高速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便到达小城巴拉腊特。140多年前，这里曾风靡过举世瞩目的淘金热。如今，它变成了一处旅游地，每年引来游人不下50万。它的迷人之处在于金币山——一个仿古的历史园区，一个坐落在早期金矿区的露天博物馆。它曾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过澳洲全国旅游和博物馆两项大奖。

踏进金币山，如同走进了时间隧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洲淘金埠展现在眼前，使现代人得以重温早期淘金者写下的那段有汗有泪也有欢笑的历史。

整个园区由古城镇、矿区和淘金博物馆三部分组成。古城镇有40组仿古建筑，其构造和风格均由建筑专家悉心研究过，酷似上个世纪的建筑风貌。纵横交错的街巷两侧，建有住宅、商店、剧院、学校、报馆、糖果店、面包房和铸造厂，就连为游客服务的银行、邮局也是按百余年前的风格建造的。镇上的居民、店里的伙计、旅馆的侍应、街上的警察、小学的师生全是上个世纪的装扮。游客可在商店里购买淘金热时代的古物，可观看工匠们从事毛瑟枪射击、手工制造糖果等现今已经失传了的生产工艺和活动，也可到学校和小屋里逛一逛，与装扮成当年的矿工和居民的人聊聊天。女士们尤为高兴，因为她们在这里能买到据说是那个时代存下来的布料。在照相馆内，人们则可以拍一张足以乱真的古装照片。街上不见汽车，只有19世纪的英式四轮马车穿梭往来，坐在车上的人全像当年来自英国的绅士和贵妇人。

矿区和淘金博物馆展出的设备，多为当年的实物。博物馆里有当地产的颇为独特的冲积金、天然金块和金币，也有以雕塑、油画形式展现当年世界各地的淘金工人蜂拥而至的热闹情景，游人可进入长达600米的地下矿井，了解不同年代用不同工具挖金的方法，从最初的镐凿手挖到后期的锅炉蒸汽动力，由初期凭经验找矿到后来使用探测器。坑道里塑造了许多矿工蜡像，形像逼真，使人对他们度过的艰难岁月一目了然。

金币山当年也曾留下华工的足迹。据史料记载，1858年，巴拉腊特的华工曾达到过7500多人，占当时小镇人口的1/4。矿工生活区里至今保留着一个“中国村”，村里有关帝庙和中药铺，墙上贴着汉字写的告示。华工们的勤劳精神，从那保留下来的猪圈、鸡圈和屋前房后的小菜园可见一斑。

虽然那股淘金热是百余年前的事了，但今日的游客仍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安排游客亲手淘金，大概是最迷人的项目了。在一条从昔日金山上流下来的水溪旁，总是挤满一群又一群的游客。他们把沙子铲到铁盆里，在水中反复冲洗，希望能淘出那种闪闪发光的小东西来。有时你会看到有人端着铁盆在水中左右筛上几下就能露出金沙，使得许多痴情的游客以为淘金竟是如此容易，于是也仿照着淘了一盆又一盆，久久不肯离开。其实，那些“走运”的人，不过是旅游机构安排的“演员”而已。

今日的金山，几乎使得去墨尔本办事或旅游的人没有不去一看的。它何以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黄金？因为它厚重的历史？还是因为澳洲旅游机构的精心策划？我想，许是兼而有之吧。

澳大利亚沙漠之旅

杨荔

初到澳洲，就听人们谈起中部有一片面积相当于法国大小、景色奇特的大沙漠，我们一行趁秋末冬初之际，乘机直飞沙漠腹地的绿洲之都——艾丽斯普林斯，开始了沙漠猎奇之旅。

飞机开始下降，电视屏幕地形图的箭头已指向辛普森沙漠地带，我侧身朝下望去，只见绵延不断的沙丘之间散乱地耸立着一块块赭红色的岩石，导游介绍说，中部沙漠地势平坦，最高处也只有 125 米。由于地貌特殊，气候格外燥热，早晚温差很大。十一二月份盛夏时节，白天最高温度接近 36 摄氏度，夜间则只有 20 度左右，因此这一带流传着“早穿棉袄午披纱”的谚语。

泉城——爱丽斯

飞机降落在艾丽斯普林斯城，这座美丽的泉城位于托特河的源头水洞左侧，因有一条四季不断的温泉流经这里而得名。汽车开出机场不远，便可看到散落在绿草繁花间一幢幢各式各样的小别墅。进入城区，但见绿树护卫的街道两旁，楼宇大厦林立，公司、商场、银行、邮电大楼、酒店、夜总会和娱乐场所都建在城区中心，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博物馆则环绕四郊，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市政规划井然有序，来往车辆飞驰而过，整座城市像是掩映在绿荫之中。这片天然绿洲，像是造物主有意镶嵌在大漠黄沙中的一块翡翠，使人忘记了此刻正置身于沙漠中心地带。

小憩片刻后，我们前往参观古居民住宅展。一跨进展厅，那站在用石块垒成的小屋前腰系麻葛、身披树叶、手执长矛的古代原住民泥塑和石桌上陈列的种种磨打而成的工具、武器，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蛮荒时代。据讲解员介绍，澳洲中部的原住民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古代史，根据这一地区发现的岩画推断，在被史家称为“梦寐时代”的 1.8 万多年以前，土著人的祖先就生活在这一带，他们以狩猎为生，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直到 1200 年前后，才有极少数欧洲和阿拉伯的皮货商来这里定居。而那些被后来的殖民者任意驱赶、残酷压榨的原住民，多数已死于非命，少数幸存者的后裔，至今仍留在这片荒漠之中，但人们似乎忘记了只有他们才是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主人。

随后，我们参观土著人艺术画廊。这些画有的画在剥下来压平的树皮上，有的画在一种粗纤维织物上。作画的颜料是用土矿石研磨成的乌黑、赭红、鲜黄、草绿、深棕色粉末。图案多以各种几何图形和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画面上除手舞足蹈的人物外，都是些袋鼠、蜥蜴、海龟、蟒蛇、大鱼、长嘴鸟之类的动物，手持刀叉弓箭的人物的比例反而很小。我想这大约是原始社会人类还无法主宰自然界的一种反映，也许还寄托着他们的信念、向往、欢乐和哀思。但那绚丽明快的色彩，简洁奇巧的花纹图案，抽象夸张的形象和丰富的想像力，仍令人赏心悦目。环绕泉城二三十公里内，有许多奇特的景区，出城朝西南方向走不多远，便可看见一大片被风化的崖壁所形成的峡谷，想必这就是澳洲著名的“国王峡谷”了。我们一行沿小径走入谷中，只见一根根巨大的石笋耸立两旁，在众多的石笋中，有一块特别突出的巨石，高踞

于众石之上，大约就是人们想像中的“国王”了吧。穿行在连绵数公里长的石笋间，不得不折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离此不远，还有一片方圆数公里的“棕榈谷”。向北行不远，便是中部最大的驼鹿牧场，还有别处很少见到的软木树和白木树林及寄生在密林间的一种体形较大的热带壁虎。而很少见的毛色灰黄的小石袋鼠，则在林间蹦来蹦去，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这一群陌生的游人。

神奇的“大独岩”

清晨，驱车从泉城出发，朝西行不远，便进入了大沙漠，车后卷起的黄尘滚滚，遮天蔽日，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忽然，导游叫了一声“快看”！大家抬眼望去，只见远处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横亘着一块赭红色的巨石，这就是闻名全球的奇幻大石“大独岩”了。巨石有300多米高，长约3公里，宽2公里，远看酷似一块摆在巨大沙盘里油光发亮的条形大面包。导游告诉我们，这块奇幻大石会随着阳光的强弱和不同的照射角度，不断地变更颜色，因此土著人把它当作与宇宙同在的神石顶礼膜拜。

正谈笑间，太阳忽地从地平面一跃而起，刹时间，那灼灼金光撒向无边的沙漠，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把大独岩染得红亮，远远望去活像一块硕大的红宝石。大家催促司机加大油门，一心想看个究竟。车到大独岩脚下，一群牵着骆驼的土著人拥上前来，在主人的搀扶下骑上骆驼，更增加了沙漠之旅的乐趣。

我们这支驼队绕着大独岩转悠，只见石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洼，上面几乎寸草不生，最奇特的是，随着太阳照射角度的变化，从不同的方向看，大独岩的形状、颜色不断地变幻。在灼热的沙漠气候中，绕石而走，一个个热得大汗淋漓。但大家兴犹未尽了，又顺着岩背的石级爬上了岩顶。站在这大漠中的高台之上纵目远眺，那一望无际的莽莽黄沙，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闪烁，令人感到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我们顺着导游的指点朝西望去，只见绵延的沙漠中有20来个隆起的圆形小山包，看上去活像一个个散放在沙盘中的窝窝头，这便是著名的奥伽斯山了。

气温越升越高，大家仍不肯就此罢休，决心登上奥伽斯山以领略大漠奇观。等走到跟前才发现，原来一座座兀突的石山竟相连成片，其中最高一座山峰高达1000多米，大家攀登到岩顶，只见那20多座山包全环绕在主峰之下，这一奇特的景观所展现出的那种恢宏粗犷的气势，使人胸臆顿开，感到大自然真是奥妙无穷。

沉寂的国都

张奥列

生活在澳洲，方知圣诞节、复活节在西方社会的斤两，其隆重其热闹，有如中国的春节。可惜圣诞节我糊里糊涂打工错过。难得复活节有假，便也潇洒一回，与莘到首都堪培拉观光。

在世界众多国都中，堪培拉可算默默无闻。它既不是举足轻重，也非历史悠久。说来也有趣，澳洲国都不设在两个最大的海滨城市悉尼或墨尔本，而偏偏选在僻静的山地小城堪培拉。据说立国之初，地盘不大但实力最强的两个州——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都要求定都于各自首府悉尼和墨尔本。200多年前，英国船长库克发现澳洲东海岸，将之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宣布为英国所有。稍后，新南威尔士第一任总督菲腊船长率领的一支船队，载有700多名男女囚犯，600多名水手、水兵和其家眷，在悉尼海湾登陆，建立起第一个移民点，拓荒种植，开发悉尼。是日为1788年1月25日，即澳洲开国日。维多利亚虽然于1851年才归属英国，但澳洲国庆日是采用其沿用的澳洲日为正式名称。两州皆为定都何方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只好来个折衷，在悉尼与墨尔本之间的堪培拉，新建国都。

从悉尼到堪培拉，只有300多公里，且有高速公路贯通，自己驾车前往并不费事。但人们多愿意随旅行团游玩，更为省便。悉尼的华人旅行社很多，费用大抵比西人旅行社便宜。堪培拉一日游，价格一般为二三十元。我们团的导游是一位留学生北京妹，满口京腔颇为悦耳，只是同车不少讲粤语的团友未识欣赏。不谙粤语的她也只好点头敬请大家原谅。

赴堪京途中，路过高宾，有一片颇为壮观的古堡群落。导游小姐说，那就是澳洲最大最古老的监狱。大家“哗”的一声，不知是叹其雄奇古拙呢，还是联想到澳洲人的祖先。尽管4万年前澳洲已有土著栖身，但澳洲开国是英国囚犯却是事实。当是正值美国独立，英国不得不改用澳洲作为流放囚犯的新监仓。在澳洲第一个成功种植小麦、粟米的人，便是随菲腊船长登陆的囚犯路斯，从而揭开澳洲开发的序幕。澳洲开国的头100年内，共容纳近20万名囚犯，约占当时澳洲人口1/9。虽然1850年的淘金热，使成千上万的自由移民涌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共吸收了500多万由100多个国家或民族构成的移民，约占现时人口的1/3，但在国人甚至世人眼中，并没有抹去祖先囚犯的影像。“澳洲人真不幸，没有中国人那种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优越感。”导游小姐说。我却想，或许正是这种潜在的心理阴影，令澳洲人在国际舞台上从不大叫大嚷，较少介入世界纷争，而埋头于打理自己的家园。故此在当今世界动荡之中，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没有政治危机、国土分离、经济溃败的恐慌，无论是天然气候、政治前途、经济环境等方面，仍然是世界上难得的一片“乐土”。

堪培拉郊外有个私人开设的“小人国”。里面的景点自然是欧陆风情的缩影。不过，我们很快便溜完了一遍。莘说，这张门票不值。确实，与深圳“锦绣中华”相比，无论其规模、色彩、布局，它都是“小巫见大巫”。导游小姐又有高论：拿来主义并非不好，把别人的精华拿过来消化、吸收、熔铸出自己的面貌，不也是一种创造？！是的，聪明的民族，不仅善于发明，更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别人的发明。我真想建议“小人国”的主人也到中国深

圳走走。

旅游车把我们载上必丽山。听说山上有袋鼠出入，大家都瞪大了眼睛。谁都知道，袋鼠是澳洲特有的珍贵动物，也是澳洲形像的标记。连英王乔治五世于 1912 年赐予的澳洲国徽，也以袋鼠为图案。可惜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不解人意，躲着不肯见客。虽然无缘结识袋鼠，但我们在山顶的电视塔上着实领略了堪培拉全景。30 万人口的堪培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漂亮整洁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是在一块旷野空地上特意为国都而设计而建造的。据说当时组织了一次国际性的设计比赛，广泛征集的设计方案数不胜数，而夺标者却是一位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沃尔特·格里芬。其设计小巧玲珑，很有艺术性。它以山丘上的国会大厦为圆心，主干马路向四周放射开去，鲜花盛开的街道和建筑物围绕圆心层层展开，恰如一个瑰丽壮阔的大花圃。驱车进入市区，马路宽敞笔直，许多富于个性的住宅散落在花木草坪中，周围很安静，难得见上几个人影，恰似世外桃源。只听导游小姐说，这里每逢节日假日，人们大都去海滨度假。“首都人的生活真写意。”莘叫道。“这里是政治中心，没有繁华的商业，丰富的娱乐，政治家的生活也许很枯燥哩。”导游小姐突发奇想。“怪不得霍克退位后也赶紧搬到悉尼的海滨别墅居住。”我也说。

正说着，我们忽然被蓝天中挂着的一条水柱所吸引。原来那是以发现澳洲新大陆的船长命名的库克喷泉。水柱腾空约 140 米，水花随风飘散，织成烟雨濛濛的雾幕。穿越雾幕，不远便是使馆区。使馆区不愧为世界建筑风格博览。各国使馆都力图显示其民族风采。不过，最有气派最为醒目的莫过于中国大使馆，连旅行社都把它列为堪京一景。那金黄色的琉璃瓦显得富丽堂皇，赭红色的砖墙却有几分庄严感，曲径长廊、飞檐拱门，枫叶柳影，则清幽深邃。这座古典风格的宫廷式建筑，如果在北京街头倒是很平常，但在此间，却大有傲视群雄之貌，连美国大使馆都似乎退避三舍，深藏密林中，惹得人们拍照兴趣大增。许多华人刻意站在使馆大门的铜招牌下立此存照，脸上分明带有几分得意。堪培拉所有房屋，无论是政府机构，商家物业，私人住宅，都一律没有围墙。惟独中国大使馆被白色的铁栅栏围起。它既能让人的视线穿越栅栏，不违背筑墙的禁规，又使人望而却步，起隔离作用，其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如果不是看到栅栏上写着的使馆办公时间，我几乎真的忘却午休这个宝贝。来澳后，我已没有尝到午休的滋味了。开初一到那个时间，便倦意袭人，而那又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容不得你养神。入乡随俗，渐渐也能提起精神了。澳洲人是没有午休这个概念的，而大使馆还能与大陆作息时间保持同步，也许是善于处理劳逸结合吧。

参加旅行团，我有个念头，想看看首都究竟能向人们展示些什么。参观国会大厦便是一日游的重头戏。国会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权力中心，国会大厦则是政府的办公楼。它并没有因此而戒备森严板着面孔审视公众，而是对外开放，让世界各地游客随意参观，其实也是展示国家形像的一个机会。国会大厦侧看像个圆圆的山包，绿色的草皮一直铺上大厦之顶，正看则是门面光亮恢宏的现代建筑。大厦顶上 80 多米高的巨大的四脚铁架旗杆直插云霄，一面深蓝色的澳洲国旗迎风飘扬。“中国人酷爱大红色块以图吉利好彩，而澳洲人则喜欢深邃的蓝色，为什么？”导游小姐发问。我不知道。不过，四面环海的澳洲与蔚蓝色的大海结下不解之缘。澳洲新大陆便是在航海中发现的；现时 1700 万人口的绝大部分，也都居住在漫长的海岸线及其附近。可以说，海洋孕育了澳洲这个国家。孕育了澳洲独特的文化。深蓝色的国旗，

倒也体现了澳洲海洋文化的品格。澳洲以前一直使用英国国旗，1901年成立联邦政府之后才选用这面国旗。它左下方是一个七角星，代表当时的6个州和首都。而左上方却是英国国旗的米字徽号，多少留有了历史的痕迹。在自己的国旗上留有别人的旗帜，对于许多独立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澳洲人来说，未免不雅，于是便有更新国旗的呼声传出。总理基廷也表示，澳洲正力争主办2000年奥运会，届时希望能出现新的国旗。何不为这面行将成为陈迹进入博物馆的国旗留个影？我和莘正想着，一位牵着松毛狗晒太阳的西人趋前问道：“我可以帮你们忙吗？”比起商业城市，首都人似乎更质朴热情。他显然看出我们是外地游客，便主动帮忙，让我们和这面国旗定格于历史的瞬间。

也许是节日，参观国会大厦的人真多。我真不明白平时是否会打扰官员、议员的办公。富丽堂皇的大厦俨如一座博物馆，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及文献真迹。墙上挂满了历任总理的油画肖像，一个个绅士风度，可惜对我来说相当陌生。走进议会厅，我倒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在电视上常常看到议员们在此议事和争论。我坐在议会厅的后座，权当了一回“后排议员”，也体验一下主政14年之久的前总理霍克下台后坐在这个位置时的心境。后来他干脆退出政坛，当他的社会学客座教授和电视台时事节目主持人去了，不失为一条好汉。接任者基廷，则在台上与反对党展开了唇枪舌剑。西方国家机器的运转，似乎少不了党派之争的润滑剂，但这种相争却是惊人的、无情的。国会几乎成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战场。反对党领袖侯信刚在自由党妇女会议上声称，他突然明了现代女性所拥有的抱负和价值观。基廷即在电台上抨击，工党政府为妇女提供了多项福利，反对党却只想推行消费税，令持家的妇女百上加斤，“侯信究竟为澳洲妇女出过几分力？”基廷还翻出老底，说侯信前年接受杂志访问时，曾声言他理想的太太只需拥有一排洁白的牙齿，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厨艺便足够，他是一个满口大男人主义者。侯信也不示弱，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基廷只懂在电视上滔滔不绝发表各项声明，但却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完全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举动。今年2月，英女皇伊丽莎白访问澳洲，上任伊始的基廷当着女皇之面宣称，澳洲要割断与英国的“血缘关系”，不再成为英国的影子。此言一出，国会成为应否改制共和的论争战场。倾向于英国王室的名流立予抨击，而主张共和者则趁机鼓吹。有两份杂志发表了民意测验调查，结果相近。虽然民众对澳洲改制共和的支持令接近半数，但较之70年代已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真没想到，联邦最高法院也成为旅游景点。坐落在格里芬湖畔的最高法院，建筑设计上颇为讲究。横卧的架构，庄重沉实；落地大玻璃，通体透明。法院，在人们心目中以为是森严之地，是非之地。但大厦内的布局，从大堂、楼梯到法庭，都很有艺术感，甚至嵌有现代派壁画。几个庭都不大，约容纳百人上下，但都很精巧，且煞有介事。在澳洲，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庭裁决也是权威的。今年初，堪培拉主教给10名女性颁发牧师神职，引起教会哄动。教会入禀法院，但法官却认为没有合法的条例可阻碍女性接受神职任务，故开庭裁决原告败诉。近几个月来，法庭审理个案最为哄动的莫过于阿伦奔达之案。在澳洲，似乎无人不知晓大名鼎鼎的阿伦奔达。这位被年轻人奉为创业英杰的地产、矿业巨子，在澳洲举足轻重，不仅拥有电视台、电讯公司、美国酒业集团、英国村落、梵高名画，且1983年其游艇在国际大赛中赢取美国杯，被欣喜若狂的澳洲人视为国家英雄。但去年他以债易债的秘密武

器被人缴了械，公司宣布破产清盘，正由组省法院立案审理。近日珀斯法院却判他某行为非法，锒铛入狱两年半。当法官说，判刑是唯一选择时，阿伦奔达两手交叉放在前胸，面无表情，而与他生活了37年的前妻则当即流下了眼泪。这位澳洲最著名的企业家竟戏剧性地沦为囚犯。真是几番春风得意时，今日变成阶下囚。

隔着湖湾与国会大厦遥遥相对的战争纪念馆，是一日游的压轴戏。战争馆像一座古朴的城堡，赭色的墙垒，绿色的拱顶，构成一种肃穆的氛围。它不仅详尽无遗地记录了澳洲军人参战的每一次或胜或败的战斗，实物展示经过战火硝烟的澳军装备，更令我惊讶的是，在馆中左右两面大墙上，竟密密麻麻刻下了澳洲军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部阵亡者名字。其中大部分殁于二次大战，仅在南太平洋岛屿的某次战役中，阵亡将士就逾五千。不过，能够将一个世纪以来的烈士全部铭记下来以示后人，这在世界上恐怕也属罕见。澳洲决非军事大国。它地广人疏，没有内战，且被海洋包围，没有疆界纷争，也不想扩张，无意发展军备。但作为英联邦国家，一次大战便派有澳纽军团赴欧洲战场参战。二次大战除北澳达尔文市曾遭日机多次空袭之外，本土并无战事。但澳军也被派往南洋接替英军抗击日军，并与美军并肩作战取得珊瑚岛战役的重大胜利。正是这两次大战，给澳洲军人带来崇高的荣誉。今天的军人节，便是当年澳纽军团的出征日。军人节是澳洲的公众假日。这一天无疑是军人的骄傲，上至总理、省长，下至市民、学生，都与老兵、现役军人一道举行庆典。天蒙蒙亮，借着嘹亮的军号，云集的老兵就开始祈祷、步操，重现当年之勇。在悉尼市政厅旁的一块青草地上，我看到许多男女老少轻轻地放上十字架，上面写着烈士的英名。十字架按照不同的军种、兵种佩上不同的军服颜色，分队排列，有如阅兵的方阵，气势不凡。全澳所有军人纪念碑前，都堆放了香气沁人的鲜花环。这天街上的军人特别多。许多身穿西服、手拄拐杖的老兵，佩戴着满胸丁丁当当的军功章，一脸自豪。连不少老妇也身挂勋章，或许也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而许多现役军人，则挽着漂亮女郎，一路欢笑。这是几代军人最开心最风光的一天。

夕阳西照，使花园之都堪培拉更富于诗情画意。沉寂安闲的国都，也似乎体现了澳洲人的品格。

华文报刊的泛起

张奥列

我买中文日报，多光顾英文书报摊。在悉尼，星罗棋布的书报摊，几乎都有好几种中文报纸销售。若是华人书报摊，则常有十几二十种中文报刊。有些书店，还销售中、港、台的报纸杂志，有数十种之多。澳洲各民族社区，拥有最多民族报刊的，恐怕要数华人了。华人似乎保留了崇尚阅读的儒家风范，并具有现代生活的信息头脑。

虽在他国异邦，35万澳洲华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思想情感和生活习俗。日益发展的华人社会，需要有多种新闻或文化传媒，以满足其生存需求。因此令众多的华文报刊应运而生。

也许是多年的职业习惯，我不仅留心书刊报章，第一次寻工做，也是奔华文报馆。那天我拎着一袋文凭、证书、著作之类的东西，闯过《星岛日报》接待员的关，见到了一位女秘书。还未坐下，她就冷冷地问：“怎么没约见就上门？”我实在不清楚澳洲见工要先寄资历，合则约见的惯例，只好抱歉道：“我刚来澳，不知道规矩，想找工就寻上门来了。”待她一声不响地翻阅了我那一袋材料，脸色才见温和。她问，您想干什么工？我忙说，编辑、记者、拼版员均可。她说，这都没空缺，刚好需要一名写作者，你是否愿意干？在大陆的报社杂志社，我从未听说过写作者的职位，但还是点头应允。于是，她把我的材料复印几份，找主任去了。

趁此机会，我环视了四周。报馆的首层作广告业务，对外开放；二楼作编辑业务，一片肃静。编务人员不多，统共才10来张写字台，台面上大多摆有电脑。我正想看个仔细，女秘书转出来说，主任要问话。于是，见到一中年男子带着一对青年男女煞有介事地进来，想必是主任及其副手了。我的材料他们人手一份，那对男女边看边问，而主任则不动声色，气氛似乎有点紧张。终于，主任开腔了：“看你的材料，干写作者太浪费，不过也没别的空缺，先干着再说吧。”那男女便把工作要求说了一遍。原来那是报纸周刊的写作者。澳洲的华文日报，通常周末都附送一份娱乐性的周刊。所谓写作者，实则是把中、港、台报章翻抄改写，把有趣味性、可读性的东西改头换面拼凑起来，给读者以消遣娱乐。因每周仅出一期，写作者每天只干4个钟点，周薪才百多元。编辑、记者的人工本来就偏低，不及工厂工、清洁工、各类技术工。写作者属半职，人工更低，相当于政府的失业救济金。主任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只是人工太低。然而这个低薪职位却有很多竞争者，我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干成。不过，对这家报馆，我倒有了一些了解。

拥有10多个版面的《星岛日报》，已有10周岁了。它是全澳最大及开办最早的华文报馆。其实它是香港《星岛日报》的澳洲版，除了澳洲新闻外，偏重于香港信息，副刊则全由香港承办。澳洲的香港移民较多，由于商业及文化背景，华人社区与香港社会关系密切，因此《星岛日报》影响较大，发行量约为1.5万份。澳洲的记者、编辑工作与大陆稍有不同，除了本报专稿、特稿之外，一般的社会新闻是不用外跑的。澳洲的各类社会新闻及政府方面的活动，统由庞大的澳联通讯社包办。各报馆只要付款购买新闻，接上电脑，记者、编辑每天就可以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荧屏选稿译编，从众多的各类电

讯稿中各取所需。所以记者、编辑必须有“坐”功和快速译写的能力。华文报刊还可从英文报章中转译人家的东西和摘登中、港、台报章。因此，用不着花大力气去组稿、约稿。除了几个跑当地华人社区商界文化界社团界的专职或兼职人员外，似乎没有什么作者队伍。在“分分钟计钱”的商业社会，报纸的运作绝对是精兵简政，一个萝卜一个坑。通常记者、编辑每人每天要弄一两个版，工作量颇大。

发行上万份的另一家华文日报《新报》，也过了5岁生日。它虽然也是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副刊也由香港整版电传过来，但它有较多的大陆和台湾信息。它的版面也采用横排方式，受到大陆背景的读者欢迎。许多商业雇主想向留学生招工，都喜欢在《新报》上作广告，见工者肯定踊跃。看到《新报》偶有招聘记者、编辑的广告，我原先也想去应聘。但听说这些广告多是虚言。当然，有时也实在需要译编人员，因为译编要求高，工作压力大，常有一些人受不了而辞职。无奈我英语不灵，只好作罢。

还有一家《华声报》，由周报改为双日报再易为日报。因报纸赔本，已更换过老板，似乎渐见起色。它有点像各类报纸的大杂烩，所以一时难与前两家报纸比肩。不过，它辟有留学生专栏，设有读者会，并和另一家《新海潮报》能为当地各类作者提供一点版面，且略有薄酬，也有自己的长处。而《雪梨周报》则纯粹是娱乐性的文摘小报，确实也能吊吊读者的胃口。

在澳洲，报刊的生存全赖于经济。若办报办刊，一般都有财团或大老板支撑，否则一两百万元掷下去顷刻化为泡影。不过，仍有不少留学生及原大陆专业人士跃跃欲试，投身报刊业。有一伙赚了点钱的留学生，想集资搞份《晨报》。入股和招聘广告一打出，引起华人社会的关注。光是见工的原大陆记者、编辑、教师等就有上百人。招聘工作似模似样，要过三关：面试、笔试和写作。当然，那是大陆式的考核，我熟门熟路闯过三关。报纸的筹办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留学生们都翘首以望自己的报纸早日出台。怎知忽地冒出个资金管理问题，股东们发生内哄，热闹了一阵的《晨报》便偃旗息鼓、无影无踪了。几年来，华人社会对留学生窝里斗，派系之争，门户之见，争名夺利时有所闻，有所不齿。而昙花一现的《晨报》，也落下了一个笑柄。

不过，总算有人还是办起了第一张留学生的报纸《华联时报》。一家留学生办的食品公司作该报的大股东。这份报纸侧重反映留学生的思想情感和生活需求，传导大陆开放改革的信息，力图帮助大陆同胞融入澳洲社会。它有自己的信息渠道，自己的作者队伍。虽然在编、排、写方面它仍欠缺点纹路、欠缺点节制，但其“杂文广场”无疑卷起了留学生杂文创作的一股热浪。我曾参与该报的创办，觉得它有生气、有特色。但仅面向留学生，读者面似乎窄了一点，能发行三五千份已很乐观。

除新闻报纸外，留学生还先后办了不少综合性的杂志和广告性的报刊。最早创办的留学生杂志大概是《满江红》。当年它曾就中国留学生问题采访过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并获其题辞。从技术上说，这里办杂志也不算费事。只要弄到一大堆中、港、台的报章书刊，如果懂英文，再弄点英文报刊，挑挑拣拣，拿去复印，然后剪刀加浆糊，交印刷公司植字印刷，再交报贩发行，就大功告成。如果每期能有篇自己的专访、特稿，就颇像样了。这也实在吸引着许多想过办报办刊瘾的留学生。于是，许多杂志如《焦点》、《潮流》、《四海》、《飞象》、《宏观》、《新移民》、《大世界》、《唐人街》、《中国人》、《移民导报》、《现代生活》等，还有广告报刊如《百家信息》、

《综合周刊》、《澳洲商报》、《信报》等竞相涌现。因为报刊很难盈利，所以多是兼职搞的，往往“两三条枪”就干开了。

有时我也真的弄不清办报刊的人究竟图什么，但确实佩服其闯劲和毅力。有位留学生节衣缩食省下了一点钱，想跻身文化界，接触上流社会，便办了份装璜精美的杂志，挂了主编头衔。这位主编如愿以偿，以西装领带名片进入社交场所。他白天采访了唐人街侨领富商，宾客双方礼尚往来；晚上回到住所却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连睡房都没有。这种辛酸恐怕别人难以体味。

某杂志需要钱维持下去，便找到华阜某侨领，寻求支持。侨领坦率地说，我现在不会给你钱，但可以帮你搞个活动让大家捐钱赞助。于是，该杂志在唐人街酒楼开了台晚会，与拥趸联欢。侨领特别邀请了一些商绅名流主席，晚会开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侨领首先带头往台上摆着一个纸箱里投进一个结结实实的大红包，内中有多少分量，谁也不清楚。接着，商贾富豪们也纷纷解囊，三三两两往箱里塞钱。当晚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后，心花怒放的编辑人员清点款项时，才发觉箱子里最大的那个红包不翼而飞了。问谁谁也不知道不承认。晚会过程中一直有6台摄像机对着台上和箱子。原以为借助现代科技可以破案，岂知窃者手法高明，录映带上只见乱哄哄的一团人。他们怀疑某人并报了警。警察审看了录影带，摇摇头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拿人。结果不了了之。据估计，红包至少有6000元。但他们却不敢问侨领，也不敢告知实情，只好耷拉着脑袋自叹倒霉。

每份五六角钱的报纸和一两元的杂志，其经营大抵要靠广告维持。在有限的华人社区，广告的竞争异常激烈，稍有差池，便危及信誉。某家日报的一个吊唁广告，不慎忙中出错，把黑框打在奔丧的亲属名字上，慌得报馆连忙赔礼道歉，广告部经理即时被“炒”。翻开各报刊，广告多以饮食、地产、金融、车行、电器和出租、招聘为主。好些西人的商业广告也登在华人报纸上。某西人电器行生意迟滞，华裔职员便建议老板在华人报纸上登个大广告。老板半信半疑，试登了一期。结果华人顾客如云，店铺生色，生意顿时比周围同类商行旺许多。老板大喜，便接二连三地登下去。华人的消费力强，许多西人的地产、车行、金融业都借助广告往华人社区寻找客户。广告的效力也实在大。如果你想出让一部车，出租一间屋，只要登个小广告，保准那天你的电话会从早到晚响个不停。于是，有些精明的留学生便索性办起广告性的报纸杂志，摆在书报摊和食杂店，免费任君取阅。由于是大赠送，发行量较大，因此容易吸引广告客户，以广告养报刊。

近一年间，华文报刊大有泛滥之势。因报刊众多，而华人读者毕竟有限，连几家大报都有某种生存危机感。然而仍有不少勇者继续闯入这片难有利可图之领地。经常可以看到新面孔出现，也会发现有不断的消失，尽管办报办刊前景未可预料，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角逐，却实实在在激活了华人社会的经济文化。对于“玩”报刊的留学生来说，也是一次自我实现的人生体验。

新西兰的毛利文化

王晓山

新西兰的毛利族人的聚居地，是许多外国访问团必去之地。在我们访新的第二天，新西兰文化部的官员安排我们参观了毛利族人的著名建筑——毛利会堂。据说，毛利会堂是毛利族人社会生活的中心，是毛利族人举行重大社会、政治、文化和庆祝活动的场所。毛利会堂从各个方面综合地体现了毛利族人的智慧与艺术才能。

我们来到离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不远的的一个毛利族人社区。一片绿荫中，只见稀稀疏疏地散落着幢幢平房。洁白的基座，通红的房顶，方方正正的。在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房子中间，是宽敞的草坪，毛利族人的会堂就端端正正地位在其中。

毛利会堂被称为毛利族人的艺术博物馆。其建筑物本身呈人体形状，主梁代表人的脊椎，横梁代表肋骨，露在外边的两个人字形的椽子代表人的双臂，下面的一对支柱代表人的双腿。屋脊上人字头的顶端是一个人面雕刻，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前方，伸着舌头显示出一副蔑视敌人的表情。社区的向导告诉我们，这里的会堂是以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它象征这毛利族部落的团结。整个建筑物由木材和苇薄建造，没有使用金属或石头。当地的毛利族人多选用长年生长在新西兰南岛上的托它拉（totara）和考利（kauri）这两种优质木材为会堂主体建筑材料，然后用一种叫托伊托伊（toitoi）的苇薄编制成屋顶及四壁。在毛利族能工巧匠的手下，会堂从上到下被雕琢编制得既华丽又古朴典雅。

按陪同事先的交待，我们与主人行过毛利族的碰鼻礼后，脱下鞋子，步入会堂。令人惊讶的是会堂内没有任何摆设，只有一扇扇编织的墙壁和四壁间一根根精心雕饰的梁柱及屋顶。在主人的引导下，我们遵循毛利族人的规矩，从左到右按部落首领、平民百姓等依次盘腿席地而坐。在正式开场前，主人望着来访者中唯一女性的我，和蔼地说，一般来讲，会堂未正式对外开放以前是不允许妇女入内的。我不由地暗自庆幸，这次访问的地方在当地人眼里已经是属于现代毛利族社区，所谓现代，即不会像原始的那样注重其传统的清规戒律了。

大家开始安静下来，主人用他那特有的语调，缓缓地向我们叙说着。每一个毛利族部落至少要建一个会堂，作为举行庆典活动或仪式以及接待贵宾的神圣场所。会堂的大小不等，小的只有 25 英尺长 15 英尺宽，大的可以有 80 英尺长 50 英尺宽。形状大致相似，均呈长方形。除了门前正面的那些雕刻以外，四壁上还有高度图案化的人物木雕，这些人都是部落里的将军、人民崇拜的长者，或是部落中那些受人尊敬的工匠。说到这儿，主人顺手指了指一侧的木雕，问我们发现了什么特殊的地方。显然，这尊木雕是一位工匠，因为他的手里握着一把精美的刻刀。再仔细瞧，他的手似乎比一般人的要大一些，更突出的是无论右手或是左手，不是只有四个指头，就是只有三个指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工匠的手残缺不全呢？善良的毛利族人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历史故事。

多少年来，刻刀为毛利族人的主要雕刻工具，一直被视为极珍贵的礼物，通常由部落的首领赐给最著名的能工巧匠。相传在 19 世纪初，一位欧洲航海

家登上了新西兰的南岛，来到了毛利族人的部落。临别前，他想带一件纪念品回欧洲，于是便开口向部落里的工匠索要一把刻刀。不料，工匠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欧洲人只得沮丧地离去。可惜的是当时那位欧洲航海家并不知道一把刻刀在毛利族人心目中的价值。尽管它不是金子铸成的，但由于那时的毛利族部落里没有货币，因此用这把首领赐予的刻刀可以换来许多土地和牛羊。或许是工匠在部落里的独特地位，使很多毛利人从小就萌发了要学工匠的念头，尽管他们还不晓得学艺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代价。

那时候，由于本部落的工匠有限，而要求拜师学艺的人又太多，这就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别的部落去求师学艺。当时，毛利族各部落的规矩很多，这不仅是针对那些非毛利族人，即便是对不同部落的毛利族人，他们也十分谨慎小心，尤其是在传授木雕技艺上。有的学徒为了表示自己拜师求艺的诚心和热望，竟当着部落首领及工匠的面忍痛割去一个手指。有的部落则要求那些登门求艺的学徒，截掉一两个手指。难怪在新西兰毛利族人的木雕中，人们看不到长着十指的工匠。

听到这里，我不禁凝视着眼前这位长者，他那饱经风霜的面颊刺着道道波纹。一条条红、黑、白色的波纹交织在一起，相聚在面部的中线上，又从中线上对称的向两边散开。我想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它喜怒无常，时而波涛翻滚，抛起万丈浪涛，聚成无数巨大的漩涡；时而风平浪静，细浪淘沙，碧波粼粼。记得在搭乘新西兰航空公司班机从澳大利亚的悉尼飞往新西兰第一大都市奥克兰时，我曾问过空中小姐，新航的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她说是波浪与漩涡，源于毛利族艺术。有人说波浪与漩涡象征着生命的旋律。总而言之，这种传统的艺术构思是毛利族人历史的某种真实写照。透过它，可以令人想象出毛利族人当年如何驾驭独木舟劈波斩浪，越过波涛万顷、漩涡众生的茫茫大海的壮观景象。

老人告诉我们，毛利族人自古以来喜爱纹刺，尤以面部为主。而面部纹刺又仅限于部落中有一定身份的人及其妻子。虽然纹刺的花纹大小及形状各不相同，但均以波浪形和漩涡曲线构成。男性说纹的面积较广，有颊、鼻翼及额部两侧等；女性仅限于双唇和口下部位。说着他用毛利语唱起了一首讴歌波浪与漩涡的民歌。声音是那般的低沉，扣人心弦。歌词的大意是说那湛蓝的海中铺满了一朵朵洁白的浪花和一个个闪光的漩涡，似乎使人感受到在风和日丽的初夏，那朵朵浪花给人带来的凉爽，那一个个微笑般的漩涡给人带来的惬意。突然，风吹浪起，歌曲的旋律一拍快似一拍，伴着汹涌澎湃的浪涛，夹着急速飞旋的漩涡，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叶扁舟，在铺天盖地的大浪中颠簸，时而被抛向浪尖，时而被送进浪谷。忽然，一个巨大的漩涡袭来，转瞬间把扁舟无情地吞噬了。这首歌恰好反映了毛利族人对大自然既热爱又敬畏的原始情感。波浪与漩涡的传统艺术构思，可以说是毛利族人从他们独特的生活环境中酝酿出的一种素朴的审美形式。

走出毛利族人的艺术博物馆，老人的歌声仍萦绕在耳畔。毛利艺术古拙稚气，具有浓郁的原始文化气息，充满了原始生活的韵味和情趣。而毛利会堂集中地表现了毛利族人传统文化及原始古朴的艺术风格。在追求“返朴归真”的今天，也许毛利族人的传统文化能给予当代文化艺术家们不少的启迪。

独木舟与古老的传说

王晓山

在新西兰短短几天的访问，真可谓来去匆匆。日程几乎排得满满的，难得闲暇。尽管如此，热情好客的新西兰人还是为我们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活动——参观首都惠灵顿的国家博物馆。他们认为：虽然几十分钟远不够了解一个民族，但对我们这些文化圈子中的一分子，有机会到博物馆看看，即使是走马观花也好，总归是有所收获。

博物馆并不很大，布置得却是很别致，几个主要的展厅各具特色。陈列精品的橱窗金光闪闪，即便隔着一层玻璃，也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生怕靠得太近“惊动”了里面那些小“精灵”，它们实在是太精美了，因此没有人愿意伤害它们。陈列“土特”艺术产品的大厅更具新意，展厅地面被一堆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覆盖着，仅留下一条细细的甬道供参观者通行。乍看上去，看不出什么名堂，搞不清艺术家的创意，再仔细端详才略有所悟。原来是一群锥体动物爬行图。据陪同人员讲，它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所有的石头不仅是新西兰当地的产品，更是用这里的天然色素染制的。

在中间的陈列大厅内，摆放着一件十分显眼的展品——毛利人的独木舟，这只独木舟从东到西占据了整个大厅。我知道毛利族为新西兰本土居民，多少年来这个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生息、繁衍；置根与这里的芳香泥土之中，孕育出新西兰最古老的传统文化——毛利族文化。

这只独木舟呈梭形，雕凿得相当精细，据说是毛利族人打仗时使用的。独木舟看上去约十来米长，船柱下插着一排整齐红色羽毛，仿佛是倒贴在船上似的。传说这红色的羽毛是曾经栖息在南太平洋群岛上的一种大鸟的羽毛。它是一种吉祥之鸟，现已绝迹了。整只独木舟，无论是船首、船尾还是船身，四处都是精心雕刻的优美图案，这些图案的内容大多与毛利族人的宗教信仰或传说有关。

正当我细心地注视着这只颇具毛利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独木舟时，一位地道的毛利族解说员操着流利的英语对我讲，毛利族人的传统观念认为自己的祖先与世上芸芸众生都是神的子孙。古代的毛利人相信，人死之后，其灵魂和神仍一同留在人间，但是遗憾的是世人无法与之直接接触，要通过那只红色羽毛的大鸟才能沟通。因此，毛利族艺人别具匠心地将这种能在生灵与神之间搭起一座彩桥的大鸟的羽毛装饰在船头。这不仅表现出毛利人通过大鸟的形象来达到对神的崇拜，祈求神灵来保佑众生的平安，而且也使战舟增添了一种威武雄壮的气势。那一排排羽毛看上去像在碧海蓝天中迎风招展的一排排战旗，鼓舞着毛利族人的士气。

我一边倾听着解说员那略带神秘色彩的解释，一边更认真地观察起眼前这只独木舟。这时，我发现在对着那些“羽毛战旗”的地方，有一块长方形的木雕板将船头由中间一分为二。这块木雕的画面显得十分生动，予人一种古拙粗犷之感，木雕的内容表现的是毛利族人的一个古老传说。木雕的上方，据说是诸神的父亲兰基劳伊（ranginui，毛利语，意为苍天），呈匍伏状；木雕的下方，为诸神的母亲帕普—托—努库（papu-tua-huku，毛利语，意为大地），呈仰卧朝天姿势。在“苍天”与“大地”之间为诸神所在，他们将

诸神呵护于自己的膝下，紧紧地结合在“苍天”与“大地”的中间。据说，后来诸神都想离开父母而去，要独立生活。于是，诸神都各自想方设法，试图将他们的父母分开。可是，诸神中唯有塔内（tana，毛利语，意为森林神）获得了成功。塔内不仅巧妙地将父母分开，使他们最终变成了苍天与大地，而且还创造了灌木丛、森林及万千生灵。塔内还用泥土塑造了海内—阿休—奥妮，并赋予她生命力。从此，塔内便与奥妮开始繁衍他们的后代。

据说，今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大多数毛利族人最初均是乘独木舟飘洋过海到达新西兰的。因此，可以说独木舟的出现才揭开了新西兰的历史篇章，它是新西兰历史的见证。那些古老的传说更说明了新西兰的原始民族——毛利族所拥有的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独木舟不只是毛利族人的作战及运输工具，而且蕴积了毛利族人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

在与这位年轻的毛利族解说员告别时，他指着胸前的项链问我是否知道上面的玉坠是什么，我以前曾听说过毛利族人崇拜一种叫“提基”的神，并常常用新西兰特产的一种绿石来雕刻“提基”神像，至于更多的说法便不得而知了。“提基”的造型很古怪：两只大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舌头吐在外面。小伙子自豪地微笑起来，向我们解释说：在毛利族人的传统观念中，是“提基”创造了人，因此它代表了毛利族人的祖先和神。至于绿石雕刻则是新西兰人的偏爱，据说这种偏爱源于一段美丽的传说。

很久以前，有一位毛利族人带着一只垂耳鸦，乘独木舟从南岛来到北岛——新西兰本土。这里的人们从未见过这种奇特的大鸟。这只垂耳鸦的羽毛在近根部三分之二的地方全是黑色，尖部的三分之一是白色，它的翅膀大得无法飞行。于是，前来观赏的人越来越多。一天，那位毛利族人驾上独木舟准备返回南岛了。人们依恋不舍，望着人们爱怜的目光，心地善良的毛利族人决定把这只爱鸟留在北岛。临行前，他抚摸着垂耳鸦的羽毛叮嘱北岛的人一定要精心喂养并善待它。然而，北岛的人似乎没有把毛利族人的话放在心上，由于缺乏足够的照料，垂耳鸦不久便饿死了。当南岛的主人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欲绝。他伤心地跪在岸边，面对北岸的新西兰本岛，泪如泉涌。一串串晶莹的泪珠顺着这位纯朴善良的毛利族人的双颊流入大海，顷刻之间，那一串串泪珠竟变成了一颗颗碧绿透明的玉石。从此，这种绿石变成了毛利族人最高贵的装饰品。这是一段十分动人的传说，听到这里不能不叫人对毛利民族肃然起敬，对美丽的绿石更加喜爱。记得新西兰作家罗素·贝克（Rosell Beck）曾在《新西兰玉石》一书中写道：“现在，新西兰人已开始意识到了新西兰玉石不仅仅是一种吸引人的宝石，更主要的是它已成为新西兰国家文化遗产的精髓。”

从19世纪起，毛利族人即开始用绿石制作各种工艺品。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绿石加工雕刻方法：先用砂石片或石板将绿石切成小块，并用水晶石、沙子和水打磨，然后再用细砂石一点一点地磨成形。绿石上的孔眼是用木头、骨或竹子沾上湿沙钻成的。可想而知，创作一件绿石艺术品是相当艰辛的。

20世纪初，随着欧洲移民的涌入，毛利族人发现他们自己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慢慢地雕琢那些绿石了，他们必须将原有的传统搁置一边，去适应新的世界。为了生存，许多手工艺人放下手中刻刀，去当劳工或伐木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又重新对绿石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或许要归功于一位美国军人，因为他花重金购买了许多色彩斑斓、造型美观的绿

石艺术品，并将他介绍给世人。

在新西兰短短的几天访问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里的人民对新西兰绿石的酷爱，从与我们接触过的朋友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或是佩戴用绿石制成的项链、耳坠儿、戒指，或是将它做为腰佩、信物。

离开博物馆时，为了对这位毛利族青年表示感谢，我非常郑重地以毛利族人特有的礼仪——碰鼻礼与他告别。这是一个多么质朴的民族，质朴得就像那绿石，碧绿无瑕。

瞻仰路易·艾黎故居

邱秉钧

路易·艾黎这个名字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艾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的贡献也是童叟皆知的。一个偶然的机，我拜谒了艾黎的故居。

由于新西兰地处南半球，节气正与中国相反。10月的北京，大概正是金风飒飒，红叶遍野的秋天，而新西兰却是春意盎然的初春。极目远眺，绵亘的雪山像一道道多姿多彩的屏风；森林和山坡是一片翠绿；五颜六色的花朵开放在草丛、树枝和住家的院落里；数不清的牛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远远望去好像一朵朵白云在飘动。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房子在阳光下犹如镶在绿色绒毯上的宝石……从繁华的都市一下来到这样的“世外桃源”，令人心旷神怡！

不知不觉中，车子已开进斯勃林菲尔德小镇。我抬眼望去，只见草坪中央的一块圆形红砖地上，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石雕，这就是纪念艾黎的石刻浮雕。这件作品出自两位中国雕塑家之手。但是，他们没有像通常处理伟人像那样做成圆雕，他们在平展的一面以浮雕的形式刻画了3个人物。中央是坐着的艾黎侧身像，他上身穿着汗衫，脚打草鞋，慈祥的面容，深邃的目光，垂在膝盖上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艾黎的身边分别是一个站立着的男青年和一个坐着的女青年，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绵羊依偎在艾黎和女青年的身旁。路易·艾黎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劳碌奔波，自己却终身未婚，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我想，艺术家这样处理作品的主题也许涵义更加深刻。

我在静谧中仁立良久，向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艾黎一生虽无子嗣，但他的姐妹们（大多已去世，还有一位妹妹住在奥克兰）都是新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艾黎的一位堂弟——迪格·艾黎，曾担任过新中友协塔朗纳基金会的主席。他虽年事已高，但经常去学校作讲演，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贡献。

我们徒步去瞻仰了艾黎出生的故居。房子不大，由于无人居住，门窗紧闭，我们只好透过玻璃向里探望。然后，我们又去小学校看望了全体师生。这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30来名各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连校长在内只有3名教师。校长向我们讲述了艾黎童年的故事。她还告诉我们，学生们特别想了解中国。我想，艾黎播下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

在回基督城的途中，我们还去看望了阿彻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艾黎生前的老朋友。他于解放前夕去了甘肃的山丹县，担任过艾黎的秘书，解放后在培黎学校教过英语。

阿彻先生的家占地几十亩。院子里林木森森，芳草遍地，还有小桥流水。我们的目光一下被池塘中央一座小巧玲珑的中国琉璃塔吸引住了。还未等我开口，阿彻先生告诉我，这是艾黎当年送给他的礼物。院子里还有很多中国树木，它们大多已是树干参天，浓影盖地，有的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一进阿彻先生的家，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小型的中国文物博物馆。正墙的壁柜里摆满了汉陶和各种塑像。一张长沙发后面挂的是康有为写的对联：观朝廷盛事，枕簟生微凉。

阿彻先生拿出一本相册，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讲解当年他在山丹拍的照

片：满身疮痍的城墙；绝迹的古建筑和古寺庙；一脸稚气的“小八路”和培黎学校的男女学生；还有一幅斗争地主老财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是真真实实的历史见证，因此格外珍贵。

小坐之后，阿彻先生又领我们去他的卧室参观。斗室中满是书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白乐天的一副对联（拓本）：“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阿彻先生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今天黄河就要清了。”寥寥数语，包含了老人家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道出了半个世纪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艾黎第二故居纪行

一般的新西兰人都知道，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路易·艾黎出生在南岛的斯勃林菲尔德小镇，但他在北岛生活了六七年的故居却鲜为人知。

1918年底，艾黎从欧洲战场回到新西兰。在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的鼓励下，他们在北岛的塔拉纳基共同购置了一片几百顷的土地，希冀开发出一个农场。这块土地处于深山峡谷之中，千百年来的花草树木生生死死，地上覆盖着厚厚的腐殖质，所以很是肥沃。艾黎和朋友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来，艾黎将一半地产赠送给了朋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自此，艾黎在中国生活了60余年，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这个农场可以看作是艾黎在新西兰的第二故居。

今年是路易·艾黎百年诞辰纪念，艾黎的堂弟——迪格·艾黎，原新中友好协会塔拉纳基分会主席，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和联络，决定于4月12日举行一次“重访故居”活动。使馆派出一个四人小组前去参加这一活动。

我们的车子一早从惠灵顿出发，向西北方向走了三个小时，到达了一个名叫韦弗雷的小镇上。半小时后，一个四五十人的队伍终于形成。他们中间有艾黎的侄子、外甥，新中友协的成员，还有为艾黎故居作出过贡献的人们。

十来辆车子鱼贯而行，走了50公里到达了公路的终端。从这里开始，就是一段9公里的崎岖山路。不知不觉中，车子停在了一个山谷中的土路上，我们放眼望去，只见在一面比较平坦的山坡上有两座小房子——这就是艾黎居住过的故居。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故居。前一座小房子共有三间：起居室占了一半的面积，取暖的壁炉还是当年的样子；另一半便是两个小房间，每间大约七八平方米。艾黎住的那一间里只是一张单人床。墙上贴的是现在的房主人（农场雇工）喜欢的已经发黄褪色的电影明星照片。后面的房子主要用作厨房和放置工具。在90年代的今天，这里的条件仍十分艰苦。没有自来水，饮用的是山泉；没有电，一些太阳能电池为电话供电。当年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参观过后，迪格宣布仪式开始。他简要地介绍了故居的修复过程后，邀请新中友协主席葛玛丽夫人讲话。她高度评价了迪格·艾黎为这些访问活动所作的努力，她希望以路易·艾黎为代表的先辈们开创的新中友好事业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我以文化处一秘的身份代表使馆向故居赠送了一个带有艾黎头像的大瓷盘。仪式虽然简单，但气氛是那样热烈，阵阵掌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

最后，葛玛丽夫人、迪格和使馆一行在故居的园子里种植了两棵树：一

棵是被称作“活化石”的银杏；另一棵叫做“和平”的中国树。当人们问及为什么要种这两棵树时，迪格说：有友谊才有和平，愿世界和平像银杏树一样万古长青！

新西兰有片“中国林”

史宗星

有人或许还不知道，中国在新西兰拥有对一片面积3万公顷森林的采伐权。这片森林位于南岛东海岸的丛山峻岭，生长着清一色的辐射松，既高大挺拔，又茂密苍郁，生机勃勃。人们叫它“中国林”，也把它称为中新两国“绿色合作工程”。

这片森林，是中国在新西兰最大的投资项目，据说，在我国的海外大项投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属于以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为主要股东的“威尼达林业公司”。

在奥克兰市中心的威尼达公司总部，记者了解了这片“中国林”的诞生经过。那是90年代南半球的头一个春天，中国外运公司看准了一个跨越行业的机会：世界木材需求量急剧增加，而森林覆盖率却不断减少，经营林业肯定是大有作为的。当时，适逢新西兰政府大力吸收外国投资，以发展林业。中国外运公司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良机，通过国际融资买下了这片拥有70年采伐权的森林。

才过了4个春秋，威尼达公司的事业就开始红火了起来。公司根据林区的树龄结构，一手抓林木管理，一手抓市场销售，提前两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公司负责人兴奋地介绍说，1990年为这片林山投资1.65亿新元，到1993年底，林山增值到3.98亿新元，翻了一番多。如今的“威尼达”是个在新西兰叫响的名字，被列入了新西兰大林业公司的行列。

新西兰这个地球南端的岛国，雨量充沛，气候温和，辐射松能以30年轮伐期大量生产优质原木。1992年，“中国林”首次采伐就生产木材33.5万立方米，1993年上升到40万立方米。这些木材90%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抢手，公司营业额因此而大幅上升，1993年比1992年增长了63%，偿还当年贷款利息后的利润仍然相当丰厚。

中国政府一直关心遥在南半球的这片“中国林”。1992年4月，朱镕基副总理访问新西兰时，专程到林区视察了5个小时，对林木长势和管理颇为满意，还充分肯定了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从事跨行业经营的方向。今年4月间，田纪云副委员长访问奥克兰时，也到威尼达公司总部，了解“中国林”的发展情况。

“中国林”正迎来它的黄金时节，威尼达公司也更加雄心勃勃。公司已有了个长远的框架规划：进一步扩大森林面积；建立木材“采伐、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生产体系，提高木材生产综合效益。过去4年的发展势头预示，这片远离本土的“中国林”，其前景将会是美好的。

新西兰的“绿色金库”

史宗星

牧场覆盖着 52% 的国土，森林占全国面积的 28%。这两个百分比，展现了新西兰的自然风光和经济特色。

新西兰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绿色的致富路。年人均收入 1.2 万美元，主要来自一个“绿色金库”——1700 万公顷人工牧场和 128 万公顷人造商业林。

绿毯一般的人工草场是新西兰的一大杰作。早期的新西兰牧民，也是骑着马、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但那种浪漫且原始的放牧方式不能使日子富裕起来。从本世纪初开始，全国大规模地建设人工草场。人们将天然牧场翻耕平整，施上肥料，播种产量高、营养价值好的草种，像菜园子一样精心管理。牧草丰盛了起来，载畜量大幅提高。加上大自然赐予的温和气候、充足阳光和丰沛雨量，新西兰畜牧业一改旧貌，赢得了“畜牧王国”的盛誉。人口仅 350 万的新西兰，目前拥有 800 万头牛、6000 万只羊和 140 万头鹿，畜牧产品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羊肉和奶制品出口居世界首位，羊毛出口排行世界第二。有人形象地把这个绿色岛国称为“奶桶+肉库”。

新西兰十分讲究“科学放牧”。全国有 5 万多个牧场，普遍采用“围栏轮牧”法：用铁丝围栏，分成一块块草地，牛羊吃完一块再换另一块，既让牛羊吃得好，又保证草场长盛不衰。据统计，全国架设的围栏总长度达 85 万公里，可绕地球 20 圈。

新西兰的草场研究、牧畜品种改良和奶制品研究在世界上均处领先地位。研究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为畜牧业发展服务，为畜牧产品出口尽力。当许多国家还在为牲畜的饲料问题发愁之时，新西兰已在让牲畜“吃得好、多产奶、快长肉”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同畜牧业取得的成就一样杰出，新西兰人造商业林的成功也是令人羡慕的。新西兰曾有过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可惜由于大兴土木使大部分原始林遭到破坏。为了保住尚存的原始林（约 610 万公顷），既维护生态平衡，又满足国内木材需求，新西兰政府于本世纪初决定大规模营造商业林，优质速生的辐射松被选为造林的主要树种。由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育种、营造林和木材加工，新西兰辐射松每公顷年生长率高达 23 立方米。以平均仅 30 年的轮伐期大量生产优质原木，使林业产值很快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6%，不仅满足了国内的大量需求，而且每年出口木材 940 万立方米，占全国出口总收入的一成以上。据专家介绍，到 2005 年，新西兰人造林产量将会增加一倍，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木材供应国。

汤加趣话

唐永兴

汤加，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面积才 668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汤加以胖为美闻名世界，它的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就是世界上最胖的君主。

汤加人属波利尼西亚人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十八九岁的姑娘长得丰满漂亮，而三十开外的妇女形体富态。以汤加人的审美观，肥胖才是美的。然而像陶法阿豪·图普四世国王那样胖的人，在汤加就他一个。

我曾两次见过汤加国王，我的印象是，体胖并没有给他的谈吐举止带来严重影响，这可能与他身高 1.88 米有关。10 年前，他在阿皮亚参加西萨摩亚独立周年纪念期间，曾到中国重庆杂技团下榻的饭店，盘腿而坐，同中国演员交谈甚欢。后来见到他到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无论是在欢迎仪式上检阅仪仗队，还是同澳总理步入宴会厅，步履不好说轻便，但也不困难。不过他的坐车，车门和座位都经过特别的改装。

汤加人肥胖与甘薯密不可分，而国王又特别爱吃甘薯。有一年他访问美国，到医生那里进行身体检查，医生要他节食减肥，以减轻对心脏的负担。他表示为难，因为他爱吃甘薯。那位医生从未见过甘薯，于是问道：“甘薯是何种食物？”国王回答说：“像土豆。”医生听后即嘱咐他日吃一个就够了，不可再多。在场的人听了医生的嘱咐几乎吓了一跳，因为这位医生不知道，汤加的甘薯通常每个可以长到 40 斤重。不过国王还是礼貌地答应了。

甘薯，是汤加人的主食，一日三餐，顿顿不少，即使在盛大的宴会上也少不了它。在汤加 1970 年获得独立而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就端上了 2500 个甘薯，供宾客食用。

汤加气温较高，适合甘薯生长，年产量目前达 10 多万吨，人均 1 吨，全部内销。汤加人不仅以肥胖为美，他们还引以自豪，这大概与他们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有关。

汤加人与西萨摩亚人同属一个种族，据传他们是在 1000 多年前从西萨摩亚迁来的。“汤加”一词，在波利尼西亚语中是“南方”之意。西萨摩亚在汤加的北方。

当早先的汤加人乘独木舟从西萨摩亚启程驶往这块“南方”土地时，他们以树叶蔽身，但编结在身上的树叶很快曝晒干枯，于是他们撕下由露兜树树皮编织的风帆遮身。当这些人到达汤加后，发现这块新土地上露兜树很多，因此他们继续用这种树皮编织成衣，用以遮身，名为“托围拉”。在波利尼西亚语中，“托围拉”是“遮蔽下身的裙子”之意。

多少年后，当汤加人真的穿上衣裙时，他们仍在腰间围上一块“托围拉”，以此表明他们的祖先当初来到汤加时，并非“衣”不蔽身，不过编织“托围拉”的材料不再是树皮了。

汤加人腰围“托围拉”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不过今天，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作装饰品而已。那些普通劳动者，为了干活方便，他们选围料薄的，而那些头领、官员，以至国王，他们则围编织精细的“托围拉”。编

后记

在编选这套丛书时，我惊奇地发现，除作家出国访问，写下不少优美、新鲜的文字外，更有众多的外交家和著名记者以他们特有的职业优势，长居国外，也写下了大量的游记和见闻。由于他们能长时间地细微观察和感受，因而他们的作品以视角独特、新颖为读者展现出更为深刻、生动的画面。

书中每一位作者，用他们的妙笔让读者领略了世界各国风情，也让读者在想像的海洋里神游了一次世界风光，对遥远的异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层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也开阔了视野。

本丛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每一个作者的友好、真诚合作。同时也得到《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大力帮助，为本丛书增添了不少色彩。编者在此一并由衷地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在选编中遗落了不少好文章，只望在以后再次编选时得以补充。

梦 晨

1998年10月

